·李泽厚主编　美学译文丛书·

符号学美学

[法]R·巴特　著

董学文　王葵　译



·当代西方美学名著·

李泽厚 主编

美学译文丛书

符号学美学

〔法〕罗兰·巴特 著

董学文 王葵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沈阳

Elements

of Semiology

Roland Barthes

HILL AND WANG · NEW YORK · 1984
根据纽约 HILL & WANG出版社 1984年英文版译出。

符号学美学

Fuhaoxue Meixue

〔法〕罗兰·巴特 著
董学文 王葵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138,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½ 插页：2
印数：1—37,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大路 刘烈恒　责任校对：赵学良
封面设计：赵多良

ISBN 7-205-00092-0/B·22
统一书号：2090·122 定价：1.85元

“美学译文丛书”序

李泽厚

1980年6月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简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泽厚同志在发言中强调指出：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冥思苦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国外研究成果和水平。这种情况也表现在目前的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上。科学的发展必须吸收前人和当代的研究成果，不能闭门造车。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著作翻译过来。我认为这对于彻底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研究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有价值的翻译工作比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用处大得多。我对于研究生就是这样要求的，要求他们深入研究、批判现代美学某家某派，而不要去写那种空洞的讨论文章。”

1/66

这确乎是我对当前也只是当前中国美学情况的基本看法之一，得到了与会同志和部分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后，就筹备出一套以整本著作为主的"美学译文丛书"（单篇文章已有《美学译文》刊物），以近代现代外国美学为主，只要是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便都拿来，尽量翻译，书前加一批判性的介绍序文，消化和批判主要仍交给读者们自己去作。我想，博采众家之长，不拘一得之见，批判改造对方，以丰富和发展自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所译的书，尽量争取名著或名家，或当年或今日具有影响的著作。译文则因老师宿儒不多，大都出自中、青年之手，而校阅力量有限，误译之处难免。但我想，值此所谓"美学热"，大家极需书籍的时期，许多人缺少阅读外文书籍的条件，与其十年磨一剑，慢腾腾地搞出一两个完美定本，倒不如放手先翻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所以，一方面应该提倡字斟句酌，力求信、达、雅，另方面又不求全责备，决不因噎废食。总之，有胜于无，逐步提高和改善。

愿我们这个美学事业兴旺发达。同志们，大家都来帮忙吧！

译者前言

符号学是当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在分析哲学、语言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西方对符号的研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英国哲学家和美学家M·C·比尔兹利曾讲："从广义上来说，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以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的最核心的理论之一。"① 这种估计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翻译的这本《符号学美学》，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的重要著作。它于1964年在巴黎以法文问世以后，很快流向西方各国。在美国，这部著作从1967年被译成英文、1968年9月第一次出版以来，一再重印。本书就是根据纽约 HILL & WANG出版社1984年第9次印刷版翻译的。

关于这本书及其作者，美国评论家戈里·维多（Gore Vidal）在《纽约书评》中曾这样写道："罗兰·巴特是头一个

① 李普曼编：《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领悟到象Alain Robbe-Grillet和Nathalie Sarraute这些作家的'新小说'的重要性的批评家。他常被称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批评家，萨特(Sartre)在哲学上的竞争者。这本介绍索绪尔语言学简洁定义的著作，是在结构主义研究上的一本基本教科书。"

"《符号学美学》将文字写作的分析应用于普通的符号科学，应用于被索绪尔在本世纪初第一次提出的语义学。因而，巴特的分析吸收了通信的言语和非语言的模式：'绘画、姿势、音乐、声响、物体和所有这些复杂的联系，它们构成了仪式的内容、约定的内容或公共娱乐的内容，这些如果不是构成语言的话，至少构成了词义的系统。'"

"20多年前，罗兰·巴特就已经是一个迷人的、高水平的批评家了，他带着很大的活力，写了有关卓别林、净化作用、马克思、消遣性、巴尔扎克、结构主义和语义学等方面的著述。《符号学美学》则是一部关键的著作。"

罗兰·巴特在法国讲授符号社会学，讲授聚合性艺术作品问题。他写的书被美国出版社出版的还有《论拉辛》、《写作的零度》、《神话学》、《S/Z》、《本文的意向》、《萨德(Sade)·傅立叶(Fourier)·洛龙拉(Loyola)》和《罗兰·巴特》等。

符号学现在往往是表示符号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经过欧洲结构主义的阐述后，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一"阐述"过程中，罗兰·巴特的功绩是非常突出的。可以说，他实现了索绪尔关于创建普通符号学的梦想，把结构主义的符号原理广泛运用于各类学术性学科。当

于他认为语言在结构和组织上与任何形式的社会行为都相似，处在典范的地位上，所以，语言应是符号学所有分支的“主样式”。

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扩展，必然引起大部分人文科学中观察问题角度的深刻变化。从这一新角度出发，观察事物就再也不是搜集可以实验印证的资料的问题，不是一个用实证主义眼光看待客观世界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把一切表达形式都看成是符号；而这些符号的意义取决于惯例、关系和系统，而不取决于任何内在的特性。“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最早对这种新观点作出反映，他一反常规，在分析亲缘关系时，也把它假设成象语言那样有结构的系统，认为个别成员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系统的一部分。

罗兰·巴特更是明确地提出，“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都是一种语言。”即无论细究还是泛论，文化总是由符号组成的，其结构和组织形式与语言本身的结构和组织形式是一样的。罗兰·巴特在他写的《时装体系》(Systom de lam-ode)一书中，通过总结时装语法方面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符号理论。我们在这本《符号学美学》中，更能清楚系统地看到他的这一观点。

结构主义符号学者把他们的理论看作是“一种分析文化现象的方式”，认为这种方式“起源于当代语言学的各种方法”。这种语言学模式的霸权地位，在文学范围内产生了特殊的意义：文学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和文化活动一样，可以用符号学的原理来进行分析；需要找出作为文学组成部分

的符号的本质，弄清楚那个支配这些符号使用和组合的系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文学实际上是由语言构成的，文学与语言符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文学对语言符号本身的性质有着独特的认识。用茨韦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话说，“作家所做的无非就是研究语言”。文学已成了“语言的某些性能的扩展和应用”。巴特也认为，文学代表着语言的主权。“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是文学生存的世界；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再也不是在什么‘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了。”语言不仅是文学的传播媒介，语言还是文学的内容。正是由于这样顽强地求助于语言学模式，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等人才有了从语言学类推而来的富有创新意义的结构主义分支——符号学美学，才把这种符号学美学当作一门普通的文艺科学来阐述。

罗兰·巴特多方面推进了结构主义，他很早就想使结构主义的论著变得“与它的对象（文学）同源”，他对传统的结构主义进行了批判，倒转了一些索绪尔的命题，因而成为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符号学的研究，也把以往的符号学理论和观念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

为了便于深入了解本书的内容，我们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文艺符号学的基本状况。

符号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分析科学的一个分支。文艺和美学上的符号学，与文艺和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新批评派及结构主义有着渊源关系。文艺符号学重视语言学对文

艺的研究，注重文艺作品的本体研究，注重从结构主义到符号学和语义学的探讨。

所谓符号学，按一般理解，就是研究符号的一般理论的学科。它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它与哲学上的认识论有内在联系。符号学的原理应用到各具体领域，就产生了部门符号学。文艺符号学就是在这种应用中诞生的。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文艺符号学理论发展的历史。

西方哲学进程告诉我们，单纯从哲学角度谈论符号的言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斯多葛派说"某些感官对象以及某些理性的对象是真实的"。①这种真实的感性对象和理性对象，就与我们现在理解的符号有关。其后，在康德、黑格尔、赫尔姆霍兹的著作中，有关符号的思想，讨论符号的篇什就相当多了。黑格尔的《美学》，在探讨艺术符号问题时，就涉及了艺术的各个方面。他曾把不同的艺术种类看成不同性质的符号：建筑是"用建筑材料造成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诗是用声音造成"一种起暗示作用的符号"。②可以说，在黑格尔那里，已经产生了现代符号学思想的胚胎。我们应该看到现代符号学理论与前人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某种承继关系。

但是，比较系统、完整的文艺符号学学说的确立，那还是20世纪的事。而符号学对西方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那更是晚近的情势。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无疑为恩斯特·卡西尔和苏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第371页。

②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16页。

珊·朗格等人的文艺符号学的创立起了强有力的催生作用。

由于恩斯特·卡西尔和苏珊·朗格两位都是哲学家，因此，他们的主要著作——《人论》和《艺术问题》——带有十分浓厚的哲学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味道。他们更多地是从哲学的角度来消化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他们所说的符号多是哲学意义上的符号，而并不主要是指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这个转变的工作，到了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等人那里，才有了明显的进展和可喜的转机，开始从结构主义转到了语义学方面的符号学，并且开始把符号理论运用到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艺术的和实用的、主体的和对象的各种复杂的联合体。这是一大变化。如果我们说德国的恩斯特·卡西尔将符号学应用于人类文化领域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独特的符号形式哲学和人类文化哲学体系，美国的苏珊·朗格继承和发展卡西尔的符号学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并将符号学集中地用来研究艺术，从而完成了文艺符号学的建设，那么，我们说法国的罗兰·巴特则把符号学的原理全面推延到一切当代文化的领域，把符号学发展到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的新阶段，大概是符合事实的。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是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他1874年出生在德国一个犹太富商家庭，早年受业于新康德主义学派领袖海尔曼·柯亨，后来又成为与柯亨等人齐名的马堡学派的主将。1919年起，任汉堡大学哲学教授，1930年起任该校校长。后因法西斯希特勒上台，愤然去职，流亡国外，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他一生著述 120 余种，代表作是《符号形式的

哲学》（三卷）、《语言与神话》和《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在他的著作中，《人论》及近年来耶鲁大学整理出版的他的后期论文讲演集《符号·神话·文化》（1979年）两书，与文艺学、美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恩斯特·卡西尔是个开创性人物。他对符号学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研究与贡献，直接促成了苏珊·朗格提出文艺符号学的一系列见解和思想，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影响。

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1896——1985）是美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她为符号学美学——文艺符号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苏珊·朗格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哲学新解》、《情感与形式》和《艺术问题》等。《哲学新解》中有不少美学见解，为她后来专注研究文艺问题铺下了基石。《情感与形式》、《艺术问题》是美学、文艺学著作。这两部书在当代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美学方面，人们一般称恩斯特·卡西尔为30年代后兴起的所谓符号美学运动的“开路先锋”，而在美国，人们常把卡西尔与苏珊·朗格合在一起，把他们的理论称之为“卡西尔—朗格‘符号学’”。可见，苏珊·朗格也成为早期符号学美学派的代表人物。

苏珊·朗格翻译介绍了不少恩斯特·卡西尔的著作，堪称卡西尔的得意门生。她的驰名的一些书的许多内容，是在卡西尔著作的启发下写成的。这样，反过来也扩大了卡西尔学说的影响，决定了卡西尔在符号学美学、文艺符号学领域的崇高地位。

此外，美国哲学家莫里斯（Ch. W. Morris）在《记号、语言

和行为》一书中提出了“行为符号学”的概念和理论。他把符号学分成语用学、语义学和语形学三部分。语用学研究符号使用者对符号的理解和运用；语义学研究符号对实物的关系；而语形学则研究符号在整个符号系统中的相互关系。莫里斯的思想，在罗兰·巴特的这部著作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

前面我们说到，罗兰·巴特把符号学推进到“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的阶段，这是符号学的一个新进展。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这派的代表人物，除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外，还有艾柯（U.Eco）等人。

艾柯主要研究符号的暗示性隐义，而罗兰·巴特则主要总结了各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许多看法。罗兰·巴特对暗示隐义也进行了一系列引申模式分析，建议用三个层次——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的理论来描述叙事作品的结构，这对在欧美逐渐取结构主义文论而代之的“叙述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进而，罗兰·巴特又总结和发展了索绪尔、叶耳姆斯列夫等语言学家的语义学派和结构语言学派的语言学理论，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从语言系统的角度分析研究了作家的语言风格以及各种各样艺术领域和日常文化领域——衣着系统、家具系统、食物系统、汽车系统和包括电影、电视、广告在内的综合系统，从而得出了一些新鲜而深刻的结论。罗兰·巴特的理论（包括术语和概念）虽然明显地处于草创与探索期，但他已经为符号学的拓展、为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一位搞中国文学

研究的挪威朋友，在从国外给我寄这本书的同时，便在来信中讲到："罗兰·巴特是法国当代一位很有名的、有代表性的文艺科学家。"看来这评价不是偶然的。

符号学作为美学、文艺学的研究方法论，在当今苏联也得到了日渐广泛的运用。苏联美学界认为西方符号学、语义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应当批判，但从语义学角度探讨诗歌语言、审美符号的涵义及其功能，确值得研究、重视。认为语义学分析和艺术符号体系分析的一些具体方法，可以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认为"在不加以绝对化的情况下，语义学态度及其语言分析的具体方法对于理解作品具有重要意义。"①1962年，苏联首次召开了符号体系的结构研究讨论会。1964年至1968年间，又先后举行了三次符号学学术会议，讨论在美学和文艺学研究中运用符号学方法、语义学方法的可能性及其原则界限等问题。近一二十年来，苏联美学界在研究艺术的本质特征，尤其是艺术形象问题时，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继续探讨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艺术形象与科学概念的相互联系与区别，继续从价值论出发去研究艺术的审美特性，而且也开始重视从符号学角度研究形象与符号、反映与造型、艺术语言的符号体系与功能现象等问题，改变了以往研究角度比较单一或单调的局面。

苏联第三代美学家Ю·鲍列夫在他的《美学》一书第九章第二节——"作为语言的艺术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符号学"中，专门谈了"符号及其在艺术文化中的作用"和"艺

① Ю·鲍列夫：《对艺术作品的系统完整分析》，苏联《文学问题》1977年第7期。

术语言作品——艺术文化的元符号”问题。他指出，在苏联，第一个对艺术开展符号学研究的是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后来，在研究艺术符号学、认识艺术的语言符号方面，普罗普（В.Я.Пропп)、博加得列夫（П.Г.Богатрев)、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弗列依登贝格(О.М.Фрейденберг)、伊凡诺夫（В.В.Иванов）、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劳特曼(Ю.М.Лотман)、波利亚科夫(М.Я.Поляков)等学者也作出了自已的贡献。В.В.伊凡诺夫在1976年还出版了《苏联符号学发展史概论》一书。

Ю·鲍列夫认为“在艺术中，符号就是思想的具体感性基础的袒露”。① “符号的功能造成了符号关系场，要领会一个符号，必须首先知道它所代表的那个对象（符号的对象意义）并理解符号本身的意义(符号的涵义)”,② “艺术文化的符号，根据它们对人的生理感官的作用，可分为听觉符号（诉诸听觉）、视觉符号（诉诸视觉）和视听符号（诉诸两种官能）。”③ “符号是艺术篇章最基本的元素，符号构成了艺术的表述”。④ Ю.鲍列夫强调：在艺术文化符号学中，应特别注意含有语义内容的艺术的表述，注意其语言组织。并指出，在艺术作品中，艺术形象的作用相当于具有对象意义与自身含义的符号体系。但艺术过程的辩证法极为复杂，其中既有符号因素，又有非符号因素。

---

① Ю·鲍列夫：《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第485页。
② Ю·鲍列夫：《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第486页。
③ Ю·鲍列夫：《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第488页。
④ Ю·鲍列夫：《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第489页。

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М.Б.Храпченко）主张在文艺学研究中把符号学态度和文学的历史职能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符号学与艺术创作》（1973年）、《审美符号的本性》（1976年）等论文中，有个性地提出在文艺学研究中运用符号学原则的范围和途径，系统论述了审美符号的本质、结构特征及历史职能。他认为，审美符号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审美涵义的符号或符号体系（词、词组、音调、色彩、形象等）。它既区别于一般语言符号，又区别于一般的艺术形象。审美符号具有双重性，既能代表所指的审美对象，传达特定的审美情感、审美特质，又缺乏在结构上同所指物体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赫拉普钦科不同意现代符号论者把"艺术文本"当作"现代符号学的基本概念"，认为这会导致无视艺术反映生活的本质特征，抹杀艺术作品中审美符号与非审美符号的界限，混淆审美符号在不同种类和不同流派作品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他特别强调要对各种审美符号体系作具体的历史分析，这样，才能科学地揭示其真实的社会历史涵义。只有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历史主义原则，符号理论才不致于走向偏颇。面对西方新神话主义、象征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日益泛滥，面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逐渐把审美符号抽象化、神秘化，面对西方"各种符号过程在20世纪艺术中急剧增长"，赫拉普钦科说："据我看来，这首先是同这一历史时期所见的各种社会现象的神话化的加强相联系的，其次是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的异化的深化相联系的。"①

① 赫拉普钦科：《审美符号的本性》，《哲学问题》1976年第3期。

很清楚，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符号学的艺术论，或者说文艺符号学，已成为当代一种有影响的艺术哲学，一种很流行的美学理论；同样很清楚，对待符号学原理及其应用的认识，在东、西方是存在差异和区别的。

二

那么，西方现代文艺符号学理论，在它的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怎样的基本特色呢？换句话说，西方文艺符号学具有怎样的思想特征呢？

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符号学理论都把文艺看作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这是最突出的一点，是文艺符号学关于艺术本质的特殊认识。文艺符号学家把文艺作品作为一个符号整体来分析和理解，文艺作品就是艺术符号（art symbol），就是一种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表现的不是个人情感，而是人类的普遍情感，它是人类普遍情感的物质载体。“一件艺术作品往往就是一种自发的情感表达方式，即艺术家思想状态的征候（即符号——引者注）。如果它们代表人的话，很可能就表达某种面部表情，以显示人所应具有的情感。”①

（二）文艺符号学把艺术符号的认识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符号学的某些原理，强烈带有哲学认识论的意味。不过，文艺符号学不是一般地社会批评化地泛论文艺的认识作用，而是专门把文艺作品当作一个符号系统来进行认

①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美学译文》第3辑，第106页。

识作用的分析和研究。文艺符号学家的某些见解，寓意相当深远。他们不仅认为符号是真相的一个方面，而且认为符号就是真相，在符号中，主体和客体才达到完满的统一。因此，符号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意义。文艺符号学对艺术符号的重视，推动着思维科学、语言科学和脑科学的进展。

（三）文艺符号学不仅有自己的艺术本体论，有自己新的艺术观念和定义，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艺术研究方法。文艺符号学将艺术本质的探讨直接同人的本质的探讨结合在一起，力图从对人的本性的新解释中找到艺术本性的答案。艺术是解释人类经验的特殊符号形式这一文艺符号学观点，就是从人是“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这一人性论观点中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来的。文艺符号学把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神话、宗教、历史、语言、科学、艺术、工业品等，都看作是人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人的本质即表现在他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因此，一切文化形式，既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又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在艺术中同在其他活动中一样，不过是建造“一个使人类经验能够被他所理解和解释、联结和组织、综合化和普遍化的符号的宇宙”。文艺符号学的方法论，明显地反映着当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潜在影响，同时，也暴露了把人及其本性完全消融在“符号活动”中的理论局限性。

（四）文艺符号学注意了从审美经验来分析艺术的特性，并从符号学的角度，对带有审美因素和艺术特质的文艺符号特征作了深入的研究。文艺符号学家们认为，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形式，文艺符号形式同其他符号形式是有区别

的。文艺符号作为艺术作品的整体，不同于形式主义者那样专事研究艺术形式的特征，不同于“新批评派”那样从对作品的仔细阅读原则出发去专门研究艺术中语言所蕴含的各种意义，也不同于结构主义者那样从所谓深层结构中找到各种同类作品的共同模式。他们是要找出艺术符号与非艺术符号、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艺术活动与科学活动、推理性形式与表现性形式的区别。无论是卡西尔还是苏珊·朗格，都在力求从审美经验的分析中寻找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卡西尔强调审美是对形式的直观，是对形式的动态方面的关注。苏珊·朗格进一步论证形式与情感的关系，认为在审美和艺术中，形式本身具有表现性，艺术的特征正在于它是一种“表现性形式”，也就是英国批评家克莱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苏珊·朗格甚至认为“有意味的形式”乃“是每种艺术的精髓本质”，“是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事物的真谛”。① 文艺符号学家在深入分析艺术及其审美经验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艺术符号带有抽象性、不可言说性、情感性、形象性等一系列见解，对艺术的符号特征做了多侧面的考察，从而提供了以揭示审美心理奥秘为宗旨的审美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以许多有启发性的论点。《世界艺术百科全书》曾这样指出：“从最初系统地阐述移情说开始到恩斯特·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符号说，可以说是美学和艺术心理学发展的主线。现在，艺术心理学很难脱离符号学这种学说”。② 可见，符号学与美学、艺术心理学进展的关系多么密切。

① 《情感与形式》，见《美学译文》第3辑，第104页。

② 转引自《美术译丛》1982年第2期。

文艺符号学的基本特征当然不只是上面罗列的四点，还有一些方面需要归纳。比如，文艺符号学说力图从全人类文化活动的总体上来揭示艺术的本质与功能，把艺术明确视为人的“文化世界”的一部分，把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形式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就很鲜明、突出。但是，仅从我们谈到的这几点，也可以看出文艺符号学、符号学美学的个性，看出它们对开拓艺术研究空间的实际意义。

每一个艺术形象，都可以说是一个有特定涵义的符号或符号体系。为了理解艺术作品，必须理解艺术形象；而为了理解艺术形象，又必须理解构成艺术形象的艺术符号。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此，文学和艺术的符号问题，对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说来，都是不可忽视的。以前，我们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对符号学问题的研究是很薄弱的，甚至有严重的忽略，现在是应该引起重视的时候了。我们再不能排斥从符号学角度认识艺术特性和把握艺术创作规律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这里，我们不妨再具体地看一看文艺符号学如何从“人类文化哲学体系”出发研究文艺的本质及其艺术符号的特征。

卡西尔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人的本性存在于人自身的不断的文化创造活动之中。而人类创造文化则依赖于符号活动。人就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1]卡西尔从

---

[1]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以下卡西尔的论述，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书。

三个方面展开了这一论点的论述：首先，人不是生活在单纯的物理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符号世界中。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如语言、宗教、神话等等，都是符号世界的一部分，都是人类经验交织的网络，“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符号活动是人和动物相区分的一个标志，是人和文化相联结的必然中介。其次，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人还有非理性特征，还有想象、情感、宗教意识等特征。因此，与其说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不如把人定义为是一个道德理性的动物。人是在道德理性的氛围和环境中发展和生存的。再次，人不仅是物理实体、道德理性的动物，而且还是符号的动物。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都是不同的“符号形式”。因此，只有用“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由此，卡西尔认为“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的语言”，“美必然地而且本质上是一种符号”。① 他从哲学的、文化学的研究，进入到了艺术本质的研究。卡西尔不赞成艺术本质上的“模仿说”和“表情说”，也是由这种立场出发的。他认为“模仿说”本身充满矛盾，一方面它坚持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艺术家的主观性、创造性，想把二者调和起来极不容易。而从卢梭开始的“表情说”，强调艺术不是再现，而是表现情感，但情感并不是

① 转引自《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124页。

艺术的唯一和决定性的特征，只受情绪支配的产物，不一定是艺术。一个艺术家如果不专注于各种形式的观照和创造，只是专注于情感的宣泄，那就成了一个感伤主义者。他认为“象所有其他的符号形式一样，艺术并不是对一个现成的即予的实在的单纯复写。它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它不是对实在的模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艺术活动具有“心灵的能动性”。艺术也不就象科林伍德说的“就是表现某一特定情绪”，或象克罗齐说的“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艺术活动是具有“明确目的论结构”的创造过程，它带有重现和解释的功能；艺术不是直觉，因为艺术“如果没有构型，它就不可能表现”，而艺术的构型过程总离不开某种感性的媒介物，艺术创造实际上是审美体验——经验客观化、符号化的过程。面对美学史上争论久远的客观说和主观说、再现说和表现说，他认为都有片面性，难以作泾渭分明的区分，认为“帕尔泰农神殿的中楣，巴赫的弥撒曲，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莱奥帕尔迪的一首诗，贝多芬的一首奏鸣曲，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小说，都是既非单纯再现的亦非单纯表现的，在一个新的更深刻的意义上，它们都是象征的（Symbolic，亦即符号的——引者注）”。艺术作为特殊的符号形式，“既不是对物理事物的模仿，也不只是强烈感情的流溢。它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应该说，卡西尔的见解纠正了以往理论的某些偏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艺术本质认识的辩证法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我们可以指责他的阐发明显带

有康德美学思想的形式主义痕迹。

苏珊·朗格在卡西尔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文艺符号学的艺术本体论，从符号学出发，提出了与老师不尽相同的新的艺术定义：“艺术乃是象征着人类情感的形式之创造。”① 在《艺术问题》一书中，她又以大体相同的表述重申了这一见解：“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是“创造出来的表现性形式”或“表现人类情感的外观形式”。这是苏珊·朗格艺术符号论思想的核心。

苏珊·朗格曾说：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件表现性的形式，这种创造出来的形式是供我们的感官去知觉或供我们想象的，而它所表现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情感。② 在苏珊·朗格眼里，情感的含义是很宽泛的，“任何可以被感受到的东西——从一般的肌肉觉、疼痛觉、舒适觉、躁动觉和平静觉到那些最复杂的情绪和思想紧张程度，还包括人类意识中那些稳定的情调”均在情感之列。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她认为文艺不表现纯个人的情感，文艺不是“自我表现”，文艺要表现的是具有普遍性的即人类共性的情感。她在《哲学新解》一书中说过，“纯粹的自我表现是不需要艺术形式的。”③ 只有表现人类的普遍情感，才是艺术创作的任务和目的。二，文艺表现的情感是相当宽广、丰富和多方面的。人的生命的跳动，对外界产生的生理效应，如肌肉的松弛或紧张感，都可

---

① 《情感的象征符号》，见《美学译文》第3辑，第124页。

② 参见《艺术问题》，中译本第13～14页。

③ 苏珊·朗格：《哲学新解》Philosophy In A New Key，剑桥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16页。

以是文艺表现情感的对象。这样，也就拓展了普通文艺心理学所界定的情感的范围，促进了文艺反映情感世界的多样性。

但是，艺术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征兆性的东西或是一种诉诸推理能力的东西。艺术形式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形式，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艺术品就是'情感生活'在空间、时间或诗中的投影，因此，艺术品也就是情感的形式或是能够将内在情感系统地呈现出来以供我们识认的形式"。① 显然，苏珊·朗格把情感作为艺术品的意蕴，把符号作为艺术品的外观。这也就是在她心目中情感与形式的关系。因为在她看来，用不用艺术符号表现情感，正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区别的一把标尺。"一种表现形式归根结蒂是一种符号的形式"，"无论是克罗齐认为艺术表现不需要媒介的理论，还是科林伍德认为仅仅发生在艺术家头脑中的'表现活动'就是艺术作品的说法，谁只要想在'观念的表现'下去逃避符号形式，那他就既不能去研究表现的过程，也不能指出这种艺术表现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区别。但是，只要人们一旦承认一种'表现形式'归根到底是一种符号的形式，那么一些有趣的问题立刻就会出现答案。"② 正因如此，艺术的形式问题在她那里受到了更加引人注目的重视。她极其欣赏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看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她说："一旦艺术家掌握了操纵符号的本领，他所掌握

① 《艺术问题》中译本，第24页。

②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纽约1953年版，第385页。

的知识就大大超出了他全部个人经验的总和。”①

苏珊·朗格的论述发展了非语言方面的符号理论，在揭示艺术符号与语言符号的区别上比恩斯特·卡西尔更明确、完备。但她又走到把语言符号与艺术符号截然对立起来的地步，断言语言符号不能表达“主观世界”和人的“内心生活”，却又产生了新的片面性和主观化。苏珊·朗格把人的主观经验、内在生活、情感世界作为艺术表现的特殊对象，这对把握艺术的特殊性具有合理因素；认为凡艺术作品，如果它是美的，都富有表现性、象征性和符号性，也是不无道理的。但她不了解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情感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的正确关系，总是企图以前者完全代替后者，似乎美只在“表现性形式”，这就摆向另一个极端了。苏珊·朗格的符号学理论带有明显的自身矛盾。她一面强调形式的表现性是艺术的唯一特征，一面又强调艺术家对艺术是“艺术家为自己认识到的机体的、情感的和想象的生命经验画出的图画”，强调艺术家对情感生活的认识与理解，这样，她在某些西方美学家的眼中，其观点严格说来并不属于表现派，而是所谓“一种单纯的模仿的艺术理论”。②这种现象应该说也是很有趣的。

苏珊·朗格研究艺术符号的特征，主要是根据下面这段话展开的：“艺术中使用的符号是一种暗喻，一种包含着公开的或隐藏的真实意义的形象；而艺术符号却是一种终极的

---

① 《艺术问题》中译本，第25页。

② 见乔治·迪基《美学引论》，美国罗博斯—梅里尔公司1971年版，第78页。

意象——一种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言语表达的意象，一种诉诸于直接的知觉的意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性的意象，一种诉诸于感受的活的东西。因此它也是理性认识的发源地。”①这段话，至少表明艺术符号具有意象性、不可言说性、情感性、非推理性等等。这可以看作是打开苏珊·朗格文艺符号学理论的一把钥匙。

三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与卡西尔、朗格等人的理论，在内容上很不相同。相比较而言，罗兰·巴特的论述更加抽象、更加难懂。一则，这是由于罗兰·巴特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进行符号学研究的；再则，他是以法国流行的反传统小说以及各种最现代的文化现象作为符号探讨的对象。这样，就增加了他的符号学理论的艰涩性。

不过，我们只要剥去一层坚硬的理论外壳，就会发现，在罗兰·巴特符号学的论述中，透露着最新的符号学信息，预示着符号学美学发展的前景，表现着相当旺盛的理论活力。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正当一些学科——比如语言学、信息理论、形式逻辑和结构人类学——的成功为语义分析提供了新方法的时候，毫无疑问，今天集合信息的发展也把有价值媒介的广大范围授予特定的现实意义。现在，存在着一种对于符号学的需要，这不是基于某些学者的一时爱好，而是基于现代世界的历史。”这样一来，罗兰·巴特就把符号学的发展放到了更为宏大的现代社会历史的客观背景上。他

① 《艺术问题》中译本，第134页。

不是单就某一方面——例如文学艺术方面或宗教、神话方面——来论述符号学问题，而是把整个人类文化现象都纳入了符号学分析的范围。

罗兰·巴特甚至认为：符号学仍是一门未确定的学科。他的理由很简单，但也很雄辩：因为语言学虽组成了普通符号科学的一部分，但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人类的语言之外，存在着被发现的、大量的符号系统，而这些符号系统在语言理论上是远非确定的。“我们一走向社会意义多于表面意义的系统，我们就再一次面临着语言问题。物体、绘画和形象的模式可以象征（可读为符号化——引者注）是正当的，并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也是如此，但它们却从不是自发地象征；每一种符号系统都具有其语言的混合物。”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种书写文字的文化时代，处处都是语言的符号系统，这是我们符号学所不能不考虑的。单纯从语言学、语义学探讨符号学的原理已远远不够了。我们必须倒转索绪尔语言学的许多命题。我们也许会期待把公布在词义概念周围的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文体修辞学作为研究工作的整体。符号学应该应用到非语言学的对象上去。正是在这种理解的根基上，罗兰·巴特组织了自己的符号学原理体系。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首先严格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既是一种社会习惯，又是一种意义系统。”它是符号，而“符号就象硬币一样”，具有双重的价值。而“言语根本上是一种选择性的和现实化的个人规约”。语言和言语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包含的关系之中。从历史上看，言语现象总是先于语言现象；从发展观点看，一种语言是个人通过向

语言环境的言语学习而构成的。把语言从言语中分离出来是没有价值的。语言学家叶耳姆斯列夫在索绪尔“语言”、“言语”二分法上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二分法：修辞手段和习惯用法，认为它可以替换语言和言语这一对。罗兰·巴特认为这种重新划分也是有益处的。

我们应高度重视罗兰·巴特对语言和言语及其二重结构的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他的符号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石（这种说明，对一个想要创造自己风格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说来，也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我们会发现，他的整个体系构架，正是从这里生发开去的。因为他指出，语言和言语的一般范畴，“包括着整个符号系统”。

罗兰·巴特分析衣着系统——书写的服装、照片的服装和穿戴的服装——就是从语言和言语、代码和信息的二分法角度入手的。书写的服装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的形态”，“它是一种处于纯粹状态中的语言”；“被时装照片所显示出的服装是衣着系统中一种半正式化的状况”；而真实的衣服则使我们“再次发现了语言和言语之间可靠的区别”。衣服（言语）总是导致装束（语言），但装束比衣服更为重要。罗兰·巴特把符号理论延伸到非语言领域。他对食物系统、汽车系统、家具系统、电影、电视、广告和出版物等系统的符号分析，也是这样做的。

了解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还有两个极重要的概念，即符号的被表示成分（所指）和表示成分（能指）。它们成为符号分析的基本条件和手段。罗兰·巴特通过对黑格尔、皮尔斯、荣格和沃龙四位作家的对比，指出了符号术语

的分类特征。同时指出了"表示成分和被表示成分，它们的联合构成了符号"的观点，认为这是索绪尔"最高的主张"。罗兰·巴特反对仅仅把符号理解为表示成分(能指)，认为符号"是一个象看门户的两面神一样的有两方面的存在物"，是"表示成分和被表示成分的一种混合物"，表示成分组成了表达方面，被表示成分则构成了内容方面。这样一来，罗兰·巴特就把符号因素扩展到主体和客体的两方面去了。而罗兰·巴特对形式与内容这一重要哲学和美学范畴的解释，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把形式和内容都分为两个层次："一个表达的内容"，"一个表达的形式"；"一个内容的内容"，"一个内容的形式"。这不能不说是罗兰·巴特的一个发现和创造，不能不说是符号学理论上的一个独特建树。

罗兰·巴特认为符号学的符号也是被表示成分和表示成分复合的产物。一旦符号被构成了，社会就可以很好地使用它，并且好象它是专门为了使用而被创造的客体一样被论及。"因此，符号用途（很可能）具有一种人类学上的价值，因为它的确是工艺和意义被编织在一起的关系的那种组织单位"。在这里，罗兰·巴特与恩斯特·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心是相通的。他甚至预言：符号学也许被结合到一个新的科学——人类学中去。

值得注意的是，罗兰·巴特通过对语言学家雅可布逊(Jakobson)隐喻和转喻模式的分析，描绘了符号学演进的情景。根据雅可布逊的理论，"隐喻的规则适用于俄国的抒情歌曲、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作品、超现实主义的绘画、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和弗洛伊德的梦的符号。而转喻的规则适合于夸

张的史诗、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品、格里菲斯的电影（特写、蒙太奇、镜头角度的变化）和取代或压缩的与梦有关的想象”。前者，还可加上启发性的阐释、主题模式的文学批评、话语的格言模式；后者，还可加上通俗小说、报纸上的记叙文等。符号学家认为谈隐喻比谈转喻要好些，因为一个人必须用于指导他分析的元语言，本身就是隐喻的，并且必然地和作为其对象的隐喻相似，而大量的文学作品属于隐喻模式，很少、几乎没有属于转喻的文学作品。由此看出，罗兰·巴特实际上是在为西方现代派文艺提供理论依据，他是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鼓动者。他所昭示的“从语言学到符号学的演变”，其理论视角是很清楚的。

罗兰·巴特在该书的论述中还有不少新鲜的东西，例如他从差别、对立、不同点、相似点、双方的对立、多方的对立、相称的对立、孤单的对立、反义的对立、同义的对立等探讨语言符号的系统，特别是提出“对立的‘零程度’”概念，认为“零程度不是一种完全的不在，它是‘一种有意义的不在’”，“零程度”表明从“无”中创造意义的系统所掌握的能量。这些见解都是有深度的。我们在罗兰·巴特的论述中，总感觉到笼罩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语义学的浓厚的雾障，他的符号学和语言学几乎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但不难窥见，罗兰·巴特确实把符号学理论——或称原理－系统化、体系化、深入化了。他借用语言学的一些术语、概念，搭设了符号学原理的基本框架，涉及了众多的文化社会现象和领域，他的论点，多具有举一反三的性质，带有符号元科学的特色。这大概是他的理论在西方影响巨大又一重要的原因

吧。

罗兰·巴特认为“符号学研究的目的是要重新确立词义系统的作用”，因而必然与某些结构主义者的活动过程相一致。而从事这种研究，要接受一种带现实意义的原则，要有具体的方法。这些意见也是值得参考的。

除了这部关于符号学原理的专著，罗兰·巴特其他一些论著也值得注意。他在《S/Z》一书中向人们证实，读者的文化和文学经验影响着文学的实际创作，创作对文化与文学的阅读规范不是赞同就是否定。“《S/Z》既表现出与诗学的分裂，也表现出与批评的分裂。诗学被作品的基本的评价类型学(typology)取代了，而批评则由评注(Commentary)所取代。”罗兰·巴特对一般文学与个别文本之间关系的看法，与诗学所包含的这种关系大相径庭。① 罗兰·巴特明确承认，他对“阅读性的”(Lisible)和“创造性的”(Scriptible)之间的区分本身就是评价。

在《批评与真理》(Critique et vérité)一书中，罗兰·巴特论述了诗学、文学批评和阅读之间差别的性质，为结构主义立场作了辩护。在巴特看来，批评与阅读完全是两码事。阅读是一种认识作品的过程，忠实的读者无非就是一字不漏地重复作品原文；而批评则把批评者安排在离作品一定距离的位置上。批评是积极地为文本创造一种意义，而不是被动地译解作品的意义，因为作品中不存在什么单一的意义。他说，如文字只有一种（字典）意义，就不可能会有文

① 安·杰斐逊、戴维·罗比等合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116页。

学存在。文学正是建立在文字的"多重意义"基础之上的；或者换句略为不同但又正好与过去的文学批评观点相反的话来说，"一部作品之不朽，并不是因为它把一种意义强加给不同的人，而是因为它向一个人暗示了不同的意义。"①文学中批评的自我意识程度意味着不可能在批评和文学之间划清界限。因为写作本身就具有诗学和批评的双重功能。

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中，罗兰·巴特提出了与托多罗夫非常相似的、关于语言和叙述之间对应性的主张。他特别强调句子部分，认为"一篇叙事文章就是一个长句，就象每个陈述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短篇叙事文章的提纲这个道理一样"。并且，特别分析了托多罗夫忽略的一个叙述层次——"叙述方法"，即讲述故事的方法。

传统结构主义排除了用文本之外的作者或现实来解释文本的可能性，但由于它使用了以语言学类推的方法，并且创建了一套文学理论，所以，它就有了一种变语言和诗学（文学理论）为文学之起源的效果。这种情况，在罗兰·巴特的论著中是随处可见的。

《写作的零度》这部书对我们了解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美学思想也极有帮助。巴特仍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出发，论述"什么是写作"，"文体"的本质。他认为"文体作为个人的封闭步骤，与社会无关而又易于为社会明瞭"，"它是惯例的隐私部分，产生于作家的神秘的深沉处，展延于它的责任之外"。罗兰·巴特还论述了"小说的

① 安·杰斐逊、戴维·罗比等合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写作”中“简单过去时”、“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等问题，特别对古典主义诗歌和现代诗歌的语言特征做出了颇有新意的回答。考虑到论述问题的严整性，删掉了“政治写作”一节。我们在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巴特结构主义诗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具体化。

罗兰·巴特的著作，目前我国翻译介绍过来的还很少，对其思想理论体系全貌了解得还很不够。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对罗兰·巴特的东西能译介得更多些。这样，我们对符号学的认识就会更推进一步，对罗兰·巴特本人的理解也能更深一些。起码，我们会正视，西方当代的文艺学和美学研究，已经严重地被科学主义潮流所左右，传统的课题已遭冷落，实证的、自然科学化的、语言学的、语义学的倾向十分显著。这是一种时髦的风尚。而罗兰·巴特的这本《符号学美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就是当今西方有代表性的文艺学著作，这就是当今西方热门的文艺符号学、符号学美学著作。只有这样看，我们才不致产生观念上和心理上的隔膜。

如何评价文艺符号学，这是一个大问题。

应该说，文艺符号学的创立和发展，对人类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进步是有贡献的。我们当然不赞成文艺符号学或符号学美学把艺术的本质仅仅归结为符号的形式，不赞成把文学艺术全盘非意识形态化。但是，这并不否认符号学与艺术研究的关系，不否认符号及符号因素在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文艺符号学应当成为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美学和文艺学的当代形态，离开从符号学的角度阐述艺术语言及其传达问题，离开对符号在艺术中特殊作用以及创作中符号与意义相互关系的研究，离开对各种文化系统符号二重结构的揭示，是很难从不同侧面去把握艺术创造和欣赏、语言现象和非语言现象的规律的。任何艺术形象的构成，都有一个以物质传达手段客观化、对象化的过程。物质的、感性的因素与精神的、意义的因素的结合，必然带有符号的成分。每个艺术表述，都构成特定意义的符号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分析是美学和艺术理论不可或缺的。

当然，符号学理论有它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我们上面谈到的三位符号学家，他们学说的哲学根基都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对艺术中形式因素的推崇，对艺术符号演化关系的描述，都背离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因此突出地缺乏应有的现实感和历史感。符号活动不是先验的活动。人类的全部文化不是“先验的构造”，而是历史的产物。符号系统不仅是人的主体性的展现，同时也是客观世界的特殊的反映。离开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轨道，符号学的一些结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西方符号学的观点，特别忽视生活与艺术的辩证关系。苏珊·朗格曾说：从生活角度讨论文艺问题是有害的，这样会用生活的大海淹没文艺的小舟，文艺的独特性便消失殆尽了。她反对从生活出发讨论艺术，反对把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她的“情感生活”概念也是纯主观的。她说，“在我看来，艺术甚至连一种秘密的或隐蔽的再现都不是，因为很多艺术品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再现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重复

了"抽象表现论"的错误，与艺术事实不相吻合。

符号学对文艺问题（甚至非文艺问题）的研究也带有机械论、片面化的毛病。看到艺术中符号的因素，看到艺术符号的作用，看到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双重关系，特别是看到符号与情感的关系，这是有道理的。但把一切艺术—— 推广开来，一切文化 —— 都看成符号，都看成情感符号，这就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气味了。对文艺的符号问题，要辩证地、具体地说明，绝不能为了突出符号而舍弃其他，为了形式而排斥内容。形式主义的东西，人为模式化的东西，只能使人们陷入新的教条中去。

符号学文艺观摈弃对艺术问题的意识形态考察是它的根本的致命伤。这种情况，从恩斯特·卡西尔到苏珊·朗格及其到罗兰·巴特，几乎是愈演愈烈了。在他们眼里，世界简直就是符号、信息、词义、代码的组合。人文的因素日趋泯灭，社会的基因不断淘汰，使符号学在窄道上行走，几近钻进了死胡同，钻进了神秘莫测的独立王国的"牛角尖"。我们确信，符号学的一些原理，只有经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才能走向自己有生气的健康的未来。

据说，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学者那里都有人认为："表示文学和艺术的符号学观点是毫无前途的。"① 这种意见是不公允的。然而，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西方文艺符号学的见解，也是不足取的。对待符号学原理和方法，我们既不迷信，也不简单排斥。我们要把它"拿"过来，让它为我国当

① 路易斯·马多：《符号学方法》，见M.杜夫海纳主编《美学与艺术科学主潮》，纽约1979年版，第173页。

代美学研究的发展服务，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这是我们的态度，也是我们的目的。

董学文

1987年1月20日于北京大学

内容提要

罗兰·巴特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科学家。《符号学美学》作为在当代西方流行的一部美学著作，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这部著作涉及的内容广泛，作者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比照结构主义理论，首先从语言系统的角度，研究分析了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问题，进而也象征性地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各种艺术领域。作者所研究的范围，主要在于文学的语言系统以及衣着系统、家具系统、汽车系统和综合系统（包括电影、电视、广告）等范畴，并且得出了令人注意的、极富理论个性的结论。该书的探索，把符号学美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欧美文学批评和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我国，系统评介符号学原理的美学著作这还是第一部，它将会为广大的美学和文艺科学工作者提供新的理论视野。

目 录

导　言

在1916年第一次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假定：存在着符号或符号这样一门一般性的科学，而语言学仅仅是这门科学中的一部分。因此，符号学的目的在于吸收一些符号系统，而不论它们的内容和范围：绘画、姿势、音乐声响、物体和所有这些因素的复杂联系，它们构成了仪式的内容、约定的内容或公共娱乐的内容，这些如果不是构成语言的话，至少构成了词义的系统。当一些学科——语言学、信息论、形式逻辑学和结构人类学——的成功为语义分析提供了新方法的时候，如今，集体信息的发展把有意义媒介的广大范围授予特定的现实意义，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存在着一种对于符号

学的需要，这不是基于某些学者的一时爱好，而是基于现代世界的历史。

事实上仍有个问题：尽管索绪尔的思想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符号学仍是一门未确定的学科。这原因也许非常简单。当索绪尔的这一观点为主要符号学家所接受时，他认为：语言学只不过是组成了符号这一普通科学中的一部分。现在，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在人类语言之外，存在着被发现了的大量的符号系统，在数量上是远非被确定的。语义学到目前为止，已经干预了的不过是少量的事业，如公路旅游指南等；我们一旦走向社会意义多于表面意义的系统，就会再一次面临着语言问题。物体、绘画和各种式样的模式，都可以象征这一观点是正当的，并在一个大范围内也是这样，但它们却从不是自发地象征；每一种符号学系统都具有其语言的混合物。例如，在语言的混合物中，存在着一种视觉的内容，其中意义通过被复制成一种语言信息（在电影、广告、连环漫画、杂志照片等中出现）而被确认，因此，至少一部分人物画像的信息，在结构关系的词汇中，既是丰富的，又是被语言学系统所吸收的。至于说物体的集成（如衣服、食物），只是在它们贯穿语言传达的程度上，才享有系统的状况，而这种语言则（在术语的形式中）引出了它们的表示成分，并且说出了（在习惯用法或可以理解的形式中）它们的被表示成分①；我们远远地超过了从前，超过了对形象化的说明传播的轻蔑，我们已处在一种书写文字的文化时代。最后，

① 在翻译Signifiant和Signifié中，我们宁可选择英文而不选择拉丁文，甚至去掉了生硬的、复数的“Signifieds”（被表示成分）。——英译本注。

在更为一般的词汇中，理解其被表示成分可以不取决于语言而存在的绘画系统和物体系统显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领悟一种内容所意味的意义，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一种语言的个人特征：这不意味着这种意义不是被指明的，也不意味着在大量被表示成分中没有一个与语言的被表示成分不同的东西。

然而从一开始就对非语言学的内容发生影响的符号学，迟早需要根据自已的方法（在词汇的普遍观点上）来发现语言，而符号学的方法，则不仅作为传达或被表示成分的一种模式，而且也作为它们的成分。即使如此，这种语言也不完全是语言学家的语言，因为它是一种第二规则的语言，至于它的整体，则不再是符素和音素的语言了，而是涉及到其意义成为语言基础的客体或事物的话语的大量片断，这些语言，不依赖于它的话语的片断是从来不可能的。因此，符号学也许注定要被吸收进一种超语言学，这种超语言学的原料，也许是神话、记叙文、报刊文章，或者另一方面，在下面被讲述的范围内（从出版物到计划书、访问记、会谈甚至内心语言，它们都被想象的规范所统治），其原料也许是我们文明的对象。事实上，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倒转索绪尔声明的可能性：语言不是符号这种一般科学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一个专有的部分，它是作为语言学一部分的语义学，确切地说，它是包含着话语的“强大意义联合”的那个部分。根据倒转命题，我们也许会期待公布在词义概念周围的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文体修辞学中那些目前被作为研究工作的整体。

然而，毫无疑问，语言学注定将有一天要改变它的特征，语言学首先必须研究符号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假使不是确

切地把握明确的模式，那么至少也要考察它的可能与不可能。这只是在准备研究的基础上是可行的，并且，我们确实必须事先被承认：象这样的一种研究，既是缺乏自信的，又是鲁莽的。所谓缺乏自信，因为符号学的知识事先只可能是语言学知识的一个复制品；所谓鲁莽轻率，是因为这种知识必须立刻被应用于非语言学的对象，至少作为一个计划要这样做。

这里提出的原理，作为它们的唯一目的，具有分析概念的语言学摘要的性质①。关于这种概念，我们认为在它的方法上先验地足够开始一般的符号学研究。在收集它们时，研究这些观念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那些未触动的东西不是预先假定的；同样，符号学将永远被迫地紧跟着语言学的模式②也不是预先假定的。我们全都在希望，它或许使最初的（即使是暂时的）规则也能被引进意义事实的异质集合中去，以建议或说明一个术语群。而在事实上，我们想要做的事便是提供这个问题的词义的一种本质。

因此，这些符号学的原理将被组织在这样四个主要的、从结构语言学中借用来的标题之下：

1. 语言和言语
2. 被表示成分（所指）和表示成分（能指）
3. 单位语符列和系统
4. 所指意义和涵义

---

① 一个概念无疑不是一件事情，但它全然也不是一个概念的意识。一个概念是一种手段和一种历史，也就是一群在象体验这样的世界中的可能性和障碍性。见G. G. Granger：《Méthodologie économique》，第23页。——原注

② 即列维—施特劳斯〔C. Lévi-Strauss〕所强调的一种危险。见《结构人类学》法文版，第58页。——原注

这些标题将出现在双重的形式中，这可以被看出，读者也会注意到：在结构的思想中，概念的双重词义似乎是很常见的①；好象语言学家的元语言象一面镜子一样复制了正在叙述系统的双重结构；并且，当机会出现时，我们将指出，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话语中，研究杰出的双重词义也许将是有启发性的。这些科学的分类学，假如它们被很好地了解的话，将注定会提供大量关于在我们时代什么可以称为理性想象力范围的信息。

---

① 这些特征已被科恩(M.Cohen)所注意，并带有讽刺，见《Linguistique moderne et idéalisme》,in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May 1958, no.7——原注

第一章

语言和言语

一、语言学方面

1.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语言和言语（二分）的概念①是索绪尔②语言学理论

---

① “索绪尔等语言学家强调指出：应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前者是语言集团言语的总模式，后者是在某种情况下个人的说话活动”（引自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189页）。“语言可以说有两个方面：语言和言语。前者指的是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的语言系统（System of Language），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而后者则是指说话者可能说或理解的全部内容。语言是指语言的社会约定俗成方面；言语则是个人的说话。换言之，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语言是代码（code），而言语则是信息（Message）”（同上，第192页）——译者注。

② 索绪尔（F.de.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最重要的著作是《普通语言学教程》。——译者注。

的核心[1]，对于那种在语音演变、自然关联和类推[2]作用中寻求并发现历史变化原因的早期语言学来说，这当然是非常新奇的事情，并因此是一种独特规范的语言学。在创立这个著名的二分法时，鉴于语言同时带有某些物质的、精神的、心理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因素，索绪尔就从语言的这种"多种多样的和异质的"特征开始了研究，而这种语言乍看起来显示为不可分类的实体，即不能被清晰地发现的整体。[3]现在假如这种混乱从多样性的整体中消失了，那么就会被分离出纯粹的社会对象与组成它的预兆材料无关的、需要表达的语言规约[4]的系统化结构，而这些就是语言(Langue)；作为语言对立面的言语(Parole)，则包含了语言的纯粹个人部分（语音、规则用法和符号的偶然性结合）。

2．语言(Langue)：因此换句话说，一种语言是指不包括言语的语言：它既是一种社会习惯，又是一种意义系统。作为社会习惯，它绝不是一种规则，也不是某些预先策划的间

---

① 对于英译者来说，表述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语言和言语的概念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它们的外延在目前的工作中无法变得清晰。除了当语言与言语联结在一起使意义清晰时，我们一般把语言(Langue)译为"一种语言"或"这种语言"。某些言语，不管它是适用于某些人，还是适用于某些符号系统，都已被我们本不希望的那种、各异的拐弯抹角的意义翻译了。——英译者注。

② "指在语言的某种其他规则模式的影响下，语法和词汇发生变化的过程或结果，如用hisn代替his，可看作是从my：mine这个模式类推出来的。这种类推的变更，往往会导致产生语言的一些规则形式，而这些规则形式常常和语音定律(phonetic law)相抵触"（引自《语言和语言学词典》第17页）。——译者注。

③ 我们将注意到语言的第一个界说是分类学上的；它是一个重要的分类。——原注。

④语言规约：指使用某种语言的不同人所遵循的、相同的运用语言的原则。其用法上的变化，取决于共同交际系统的一致需要，或完善这个系统的需要。——译者注。

题。它是语言的社会部分，个人既不能自己创造它，也不能自己改变它；它根本上是一种集体的契约，假如一个人想要表达的话，他就必须遵守它的全部规则。况且，这种社会产物是自发的，就象游戏有它自己的规则一样，对于这些规则，我们只要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掌握它们。作为一种意义系统，语言是由某些成分组成的，其中每一种成分既是事物的特定score量的等价单位，又是一个功能较大的词语，根据区别性的规则，我们可以在这个功能较大的词语中发现其他相关的意义：从语言理论的这一点来看，符号就象硬币一样，它有一定数量的金的价值，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它可以使人们去购物，同时，它也有和其他硬币相关的价值①。社会习惯方面和意义系统方面当然是有联系的：这是因为，一种语言是一种抵制来自某个个人任意改变的（在部分任意之中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非诱导的）契约性意义系统，并且当然是一种社会习惯。

3．言语（parole）：和既是社会习惯又是意义系统的语言相对，言语根本上是一种选择性的和现实化的个人规则。第一，它由一种“结合”构成，这种“结合”是“讲话主体可以用来表现他个人思想的语言代码的结合”（这种意义引申的言语可以被称为话语②），第二，它由“使人们选择出这些结合的心理—生理机能③”所构成。例如发音，它不能和语言相混淆，这

① 见第2章第5节第1个问题。——原注。

② 话语(discourse)：“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单位的语段(text)，通常限于指单个说话者传递信息的连续话语”（引自《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104页）。——译者注。

③ 指在符号的结合过程中，个人要依据精神，即心理机能，如个人的偏好等等，还是依据生理机能，如发音必须依据发音器官等等而进行符号的选择活动，并使之现实化。——译者注。

是确定无疑的①；即使个人凭借他们自己讲话声音的高、低速度的快慢等等，也都不可能改变社会习惯和意义系统。言语的结合方面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暗示着言语是被某些同样符号的循环所构成：这是因为符号总是在连续的话语中被重演，并且，这种重演总是在一种或同一种话语中发生的（虽然这些话语由不同人言语无限差异构成）；因为言语根本上相当于一种个人规则，但又不是一种纯粹创造性的结合活动。

4．语言和言语的辩证关系：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术语当然只有在互相联系的辩证过程中，才能实现它们各自完整的界说；没有不带言语的语言，也没有在语言之外的言语。正如梅洛-庞蒂②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关系处于被确定的现实语言习惯的变化之中。布隆达尔③写道："一种语言是一种纯粹抽象的存在物，一种关于个人的规则，一种言语在无限变化的方法中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符号结构④"。因此，语言和言语处于一种互相包含的关系之中。一方面，语言是"在主体属于同一社会集团的情况下，言语实践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并且，既然它是个人特征的集体综合性产物，那么，在每一个孤立的个人层次上，它都必定留下不完善的部分，除非在"语言集团"中，一种语言是不可能完美地存在

① 语言不同于发言，因为它不仅仅包括发言，而且还包括补充语音系统的第二位系统——文字和其他代码。——译者注。

② 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Maurice，1906—)，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著有《知觉现象学》等书。——译者注。

③ 布隆达尔(V.Bφndal，1887—1942)：丹麦语言学家和语文学家，索绪尔的门徒。——译者注

④ 见《语言学规则》第1章第1节，第5页——原注。

的；除非某个人吸收语言，不然他就不可能掌握言语。但反过来说，仅仅从言语出发的语言是可能的：从历史的观点上看，言语现象总是领先于语言现象（它是造成语言逐渐发展的言语）；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一种语言存在于向环境中的言语学习的个人之中（总而言之，一个人不可能教会孩子们语法和词汇，而这正是语言）。总之，语言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真正的辩证关系。我们将注意到（一个当我们讲到符号学情景时的重要事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一种言语的语言学（至少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是这样①），因为某些言语，当它们一作为一种传达过程而被掌握时，它们就已经是语言的一部分了；后者只能作为科学的对象。现在，我们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于是否必须在学习语言之前学习言语表示怀疑，是没有价值的，这种对立的情况是不会存在的；一个人只能直接学习言语，因为言语反映语言（由于言语是“声音的”）。从一开始就想把语言从言语中分离出来的想法，也同样是没有价值的，这不是初步的工作，相反，把语言从言语中分离出来却意味着，虽然根据事实本身，却构成了意义的未肯定性。

5．叶耳姆斯列夫语言学理论：叶耳姆斯列夫②并没有抛弃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观点，但是他又用更为规范的

---

① 这一点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观点相矛盾。索绪尔认为：“我们并且可以说有一种言语的语言学。但是不要把它和固有意义的语言学混为一谈，后者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引自《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文版，第42页）。在这里，罗兰·巴特可能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的。——译者注。

② 叶耳姆斯列夫(Hjelmslev, Louis, 1899—)，丹麦语言学家，“语言单位论”的创始人。——译者注。

方法重新划分了这两个术语①。在语言本身（它始终与言语的规则相对立），叶耳姆斯列夫区分了三种发展阶段：（1）修辞手段，它是抽象形式的语言（在选择修辞手段这个术语之前，叶耳姆斯列夫曾徘徊于“系统”〔system〕、“模式”〔pattern〕和“组织”〔framework〕之间②），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就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语言(Langue)的观点。例如，它可以意味着：法语中的“r”是根据它在一种对立系列③中的位置而被规定发音的。（2）规范④，它是具体形式的语言，它虽然被社会现实的某些程度所规定，但却依然独立于这些现实之外；它将意味着：法语口语中的“r”，无论它被用什么方法来发音（但不是法语书面语中的“r”）。（3）习惯用法，它是具有流行于某个特定社会集团中的一系列习惯的语言，它意味着：在某些地区被发音时的“r”。言语、习惯用法、规范、修辞手段之间的规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规范规定习惯用法和言语；习惯用法在规定言语的同时，也同样被言语所规定；修辞手段不仅被言语所规定，而且也被习惯用法和规范所规定。因此，（事实上）它呈现为两种发展阶段：(1)修辞手段，这种理论融合了形式和语言习惯。（2）规范——习惯用法——言语这一群体，这种理论融合了

---

① （见叶耳姆斯列夫《基础语言学》，第66及以下各页——原注）

② 叶耳姆斯列夫本人曾把丹麦文、德、荷兰语的翻译者，注意他在《索绪尔杂录》（丹麦文，1913年）中所使用的术语的翻译，见该书第二章，第24—44页。并见《基础语言学》第五页，第一条。Charpente(特征)是法语中随便一种修辞手段，而“模式”(pattern)是英语的术语。但是，叶耳姆斯列夫自己在下面所举的例子中，当他抛弃了那种不是以提出更为明确的表达为目的的系统(système)时（同上，第72页，第一条），我们在这里宁可用修辞手段来代替极为普遍的专门术语：“模式”。——英译本注。

③ 指音位的几个对立系列。——译者注。

④ 规范指口头及书面语中人们所公认的标准形式。——译者注

实体①和效果②。根据叶耳姆斯列夫的语言学理论，当规范是一种纯粹的、有一定方式的抽象概念，而言语是一种个别人的凝结物（"一个短暂的记录片"）时，我们最终将发现一个新的二分法：修辞手段和习惯用法，它们可以代替语言和言语这一对概念。无论如何，叶耳姆斯列夫的这种重新划分不是没有益处的：这种划分是语言概念（隶属于修辞手段）的基本定形，并且，在有利于更加社会化的概念——习惯用法——之下淘汰了具体的言语。这种语言的定形和言语的社会化使我们能够在言语这一标题下安排所有"现实的"和"有内容的"成分，并且在语言的标题下安排所有区别的成分，这种划分的长处，就象我们将要了解到的那样，在于它改变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语言和言语二分理论特征所带来的矛盾。

6．一些问题：无论怎样的有用和丰富，叶耳姆斯列夫语言学理论的这种特征，最后仍然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只提到其中的三个为例。

第一个问题：把语言等同于代码、把言语等同于信息是否是可能的？根据叶耳姆斯列夫的语言学理论，这种等同是不可能的。格诺德（P. Guiraud）拒绝接受等同的观点，他认为：代码的规约是明确的，而语言的规约却是不明确的；但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结构中，这种等同当然是可以接受的，并且马丁内特（A. Martinet）接受了这一观点。③

---

① 实体是和语言的形式相对立的概念。形式是指语言单位的外形，实体则为语言单位的内容。——译者注。

② 见第2章第1节第3个问题。——原注。

③ 见马丁内特《普通语言学原理》，法文版第30页；英文版第33—34页。——原注。

假如我们仔细研究言语和单位语符列①（见下面，第三章）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言语，就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可以（在发音的强烈变化之外）被规定为一种（循环的）符号的（多种多样的）结合；可是，在语言自身的层次，已经存在了一些固定的单位语符列（索绪尔引证了一个复合词：maanimus〔高尚〕）。既然这里的语言是被“组合的确定程度”所构成，那么，那种把语言从言语中分离出来的做法一开始就可能是值得怀疑的。这就导致了一个关于那些自然属性仍然属于语言的（语音的）固定单位语符列的分析问题，因为它们被纵聚合②的变化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叶耳姆斯列夫把这种分析称为形态③句法）。索绪尔曾经指出过这样一种过渡现象：“可能也有一种属于语言的、而且个人也不再不得不根据自己来结合的句子的整体系列。”假如这些成规属于语言而不再属于言语，并且，假如许多符号学系统把它们运用到一个更为广大的范围得到确实的证明，那么，它就肯定是我们必须预料到的单位语符列的语言学，这种语言学将被用来研究所有强变化的成规：“写作的形式。”

最后，我们将指出的第三个问题涉及到了语言和相关性④

① 单位语符列是指词所组成的词组，即词与词之间的结合，这是一种横向组合关系，如under the tree（在树下）。——译者注。

② 纵聚合关系是与横组合关系相对的概念，它是语言中的一种垂直关系，其中每个词都和一组词处于可替换的关系中，如I may go（我可以走）、I can go（我能走）、I must go（我必须走）中的may、can、must就处于纵聚合关系中。详见第三章。——译者注。

③ 形态指词的结构、形式和类别。——译者注。

④ 相关性是指区别性。下面的“有意义”也是指此意。而“非相关性”和“没有意义”就是指无区别性。——译者注。

的关系（也就是说，语言和完全在一个单元内的有意义成分的关系）。语言和相关性有时被看作是一致的（如被特鲁别茨柯依①本人），这样，在语言之外强加的所有非相关性的成分，就是结合性变体②。不过，这种鉴定还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仍然存在着被强加的结合性变体（所以乍看起来是一种言语现象），换句话说，存在着任意性：在法语中，不是在属于音位学③范围而不属于音符④范围的情况下，语言要求l在一个清辅音（如oncle）之后发清音，在一个浊辅音(如ongle)之后发浊音。我们看到理论上的必然结果：我们是否必须接受与索绪尔的断言（“在语言中只有差异”）相反的观点，即没有区分开的成分仍然可以属于语言（属于习惯）呢？马丁内特认为是这样；弗雷(Frei)则试图把差异局限在次要音素⑤上，以使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脱离矛盾。因而，例如，P不能根据它自身而被区别开，但是，这个辅音能够根据塞音＋清音＋唇音的特征等来区别。这里，我们将不袒护这个问题；从符号学理论上看，我们将仅仅记住接受单位语符列和变体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变体是没有意义的，但仍属于“语言”，也就是属于语言。索绪尔努力预见到：固定的单位语符列（或成规）无论在什么地方被充分地发

① 特鲁别茨柯依（N.S.Trubetzkoy,1890—1938），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译者注。

② 指取决于其周围成分的某种语言、语法变体。—译者注。

③ 音位学，研究某种语言的语音和该语言语音系统中语音功能的一门学科。——译者注。

④ 音符，又称“声符”，指一些语言中文字的表音成分，与表意的意符相对。——译者注。

⑤ 音素，又称为音位，指语音中的最小单位。——译者注。

现，语言学都可以表现出一种极大的重要性，这种情况在集体语言中是可能的，并且，没有意义的变体每次都组成了表示成分（能指）①的第二级②素材，这是涵义强烈的语言中的情况③：在所指意义的层次上，变化的"r"是一个纯粹的结合性变体，不过，例如在戏剧的言语中，它表现为一个地区的口音，并因此是代码的一部分，没有"地方"的信息，就既不可能传达也不可能接受。

7. 个人习语④：在结束语言学中语言和言语的问题时，我们将指出自从索绪尔的时代就已经被孤立起来的两个附加概念。第一个就是个人习语⑤。这是"被个别说话者所说的语言"（马丁内特），或者"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个别说话者习惯的整体系列"（埃比林）。雅可布逊曾指出下面这个观点的重要性：语言永远是社会化的，甚至在个人的层次上也是如此，因为在对某一个人讲话时，讲话者总是努力说出或多或少的其他人的语言，特别是在词汇范围内受到影响（"个人特征在语言中的地位是不存在的"）。因此，个

① "表示物质实体或抽象概念（说话人对此在脑海中有一个印象）的一系列语音或文字符号。如star（星）这个词（能指，表示成分）可用来表达'明亮的天体'（所指，被表示成分）"（引自《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316页）。——译者注。

② "第二级"指第二位系统，它是指涵义方面；与作为所指意义的第一位系统相对，详见第四章。——译者注。

③ 见第4章。——原注

④ 个人习语，又译为"个人语言特点"或"个人言语"，指个别人使用语言的特点，包括发音、语法和词汇方面。——译者注

⑤ R.雅可布逊[R.Jakobson]：《普通语言学基础》，第54页。这是雅可布逊和哈勒[M.Halle]《语言基础》的第二部分。埃比林[C.L.Ebeling]：《语言组织单位》，第9页。马丁内特：《语言的一个可能性观点》，第105页。——原注。

人习语将主要地显现为一种错觉。我们将从这种观点中保持那些对指示下面事实有用的思想：（1）失语症患者的语言，这种患者既不能领悟他人，也不能接受遵守他自己言语模式传达的信息；而且，这种语言是一种纯粹的个人习语（雅可布逊）；（2）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它总是被某些来自传统——也就是来自社会——的言语模式所充满；（3）最后，我们可以坦率地扩充这一观点，并且把个人习语界定为一个语言集团的语言，所谓语言集团也就是都在同一方式上理解所有语言陈述的一群人；那么粗略地讲，个人习语就相当于我们曾经在别处试图描绘的"写作"（见《写作的零度》）。总之，我们可以说，在界定个人习语这个概念上的含糊，只能带来一种对于介于语言和言语之间的中间存在物的需要（就象叶耳姆斯列夫语言学理论中用习惯用法理论所证明了的那样），或者，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对于一种已经规范化了，但根本上仍不愿意接受定形的言语的需要，就象语言一样。

8．双重结构：假如我们同意去鉴别语言和言语及代码和信息，我们这里就必须提到一个已经被雅可布逊详尽阐明了的、名为"双重结构"的第二个附加概念；我们只能简单地这样做，因为他的说明已经被印成单行本。① 我们将仅仅指出，雅可布逊所研究的代码和信息的一般关系中某些特殊的双重结构情况，两种圆的情况和两种重叠的情况。（1）转述引语，或者称为在一种信息范围内的信息（M/M），这是间接风

① 见《普通语言学基础》，第9章。这是对演变、动词性范畴和俄文动词的说明（见《俄语语法研究项目，斯拉夫语言文学的活动范畴》——原注）。

格的一般情况。(2)专有名称：这个名称意味着某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名称是被限定的，并且代码的圆形是明显的(C/C)：约翰就意味着一个名叫约翰的人。(3)自律的情况〔"Rat〔鼠〕是一个音节"〕：这里的代码作为它自已的所指而被运用，信息与代码相重叠(M/C)——这种结构是重要的，因为它包括"解释的解释"，换句话说，它包括婉转曲折的说法、同义词和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4)演变大概是最有趣的二重结构：很多现有的例子是人称代词(你，我)——一个在语言规约和依据存在经验的契约内联合的象征语符①：因为I(我)仅仅是依靠一种语言规约规则的力量来表现它所代表的对象（因此，"我"在拉丁语中变成了ego，在德语中变成了ich，等等），但是，在另一方面，因为它指明发这个音的那个人，它也就只能依据经验涉及到发音(C/M)。雅可布逊提醒我们注意：人称代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语言最原始的层次（洪堡特②），雅可布逊关于人称代词的理论认为：人称代词指出了代码与信息之间一种更为复杂和已经成熟了的关系：在儿童的言语中，人称代词是最后被获得的成分，而在失语症患者中，它们是最先被失去的成分；它们是难于掌握的、变化的词汇。演变的理论看起来似乎已经被开拓了一点；然而，先在的(a priori)，并且对于观察代码与信息之间的抗争是收益非浅的，也就是说（对

① "语符"是指"代表一个语言实体（语言、语音特征、音位、音节、词素和词）的人造符号，这些符号在语音转写或写作系统中是约定俗成的，如一种字母表中的字母、汉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等"（引自《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314页）。——译者注。

② 洪堡特(W.Von.Humboldt,1767—1835)，德国人种学家。—译者注。

立是十分常见的），也许（这仅仅是使用一种假设），它是在这样的演变方面，就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帕恩斯(Peirce)术语中象征语符的演变方面，对于这些象征语符，我们将寻求其信息的符号学界说，而这些信息则依赖于语言的未开发领域和值得注意的文学话语的某些特定形式。

二、符号学的情景

1．语言、言语和社会科学：语言和言语概念的社会学范畴是明显的。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语言的概念和达科海姆(Darkheim)独立于个人表现之外的一种集体意识概念之间的明显类同关系，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强调了。一种关于达科海姆对索绪尔影响的描绘已经被假定了，并且已经断言：索绪尔曾紧紧地跟随在达科海姆和塔德(Tarde)间的争论之后，其语言的概念来自达科海姆，而言语的概念则是对塔德个人成分观点的让步①。但是，这个假说却不符合某些事实，因为语言学首先已经是发展了的，并且在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中，“意义系统”方面已导致了对语言学规定的一种内在分析必要性的承认，然而，这种内在性②对符号学的研究是不利的。

因此，最有发展前途的语言和言语的观点将被自相矛盾

① 见道奥兹威斯基〔W. Dorozewski〕的《语言和言语》，第485—497页。——原注。

② “内在性”指“一种描写语言的原则，这种原则不管哲学以及社会学等外界因素，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系统”（引自《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162页）。——译者注。

地发现，在（可能是第一个成为对索绪尔感兴趣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看来，这不是在社会学的范畴之内，而是在哲学范畴内被发现的。而且，他还吸取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那种作为说的言语（在其初生态中的一种有意义的意义）和口头语言（语言的一种"已经取得了的财富"，它令人想起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术语："财富"）①之间的一种对立的特征。他也通过假定扩充了下面这一观点：即某些作用是以系统为前题的②。因此，组织项目和整体结构之间的对立已经被详尽阐明了，这种对立是被逐渐承认的，并且，梅洛-庞蒂在历史学上的巨大收益是众所周知的③。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当然也已经被人类学所接受，并被详尽阐明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关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参考书目，在列维-施特劳斯④的全部著作中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应简略地记住下面这三种事实的提示：（1）作用和系统（言语和语言）的对立，这种对立从妇女对亲属关系结构发展变化和过渡的具体外观中再次被发现了；（2）对于列维-施特劳斯来说，这种对立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语言现象的学习是机械主义⑤的范畴（列维-施特劳斯关于这个术语的观点

① 见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法文版第229页；英译本第196—197页。——原注。

② 见梅洛-庞蒂《哲学体系的颂扬》。——原注。

③ 见柏奥德《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一段长的时期》，《年鉴》1958年10—12月号。——原注。

④ 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1908—)：西方公认的结构主义领袖，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著有《结构人类学》等书。——译者注。

⑤ 这里的"机械主义"指把观察作为某一情境中说话行为结果的实际活动，而不是直观地解释人熟练地使用语言的能力。——译者注。

似乎是作为与"统计主义"① 相对立的观点来运用的),并且,它是结构上的翻译;而言语现象的学习则是盖然性理论的范畴(宏观语言学②) ③;(3)最后,语言的无意识特征,在这些特征中,一个人是为了他们的言语而利用语言的,对于这些,索绪尔曾明确假定过④,并且,语言的这种无意识特征是再次被发现的列维-斯特劳斯最有独创性和最为丰富的观点之一。它规定:语言不是无意识的内容(这是荣格的原型批评理论),而是无意识的形式,也就是具有符号(象征)的作用。

这个观点类似于拉康⑤ 的学说,根据拉康的理论,里比多(Libido)自身表现为一种词义的系统,根据词义,就产生了或不得不产生了一个想象的、集体范畴的、表现的新模式,但不是依靠它的"词干",就象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做的那样,而是根据它的词形⑥ 和它的作用。或者让我们更加露骨而不是更加有条理地说,根据它的表示成分(能指)超过

---

① 这里的"统计主义"是指应用统计程序去处理语言资料的工作。——译者注。

② "宏观语言学"是指与人类各种交际相关联的言语研究领域。它不仅包括微观语言学(音系学、语法学、语义学),而且也包括象模仿和手势等"前语言"现象,以及辅助语言特征和文化行为等问题。——译者注。

③ 见《结构人类学》,法文版第230页;英译本第208—209页。——原注

④ "在创造力的活动之外,从不存在着某些预想,甚至也不存在某些熟悉的形式,或是仔细思考的形式,在规则之外,言语的根据,就是分类"(索绪尔)。——原注。

⑤ 拉康(Jacques Lacan):19世纪公认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领袖,法国人。——译者注。

⑥ "词干"与"词形"是相对的概念。前者是词汇中不属于词缀的词素统称,它表示词义而不表示语法功能;后者指一个词的形式常显示出词的形态和它与其他词的句法关系。——译者注。

了根据它的被表示成分（所指）①。

我们将从这些简洁的迹象中看到：在超语言学或元语言学②的发展中，语言和言语的观点是多么丰富。因此，我们将假定这里存在着语言和言语的一般范畴，而且包括整个符号系统；既然没有更好的概念，我们就将保持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概念，甚至当它们适用于其内容不是言语上的信息时。

2．衣着系统：我们看到，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分离再次提出了语言学分析的本质特征。因此，想要把这种分离直接地运用到那些仍然还没有被语义学理论研究的客观的、主观的或行为模式的系统，将是无益的。在这些假设系统的某些情况中，我们仅仅可以预见到：某些事实的类别将分别属于语言或言语的范畴，并且立刻在它对于符号学的运用过程中使之清晰起来，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很可能要受到修正，而这正是我们所要对它进行的工作。

例如，让我们来把握衣着系统；因为内容是用来传达信息的，所以，把衣着系统分成为三个不同的系统是必要的。

作为书写的服装，也就是说，在一本时装杂志中，依靠发音的语言所描述的时装，在时装中实质上并不存在着"言语"：因为被描述的衣着从来不与个人所掌握的时装规则相一致，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

---

① 与表示成分（能指）相对立。指用一系列语音或文字符号（表示成分）来表示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译者注。

② "超语言学"与"元语言学"是相对的。前者指某种语言中纯粹个别人的特点、姿态和手势等等；后者则是指用于分析和描写另一种语言的语言或一套符号。——译者注。

状态中的语言。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纲领，一种没有言语的语言是不可能存在的；使这里的这种事实成为可以接受的原因，一方面是时装的语言不是源于“语言集团”，而是源于提出决定、并深思熟虑地推敲代码的一个群体；另一方面，某些语言中固有的抽象概念在这里被具体化为了书面语言：（作为书写的）时装是在衣服信息层次上的语言和在文字信息层次上的言语。

作为照片的服装（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们假定它没有文字描述的重复），语言仍然从时装群体中涌出，但是，在一个完全抽象的形式中，它不再是假设的了，因为照片上的衣着总是被一个特定的妇女所穿戴。被时装照片所假定的是衣着系统中的一种半正式化状态：因为，一方面时装的语言在这里必须是从假拟为真实的衣着中被推想出来的，另一方面，衣着的穿戴者（时装照片中的模特），换句话说，一个规范的个人，他被推选为规范的普遍性，并且，他必然表现为一种固定的、缺乏所有结合自由的“言语”。

最后，作为穿戴着的衣服（或者说作为真实的衣服），就象特鲁别茨柯依所提出的那样，我们再次发现了语言和言语之间有关的区别。在衣着系统中，语言是由下面这些因素构成的：（1）某些片断、衣着的某些部分和某些“组织材料”之间的对立，它们的变化带来了意义的变化（戴着贝雷帽或戴上圆顶硬礼帽就不是一个意义）；（2）既在部分的长度上，也在其宽度上规定衣着自身内部各个片断之间联合的规则。在衣着系统中，言语包括所有混乱的组成现象（很少一些仍然保存在我们的社会中），或者个人的穿戴方法（如衣服

的号码、清洁或磨损的程度、个人的怪癖、部分之间的自由联合）。至于说到这里的装束（语言）和衣服（言语）结合的辩证关系，它和文字的语言并不相似，确切地说，衣服总是导致了装束（除了反常的情况，顺便说，反常也有它自己的意义），但是至少在今天，装束比衣服更为重要，因为衣服来自（大机械化的）快速生产的工业，而装束则来自少数群众（尽管他们的装束比妇女时装设计师所设计的装束更缺乏个性特征）。

3．食物系统：现在让我们来掌握另一个重要系统：食物系统。在这个地方，我们将毫不困难地发现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有关食物的语言是由下面这些因素组成的：（1）排斥规则（有关食物的禁忌）；（2）组织单位间有意义的对立，其类型尚待确定（例如碱和甜的类型）；（3）联合的规则，既是共时的（一盘菜肴的层次），又是历时的（许多盘菜肴的层次）；（4）发挥作用的运用仪式，也许这就象是一种有关食物的修辞学(rhetoric)。至于说到有关食物的“言语”，它是非常丰富的，它包括所有调制和结合的个人（或家庭）变化（一个人必须遵守其所在家庭的烹调术，这种烹调术受到许多习惯的支配，就象是一种个人习语）。例如，用菜肴来举例说明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是最好不过的了：某些菜肴被作了与结构有关的调制（这种结构既是民族的——或者说是地方性的——又是一定社会阶层的）。但是，根据时代和使用者，这种结构又充满了差异，就象一种语言的“形式”被自由的变化和结合所充满一样，

而这些自由的变化和结合则是讲话者为了某种特定信息所需要的。语言和言语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这里当然类似于我们在文学的语言中所发现的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因此，更为确切地说，语言是习惯用法，也就是说，它是许多人言语的沉淀，而这种言语的沉淀则组成了有关食物的语言；可是，个人创新现象也可能在其中取得一种习惯的价值。在某些情况中，与在衣着系统中所发在的情况相反，这里所失去的是一个决定群体的行动：有关食物的语言只能露骨地从一种集体的习惯用法或者从一种纯粹的个人言语中被引申出来。

4. 汽车系统，家具系统：带着任意性，结束了这个被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区别所揭示的情景问题，我们将提到影响两种客观系统①的更多一些迹象，确实，这两种系统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在决定群体和生产群体之中，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依赖物：汽车和家具。

在汽车系统中，语言是由全部形式和组织材料组成的，其结构特定地被样品间的相互比较所确定（不取决于它们的大量"复制品"）；而言语的范围则是非常狭窄的，因为对于顾客的特定情况而言，选择一种模式时的自由是很受限制的：它只能涉及到两种或三种模式，并且在这些模式的每一种式样、颜色和装配范围内。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许将改变汽车作为客体的观点，而变成为汽车作为社会行为的观点；那么，在汽车的操纵过程中，我们将发现在客体习惯用法上

① "两种客观系统"，即指前面讲的衣着和食物系统。——译者注。

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通常组成了言语方面。因为在这种情况中，使用者不可能对模式具有直接的作用，也不可能结合起它的组织单位；其解释的自由，在发展的习惯用法中被及时发现了，并且，为了使它成为现实的，在解释自由的范围内，从语言中所涌出的“一些方式”就必须被某些实践所传达。

最后，下面一个系统——关于它，我们总是喜欢说一个术语，那就是：家具系统。它也是语义学的对象：它的“语言”不但被作用上相同片断的对立所构成（如书橱的两种式样、床的两种式样，等等），其中的每一种都根据其风格而拒绝不同的意义，而且，其“语言”也被在一间房子层次（布置）上不同组织单位的联合规则所构成；而它的“言语”不是被使用者可能引进一个组织单位内的无意义变化所构成（例如，被笨拙地修理了的一个成分所构成），就是被把家具片断联合在一起的自由性所构成。

5．综合系统：至少在属于集体信息范围的这些系统中，最为有趣的系统是不同实体被衔接在一起的综合系统。在电影、电视和广告中，判断力是以绘画、声音和文字组成的群体的协调作用为条件的。因此，在电影、电视和广告中，决定哪些事实属于语言、哪些事实属于言语，这将是过早的，因为，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发现在每一种综合系统中的语言是固有的，抑或仅仅是在综合系统中有自己地位的许多辅助“语言”混合成的语言是固有的，另一方面，这些辅助语言还没有被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语言学的“语言”，但还不知道绘画的或音乐的“语言”）。

至于说到报刊①，它可以被合理地认为是一种自发的、有意义的系统，甚至当我们以它的写作成分为限时，我们几乎仍然是完全不了解那种似乎在报刊中扮演着一种本质角色的语言现象：言外之意，也就是第二规则意义系统的发展，换句话说，这种系统寄生在严格意义的语言之中②。第二规则系统也是一种“语言”，在这个系统中，言语现象、个人习语和二重结构都得到了扩充。因此，在这种综合的或涵义的系统中（两种系统的特征不是完全相同的），甚至在普遍的和假设的时装中，决定什么属于语言、什么属于言语是不再可能的了。

6．第一个问题——各种意义系统的起点：语言和言语的符号学范畴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与语言学模式不再被遵循并且必须改变的观点相一致。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各种系统的起点，并因此接触到语言和言语之间最为辩证的关系。在语言学模式中，没有任何不经过言语实践就进入语言的现象 但反过来说，如果不从“语言的宝藏”中吸取养分 言语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不可能履行其传达信息的功能）。这种过程，至少不完全地在一个象食物系统那样的系统中被发现了，尽管个人的新方法可以使它成为语言现象 但是 在更多的其他符号学系统中，语言不是被“语言集团”所详尽阐明，而是被一个决定群体所详尽阐明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最大限度的符号学语言内，符号真正是“任意性的”，这一点是可以掌握的，因为，在人工的服装中，符号被一种片面的决定

① “报刊”，总称，还包括广播及电视新闻报道。——译者注。

② 见第4章。——原注。

所供给①；事实上，这些被组合的语言，也就是"词的技能"。使用者遵循着这些语言，并根据它们描述信息（或"言语"），但这与他们的推敲没有任何关系。在系统起点（和系统变化的起点）上的决定群体，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限制；它也许是一个高度的、有限制的技术统治（时装，汽车工业）；它也可能是一个特别散乱和无个性特征的群体（统一家具的生产，现成的中档商品范围）。可是，人为的特征并不能改变信息的规定本质，并且在系统和习惯用法之间保存着大量的辩证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尽管它对使用者施加影响，但有意义的"契约"依然被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所遵守（不那样的话，使用者就会被用一种特定的"不合群"来标志；那么，除了他的怪癖之外，他就不可能再表示什么了）；第二，作为决定的结果而被详尽阐明了的语言，不是完全自由的（"任意的"）。它们是以集体的决定为条件的，至少要通过下面这些作用：（1）当新的需要紧跟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时（部分欧洲国家服装对现代非洲国家的推销；在工业和城市国家中，迅速供应原料的新模式的诞生）；（2）当经济必需品带来了某些原料的消失或增长时（例如人工的纺织品）；（3）思想意识限制了形式的发明，并使之服从于禁忌，也就是说，使之合乎"规范"。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决定群体所推敲的，也就是说，词的技能，仅仅是功能经常扩大的词汇，而这些扩大的功能则是时代想象力的共同范畴。因此，个人的新方法被（来自有限群体的）一种社会决定所凌驾，而这些社会决定依次涉及到了一个最后的意义，这个意义乃是人

① 见第2章第4节第3个问题。——原注。

类学上的意义。

7. 第二个问题——各种系统中"语言"和"言语"的比率：就容积而论，语言和言语观点的符号学范畴所显示出的第二个问题集中在比率上了，而这种比率，在一些系统中，可能在"语言"和与之一致的"言语"之间被确定了。在文字的语言中，在作为一群有限规则的语言和被这些规则的标题所支配的、并且在其变化中实质上并没有受到限制的言语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大的平衡。在每一种容积中，食物系统仍然提供着一种重要的差别，这一点是可以被推测到的，因为在烹饪的形式中，方法和结合在解释上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汽车系统或家具系统中，结合变体和自由结合的范畴是很小的：在模式及其"效果"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小的范畴——至少是被习惯自身所承认的所谓范畴。这些是言语贫乏的系统。在一个特殊的系统中，如文字的时装系统，言语甚至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自相矛盾地说，我们这里正在处理一种没有言语的语言（就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语言只是因为它被语言学的言语所支持才有可能存在）。

这个事实遗留下了一个问题，即：假如存在着没有言语的语言，或者带有一个范围极为狭小的言语的语言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修改索绪尔那种认为语言除了是一种差异的系统外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中，作为纯粹的消极方面，语言不可能在言语之外被掌握）。并且，配成"语言"和"言语"这一对及一个"第三

者”——预示的成分，即一种提供词义（必不可少的）支持的物质或实体。在一个象“一件或长或短的衣服”这样的片语中，“衣服”仅仅是对完全属于衣着语言的变化（或长或短）的支持——一种在一般语言中所不知道的特征，其中，既然声音直接地被认为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就不能被分解成为一种无活动力的成分和一种语义学成分。这将导致我们在（非语言学的）符号学系统中认识到三种（而不是两种）阶段：物质阶段、语言阶段和习惯用法阶段。这当然允许我们在“效果”的范围之外解释某些系统，因为首要成分保证存在着语言的物性质；而且，这样一种修改好象更有道理了，因为它可以被创造性地发展：假如在这样一种系统中，语言需要的是一种物质（而不再是言语），那是因为，它们与人类语言的起源并不相同，它们的起源一般说来是实用而不是意义。

第二章

表示成分（能指）

和被表示成分（所指）

一、符　号

1. 符号的分类： 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术语中，被表示成分（所指）和表示成分（能指）是符号的组成部分。符号这个术语是在一些很不相同的词汇中被发现的（从神学的词汇到医学的词汇），而且，其历史也是相当丰富的（从《圣经·福音书》一直发展到控制论），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符号这个术语才变得非常不精确了；因此，在我们回到索绪尔所采用的这个术语之前，

我们必须从纯理论的领域来谈一谈，在这个纯理论的领域内，该术语虽然不精确，但它却占有一个位置，就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根据不同作家的任意选择，符号被放置在和它具有类似关系和不同关系的一个术语系列之中：预兆(signal)、标志(index)、图象(icon)、语符(symbol)、象征(allegory)①，它们是符号(sign)的主要竞争对手。首先，让我们来说明这些术语的共同成分：它们当然全都提供给我们两种关系物(relata)之间的关系②。因此，这个特征不能用来区别这个系列中的那些术语，为了发现意义的变化，我们将不得不求助于另一些特征，它们将在一种交替的形式中（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形式中）被强调：（1）这种关系暗示或不暗示关系物中某一种的内在表现；（2）这种关系暗示或不暗示关系物间的类推作用；（3）两种关系物（刺激物及其反应）间的联系是直接的，还是不直接的；（4）这种关系恰巧是某一关系物侵犯另一个，抑或反之；（5）这种关系暗示或不暗示某一关系物和使用者有依据存在经验的联系③。无论这些特征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有记号的还是没有记号的），在这个领域内的每一个术语都被与其邻近术语区别开了。下面这点必须要补充说明：这个领域的分析从一个作者到另一个作者是不相同的，这是一个产生词汇矛盾的事实；我们从有特征的影响范围和四个不同作者所运用的术语的表

① 这些术语的中文意义实际上是很接近的，如signal也可译为"标志"，而symbol则与sign在"符号"这一意义上相同。——译者注。

② 关于这点，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了："除了本义被判断力所承担外，一种符号还使人想起这个符号自身着的另一些事物。"——原注

③ 见"演变和象征语符"，第一章第一节第八个问题。——原注。

格中，这些很容易地一眼就能看出，这四个作者是黑格尔（Hegel）、皮尔斯（Peirce）、荣格（Jung）和沃龙（Wallon）(提到某些特征,无论是有标记的还是没有标记的,在某些作者中可能都是不存在的）。我们看到：词汇的矛盾根本上对标志有影响（例如皮尔斯,对他来说,标志是依据存在经验的,而对于沃龙来说,则不是这样），而且，词汇的矛盾根本上对语符也有影响（例如，对于黑格尔和沃龙来说，在语

	预兆(signal)	标志(index)	图象(icon)	语符(symbol)	符号(sign)	象征(allegory)
1.内在表现	沃龙－	沃龙－		沃龙＋	沃龙＋	
2.类推			皮尔斯＋	黑格尔＋ 沃　龙＋ 皮尔斯－	黑格尔－ 沃　龙－	
3.直接性	沃龙＋	沃龙－				
4.适当性				黑格尔－ 荣　格－ 沃　龙－	黑格尔＋ 荣　格＋ 沃龙　＋	
5.依据存在经验的方面	沃龙＋	沃　龙－ 皮尔斯＋		皮尔斯－ 荣　格＋		荣格－

符的两种关系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类推关系——或者存在着“诱导”关系,而皮尔斯则认为不是这样；再者,比如对皮尔斯来说,语符不是依据存在经验的,而反过来对于荣格来说则是这样)。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矛盾——它们在这个表格中是被竖直地读出来的——是被很好地阐明了的，更精确地说，我们看到了这些矛盾是在同一作者从一个术语到另一个术语的意义变化中来互相补偿的。这里的这些变化可以被水平地读出：例如，语符在黑格尔的术语中是类推的，而与之相对

的符号则不是；并且，我们假设它不是在皮尔斯的术语中，因为对于皮尔斯来说，图象可以承担这一特征。现在，让我们来总结并且讨论符号学中的这些术语（这象镜子一样反映了我们研究的问题和方法的主要分析观点），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这个范围内的这些术语仅仅从它们和另外一个术语（通常是成对）的对立中获得意义；并且意味着，假如这些对立被保持住的话，那么，意义就是明确的。预兆和标志，语符和符号，它们都是两种不同作用的术语，它们之中的每一对都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而被对比，当它们被沃龙这样做的时候，这些词汇是最为清晰和最为全面的（图象和象征被限制在皮尔斯和荣格的术语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沃龙来说，预兆和标志组成了一个缺乏内在表现的关系物的群体，而在对立的语符和符号的群体中，这种表现是存在的；况且，语符是直接和依据存在经验的，而标志则不是（它仅仅是一个结果）；最后，在语符中，内在表现是类推的和不充分的（基督教的精神超出了十字架的界线），而在符号中，这种关系物之间的关系是诱导的和强制的（在词汇"公牛"与一个公牛的肖像之间没有类推作用，这种类推作用完全被它的关系物的性质所掩盖了）。

2．语言学的符号：在语言学中，符号的观点没有引起某些邻近的术语之间的竞争。当索绪尔寻找并指明意义的关系时，他直接淘汰了语符（因为这个术语包含诱导的思想），而这有利于他界定为一个表示成分（能指）和一个被表示成分（所指）（在一本时装杂志的左页和右页）联合的符号，

要不然，就是有利于他界定为一个传声图象和一个概念间联合的符号。可是，直到他发现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这两个术语为止，符号的概念仍然是含糊的，因为，这仍然有把符号变成为等于表示成分（能指）这个术语的倾向。索绪尔就想不惜任何代价地废除这个术语，在犹豫于客体(sôme)和记号(séme)、形式和内容、图象和概念之间以后，索绪尔选定了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它们的联合构成了符号。这是最高的主张，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它，例如，存在着一个把符号理解为表示成分(能指)的趋势，其实，这是一个象看门户的两面神一样有两个方面的存在物。至少对于索绪尔、叶耳姆斯列夫和弗雷来说，（重要的）结果是这样的，既然被表示成分(所指）尤其作为符号，那么，语义学①就必须是结构语言学②的一部分，而对于美国的机械论者来说，被表示成分（所指）则是必须从语言学中排除掉而留给心理学的内容。自从索绪尔以来，语言学符号的理论已经被双重发音原理所充实了，其重要的原理已经被马丁内特指明为他给它所制定的限定语言的标准。因为在语言学符号之中，我们必须分清“有意义的组织单位”和“区别性的组织单位”，其中，每一种有意义的组织单位都具有一种意义（它是“词汇”，或者更严格地说，它是“符素”③），并且，它构成了第一位发音方法；区别性的组织单位是形式部分，但它却没

---

① 研究语言的意义的学科。——译者注。

② 从广义上说，它是指把语言作为本身具有语音特点、语法和词汇的一个独立系统的任何一种语言的研究；从狭义上说，它指的是布拉格学派等欧洲语言学家的研究方法。——译者注。

③ “符素”，指语素、词素，与音素相对。——译者注。

有一个直接的意义（说它是"声音"，倒不如说它是"音素"），并且，它构成了第二位发音方法。这是说明人类语言经济①的双重发音方法，因为这种双重发音方法是一个有影响的、使语言发展减低速度的装置，例如这种装置允许美国的西班牙语产生，但却仅仅带有21个区别性的组织单位和100,000个有意义的组织单位。

3. 形式和内容：因此，符号是一种表示成分（能指）和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混合物。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组成了表达方面，而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则组成了内容方面。关于这两方面中的每一种，叶耳姆斯列夫都介绍了一种对于符号学（并不再仅仅是语言学的）符号研究可能是重要的特征。根据他的理论，每一方面都包含两个层次，形式和内容；我们必须坚持这两个术语的新限定，因为其中的每一个术语，都具有一种有影响的词汇经历②。形式可以被语言学详尽地、赤裸地和有条理地描述（认识论的标准），而不必依靠超语言学的前提；内容是语言现象方面的整体层次，它不可能不依赖超语言学的前提而被描述。既然这两个方面都依靠表达方面和内容方面而存在，那么，我们就具有了四个层次：（1）表达的内容，例如，语音的、有音节的和非功能性的内容，它们是语音学的范畴，而不是音位学的范畴；（2）表达的形式，由纵聚合的和句法的③规则组成（要注意，同一

① "经济"，指减少语言中繁词赘言，以构成有效交际所必需的各种特征。——译者注。

② "词汇经历"指某个词汇的历史发展过程。——译者注。

③ 指横组合关系。——译者注。

形式可以有不同的内容，一个是语音的，另一个则是用文字表示的）；（3）内容的内容：例如，它包括感情的、思想意识的、或者被表示成分（所指）中明白易懂的抽象方面、它的“实在”意义；（4）内容的形式：根据语义学标记的存在或不存在，它是被表示成分（所指）自身的形式组织①。最后一点是难于理解的，因为在人类语言中，把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分开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符号学范围内，形式和内容的再分在下面的情况中，可能将变成为更为有用和更容易掌握的，这些情况是：（1）当我们处理被表示成分（所指）在某种内容上被现实化了的系统时，这种系统与其自身系统中的这种情况并不相同（就象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书写服装的情况）；（2）当某个客观系统包括不是直接地和功能地作为有意义的内容时，但在某些层次上，又可以把它作为功利主义的内容：如一盘食物的用途，可以意味着生物刺激，又可以充当食物。

4．符号学符号：这也许使我们预见到跟语言学符号有关的符号学符号的本质。象语言学符号的模式一样，符号学符号也是由被表示成分（所指）和表示成分（能指）所复合成的（例如，在公路旅行指南中，信号灯的颜色是一种运动的规定），但是，在符号学符号的内容层次上，它与语言学符号不同。许多符号学系统（客观、姿态、形象化绘画等等）②都具有一种

① 尽管它是非常根本的，但这里特定的分析影响着下面的被表示成分（所指）：符号、语符、标志、信号。见前面，第2章第1节第1个问题。——原注。

② 形象化绘画的情形将被抛弃，因为假如不是有意义的话，绘画直接就是信息。——原注。

其本质不是为了表现的表达内容；它们是每天都被运用的客体——在一种被诱导的方法中，被社会集团用来表现某些事物；例如，衣服作为保护品而被加以运用，食物作为营养品而被加运用，甚至它们也被当作符号来运用。我们建议把这些其起点是功利主义的和可使用的符号学符号称为"功能符号"（sign—functions）。功能符号证明了一种双重倾向，而这种倾向必须被分开掌握。在第一种阶段（这种分析是有效的，而且，这种分析并不真是暂时性的），功能变为充满意义的东西了。这种语义性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具有了社会，每一种习惯用法就都变成了它自己的符号；一件雨衣的用途是为了避雨，但这种用途不能与大气关系这种符号相分离。既然我们的社会仅仅产生了标准化和正常化的客体，那么，这些客体就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模式、一种语言的言语，一种有意义形式的内容的现实化。重新发现一种没有意义的客体，一个人将不得不想象一个绝对是临时凑成的家具，这件家具不带有任何与现存的某种式样相似的地方（列维-施特劳斯曾指出：修补范畴本身就是对意义的寻求）：这实质上是不可能在某些社会中得到证明的假说。习惯用法的普遍语义性是极为重要的，它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当它是可以理解的时候外，不存在着任何现实性，并且，它终将导致社会学和社会伦理学的结合。但是，一旦符号被构成，社会集团就可以很好地使用它，并且论及它，好象它是为了使用而被制作的客体：一件皮大衣好象仅仅是为御寒服务而被描述的。这种经常性的功能一点也不依赖于第一种（实质上是纯观念的）功能，相反，为了存在，它需要一种第二规则的语言：

事实上，因为这种被反复描述的功能的确与第二种（隐匿的）语义制度相一致，而这种制度，是属于涵义规则的。因此，功能符号（很可能）具有人类学的价值，因为它被确定为把工艺的和有意义的关系编织在一起的那种组织单位。

二、被表示成分（所指）

1．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本质： 在语言学中，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本质所引起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真实”的程度上；然而，所有人都同意强调这个事实，即，被表示成分（所指）不是“一个事物”，而是这个“事物”的内在表现。我们已经看到，在沃龙所限定的符号中，表现的特征是符号和语符（与标志和信号相对）的有关特征。通过把被表示成分（所指）看作为一个概念，索绪尔清晰地标志出了它的内在本质：“牛”这个词的被表示成分（所指）不是动物的牛，而是它的内在表现（在其后关于符号本质的论证中，我们将证明这一理论重要性）①。但是，这些论述仍然带有心理学的特征，那么，斯多葛学派②的分析也许将被更好地予以考虑③。斯多葛学派的学者们仔细区分了φαυτασια λoylkη′（内在表现）、τυγχανόν（现实事物）和λeκτόν（发音）。被表示成分（所指）既不是内在表现，也不是现实事物，而宁可说是发音；

① 见第2章第4节第2个问题。——原注。

② 斯多葛学派，公元前4世纪创立于雅典的哲学派别。——译者注。

③ 见《语言学规则》，第3章第1节第27个问题。——原注。

作为既不是意识规则，也不是现实事实的被表示成分（所指），它可能仅仅在意味的过程中，被一种类似同义反复的方法界定：它是使用这个符号的人所预定的"事物"。这样，我们又碰到了关于抽象作用的限定：被表示成分（所指）是符号的两种关系物之一；使表示成分（能指）与被表示成分（所指）相对立的仅有差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媒介物。这种情况在符号学中是根本不可能不相同的，例如，在客体、绘画、姿态等系统中，因为它们是有意义的，也就涉及到了除非符号学被表示成分（所指）可以被语言符号所接受，才有可能通过它们而被表现的那些事物。再如，一个人可以断言：一件特定的毛线衫可能导致秋林中的散步；在这种情况中，被表示成分（所指）不但被其衣服的表示成分（能指）（这件毛线衫）所催化，而且也被（在掌握它时有很大帮助的）言语片断所催化。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同构异素体(isology)，由此，语言支配着它的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以至于分离它们和区别它们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抛弃非同构异素的系统（它必然是混合物），被表示成分（所指）可以被简单地与表示成分（能指）放在一起。

2．语言学被表示成分（所指）的分类：我们怎样才能将被表示成分（所指）分类呢？我们知道，在符号学中，这种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相当于从内容中孤立出形式。在语言学表示成分（能指）可能被涉及到的范围内，有两种分类可以被猜想到。第一种是形式上的分类，利用概念（并不纯粹是区别性的）的"现实性"内容来分类，这是霍里格

(Halling)和沃特伯格(Wartburg)有序集合理论中的情况,也是特瑞尔(Trier)使人更加信服的全社会范畴中的情况,以及马荽热(Matoré)词典编纂范围内的情况。但是,根据结构语言学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分类(特别是霍里格和沃特伯格的那种分类),仍然存在着缺陷,即过分地依靠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形式。要想成功地创立一种真正的、形式上的分类,一个人就将不得不重新组成被表示成分(所指)的对立方面,并且,要在对立面的每一种中,都成功地使一种有关的、可以替换的特征孤立起来①:这种方法已经被叶耳姆斯列夫、索朗森(Sörensen)、皮埃托(Pyieto)和格雷马斯(Greimas)提出来了。例如,叶耳姆斯列夫把一个象"mare"(牝马)这样的符素分析成为两个较小的、有意义的组织单位:"Horse"(马)+"female"(雌性的),这些组织单位可以被替换,并因而常常重新构成新的符素("pig"〔猪〕+"female"〔雌性的〕="Sow"〔母猪〕,"horse"〔马〕+"male"〔雄性的〕="stallion"〔公马,种马〕);皮埃托指出在"vir"(男人)中的两个可以替换的特征"homo"(人类)+"masculine"(男性);索朗森把亲属关系的词汇归类为一种"基本的"结合("father"〔父亲〕=male parent〔双亲中男性的〕,"parent"〔双亲〕=first ascendent〔第一个祖先〕),但是,这些分析中却没有一种被继续发展下去。最后,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根据某些语言学家的理论,被表示成分(所指)不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它仅仅于预表示成分(能指),而且

① 这就是我们试图努力为符号与语符所做的工作。见前面第二章第一节第一个问题。——原注。

要记住，语义学的分类存在于语言学的范围之外①。

3．符号学被表示成分（所指）：结构语言学，不管它是怎样的先进，仍然没有详尽阐明一种语义学被表示成分（所指）的形式分类，也就是说，它仍然还没有阐明文字被表示成分（所指）的形式分类。因此，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猜想到：现在提出一个符号学被表示成分（所指）的分类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选定重新提出要了解纯理论的范畴。那么，我们将仅仅提出三种观察来研究一下。

我们的第一种观察，涉及到符号学被表示成分（所指）的现实化模式。这些符号学的被表示成分（所指）既可以同构异素地存在，又可以非同构异素地存在；在后一种情况中，通过发音的语言，它们既被一个词所接受（如“周末”〔weekend〕），又被一个词组所接受（如“在乡间漫步”〔Long walk in the country〕）；因此，掌握它们是很容易的，因为，分析者不强迫它们接受他自己的元语言——但也是很危险的，而且，还因为他们不断地干预语言自身的语义学分类（这是语言自身所不知道的），而不去干预在所观察的那个系统中有其自己基础的一种分类。时装的被表示成分（所指），甚至当它们被杂志的言语所催化时，也不一定象语言的被表示成分（所指）那样被分类，因为它们并不总是具有同样的“尺度”（这里是一个词，那里是一个句子），在第一种同构异素系统的情况下，被表示成分（所指）与同一模式的表示成分（能指）不同，它不具有物质化作用，因

① 今后采用格雷马斯所提出的特征将是适当的：语义学的＝涉及到内容，符号学的＝涉及到表达。——原注。

此，一个人不能掌握它，除非通过强加给他一种元语言。例如，某个人可以向一些人提出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关于把提供给他们的一段音乐归结为少量用语言表现的被表示成分（所指）（痛苦的、忧郁的、厌恶的，等等）的意义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些代替单段音乐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文字符号，它应该被一个单个的、无价值的人所选定，它将暗示着没有文字的详细分析，并且也没有隐喻的细小变化。在前一例中，从分析者那里涌出，而在后者则从系统本身涌出的这些元语言，大概是合情合理的，这些元语言至今仍构成了被表示成分（所指）的分析，或者意识的分析、盖然性的分析；它在符号学研究项目中的地位，至少将不得不在理论上被加以限制。

我们的第二个观察涉及到符号学被表示成分（所指）的范围。一个系统的被表示成分（所指）整体（曾拘泥于形式），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功能；现在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是可能的了，符号学强大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它传达信息，而且也在于它部分地相重迭；当它们确实是有关工作与节日、活动和空闲之间大级别对立的表现时，被表示成分（所指）在衣着系统中可能部分地和它在食物系统中相同。因此，一个人必须预见到全部的意识形态种类，而这些种类，则为具有特定同步性的所有系统所共有。

最后——这将是我们的第三个观察——我们可以认为：在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一种练习和技能的素材，相当于表示成分（能指）（词汇）的一种系统；这些被表示成分（所指）的群团，对于部分系统的消费者（换句话说，对“读者”）来说，它暗示着不同的理解程度（这是根据他们

“文化”的差别），而这也说明，根据个人的影响，同一个“词汇”（或者作品中较大的组织单位）怎样被不同地解释，除非不再属于一种特定的“语言”。一些词汇和一些被表示成分（所指）的主体也必然能和决定于作品或多或少“深度”的上述个人同时存在。

三、表示成分(能指)

1．表示成分（能指）的本质：表示成分（能指）的本质粗略地使人想起和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本质一样的研究：它纯粹具有关系物的性质，它的界说不能与被表示成分（所指）的界说相分离。仅有的差别在于表示成分（能指）是一个媒介物：对于它来说，某些物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方面，对它来说，这些物质是不够充分的，而另一方面，在符号学中，表示成分（能指）也可以被一种特定的事物所传达：这就是词汇。表示成分（能指）的物质化，使它更需要清楚地区别物质和内容：一个内容可能是不足取的（在内容的内容情况下）；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说表示成分（能指）的内容永远是物质的(如声音、物体、形象)。在符号学中，我们将不得不处理不同种类的物质被综合在一起的复杂系统(如声音和画面、物体和文字，等等)，把所有的符号都聚集在一起也许是适当的，因为在象征符号的概念之下——文字符号、绘画符号、姿态符号、雕刻符号都是象征符号，它们是被完全相同的物质所表现的。

2．表示成分（能指）的分类： 表示成分（能指）的类别，从严格意义上说，只不过是系统的结构组织。我们已经做了的工作是，依靠对比替换语段，把那种在研究素材层次上所透露的信息整体构成的“无限”信息分成为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①，然后把它们组成纵聚合的类别，最后，再把连结这些组织单位的横组合关系进行分类。这些工作是我们将在第三章处理的，它们是符号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里，我们预先考虑了在谈到它们时的观点②。

四、词　义

1．有意义的相互关系： 符号是一段（两面的）③音响，一个（两面的）视觉物，等等。词义可以被设想为一种作用；它是支配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的规则，一个其结果是符号的规则。这种特征，当然仅仅有一种分类上的（并不是现象学上的）价值：第一，因为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的联合——就象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不排除语义学的规则，因为符号也是从其环境中取得其意义的；第二，或许因为，在语义的作用中，思想不是通过结合而是通过分割才能发展④。的确，词义（semiosis）不兼备单方面的本质，它不结合两个术语，因为非常确切的原因是：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同时既是术语也

① 见下文，第3章第2节第3个问题。——原注。

② 见第3章：单位语符列和系统。——原注。

③ 指表示成分和被表示成分。——译者注。

④ 见第2章第5节第2个问题。——原注。

是关系。这种含糊使得词义的一些绘画表现得有些笨拙，但这种工作对于某些符号学的话语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来注意下面的尝试：

1) $\frac{Sr}{S_d}$①：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论证中，符号表现为在深度上和在一种语境中的纵直范围：在语言中，被表示成分（所指）简直是落后于表示成分（能指），并且，它仅仅可能通过后者而被加以研究，虽然，一方面，这些存在于空间的隐喻绝对地失去了词义的辩证本质，而另一方面，符号的“定好了契约”的特征，只是对于明显的非连续性系统才是令人满意的，就象语言那样。

2) REC：叶耳姆斯列夫选定了一种纯粹绘画的艺术作品：有一种存在于表达（E）方面和内容（C）方面之间的关系（R）。这个公式使我们能够节俭地，并能在隐喻的歪曲范围之外去解释元语言或派生词系统在表达方面的关系（REC）②。

3) $\frac{S}{s}$：曾被拉波兰茨（Laplanche）和利克雷尔（Leclaire）所注意的拉康，他却运用了一种形态化的文字，这种文字在两点上不同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表现方法：〈i〉表示成分（S），它是普遍性的，是由多种层次的链③（隐喻的链）

---

① Sr，即Signifier，表示成分（能指），Sd，即Signified，被表示成分（所指）。——译者注。

② 见下文，第4章。——原注。

③ “链”和“选择”这两个概念表示两条轴，各种语言单位都按这两条轴排列。“链”指的是各成分的“水平”序列或线性序列（也就是横组合关系），“选择”指的是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结构，按“垂直”方向排列（即纵聚合关系），见第3章。——译者注。

所组成；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仅仅具有一种不定的关系,并且,仅仅在某些寄托的意义上,它们才是相一致的；(ii)表示成分(能指)(S)和被表示成分(所指)(s)之间的界线有它自己的意义(这当然不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的意义)；拉康再次提出了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抑制问题。

4) $S_r \equiv S_d$：最后，在非同构异素的系统中(这就是说，在这个系统中，被表示成分(所指)通过另一个系统而被现实化了)，在一种相等的形式中(＝)，但不是在一种同一的形式中(≡),它所提供的关系当然是合理的。

2．语言学中的任意关系和诱导关系：我们已经看到，所有那些关于表示成分(能指)是被表示成分(所指)的一种媒介物的观点都可以被说明．那么，什么是媒介的本质呢？在语言学中，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讨论，首先，是关于术语的讨论，因为关于主要论题的所有这些讨论，可以说都是清晰的(这也许将不是符号学中的情况)。从人类语言的事实出发，索绪尔曾谈到过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之间的一种任意关系，发音的选择不是被意义强加给我们的(牛不能决定牛的发音，因为无论如何牛的发音在不同的语言中是不同的)。本温埃斯特(Benveniste)曾提问于这个词的这种倾向：什么是表示成分(能指)和作为被表示成分(所指)的“事物”(发音的牛和动物的牛)之间关系的任意性①。但是，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甚至对于

① 见E·本温埃斯特：《语言学符号的本质》,《通则语言学》第1章，1939年。——原注。

索绪尔来说，符号也不是“事物”，而是事物（概念）的内在表现；发音和表现的结合是一种训练的结果（例如法语的学习）；这种结合——它是词义——决不是任意的（因为没有一个法国人能自由地改变它），反过来说，它确实是强迫的。因此，它被建议去说明：在语言学中，词义是非诱导的。顺便说一下，诱导的需要仅仅是局部的（索绪尔讲到了一个相关的类推作用）：从被表示成分（所指）到表示成分（能指），一个特定的诱导作用存在于（限定的）拟声构词的情况中，就象我们不久将看到的那样，而且，同样地，一个符号系列每次总是被舌头通过对复合构词法或者派生构词法的特定原型的模仿所构成：这就是所谓相称符号的情况：pommier（苹果树）、poirer（梨）、abricotier（杏树），等等，一旦在它们的词根和后缀上诱导的需要被确定，那么，在它们的复合构词法上，就显示出了一种类推作用。因此，我们将概括地说明：在语言中的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之间的联系，其本质上是契约上约定的，而且这个契约是集体的，它在一个较长的暂时内被铭记（索绪尔说：“一种语言永远是一种传统的东西”），而且，它注定要必然地被采纳；同样，列维-施特劳斯也详细说明了语言学的符号是任意的先在(apriori)，而不是非任意的后在(aposteriori)。这个讨论使我们保持了两种不同的术语，而它们在符号学的范围内将是有用的。我们将说明，当一个系统的符号不是被公约所供给，而是被单方面的决定所供给时，那么，这个系统是任意的：符号在语言中不是任意的，而在时装中则是任意的；并且，我们也将说明，当一个符号的被表

示成分（所指）和它的表示成分(能指)之间的关系是类椎的时候，这个符号就是诱导的（布依森 Buyssens ）曾提议，作为适当的术语，内在的义子① 相对于诱导的符号，非本质的义子相对于非诱导的符号)。因此，存在着某些任意的和诱导的系统以及另一些非任意的和非诱导的系统，这将是可能的。

3．符号学中的任意关系和诱导关系：在语言学中，诱导被限制在派生构词法部分或复合构词法部分；在符号学中则反之，它将使我们接近更为普遍的问题。一方面，在语言学之外的系统中，诱导被发现是可能的，在这些系统中，诱导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将不得不用任意一种方法规定与非连续性特征相一致的类推作用，这种非连续特征到前为止，对词义来说仍然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在这之后，还要注意当表示成分（能指）作为类推物时，纵聚合系列（其中词汇是少数的和不连续的）可能怎样地被规定，这也许将是“绘画”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它们的符号学远非是被规定的。另一方面，一个符号学的目录将透露出混杂系统的存在是很可能的，因为这其中既包括非常宽泛的诱导，又包括渗透到第二位的、非诱导的诱导，也就是说，仿佛符号经常使它自己参与诱导和非诱导之间的斗争。从某些程度来说，这已经是语言的最大“诱导”范围的情况了，即拟声构词法。马丁内特曾指出：拟声构词法的诱导被

① 意义和内容的单位，与作为形式的音素、语素或字素相对立。——译者注。

一种双重发音的浪费所陪伴（如ouch〔痛啊〕，它仅仅依赖于第二位的发音方法，以取代双重发音的单位语符列“it hurts”〔痛啊〕）；但是，例如表现痛的拟声词不是精确地和法语的（aie）以及荷兰语的（au）相同。这是因为：事实上，这里的诱导简直是服从发音模式的，而这种发音模式，当然根据不同的语言而不同；这中间有一种根据数的类推的饱和。在语言之外的未肯定系统，比如蜜蜂的“语言”，它展示了同样的歧义性：蜜蜂采集蜂蜜的舞蹈含糊地具有一种类推的意义；在可采集蜂蜜的地方被且率地诱导（被食物的方位所诱导），但是，在一个八条腿外形上扭动的舞蹈中，确实是非诱导性的（它不能表示一个很远的路程）。最后，作为这样一种不确定范围的最后一个例子①，某些广告中的商标纯粹是由“抽象的”（非类推的）形式所构成的；可是，它们可以“用绘画表现”一种特定的感觉（例如一种“力量”），这种感觉和被表示成分（所指）有一种类似关系。伯列特牌卡车（Berliet）的商标（一个被箭头横切的圆形），就一点也不“模仿”力量。的确，一个商标怎么能“模仿”力量呢？它只能是通过一种潜在的类推来暗示力量；而同一形式的多种解释在一些会意文字中被发现了（例如汉语）。

因此，类推和非类推的共存似乎是无可非议的，甚至在一种单一的系统中也是这样。就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既然意义在于发音，那么，在没有努力使类推和非类推的共存这种折衷系统化的情况下，符号学就不能以承认这种折衷为满足，因为它不能接受一种连续性的区别。这些问题还仍然

① 另外一个例子是公路旅游指南。—— 原注。

没有在最小单位上被加以研究，并且，提出它们的一般性概括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词义经济学的主要原则是可以被领悟到的，例如，在语言中，（相关的）诱导在第一位（有意义的）发音方法层次上，采用了一种特定的规则：假如这样的话，那么，“抽象的”就被一种特定的归附所支持，这种归附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谈及的“先在”的、任意的归附；反之，另一些系统则可以从诱导走向非诱导，例如，列维-施特劳斯引自《原始思维》一书中塞诺佛（Senofo）入会仪式中仪式偶像的姿态。因此，在更为普遍的、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符号学层次上，在类推的圆形性和非诱导的圆形性之间，开始出现一种圆形性是极为可能的：存在着一种双重的倾向（每一方面都和另一方面互补），这种双重现象使得非诱导的圆形性归附，并且使诱导的圆形性理智化（也就是说，开拓它）。最后，一些作者确信为类推这个术语的竞争者：数，在其自身最纯粹的形式中——二重的形式中——是特定生理学进程的一种“再现”，假如看和听都是真的，那么，在最后的分析中，它通过任意选择而发挥作用。①

五、意 义

1．语言学中的意义：我们曾经说明，至少已暗示，在“符号自身中”论述符号，如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之间仅有的联系，完全是一种任意的（尽管是合情合理的）抽象概念。总之一句话，我们必须掌握符号，不再是通过它的“复合”方法，而是通过它的“装配”方

① 见第3章第3节第5个问题。——原注。

法，这就是“意义”的问题。索绪尔在一开始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观点的重要性，但是，甚至早到他的第二部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写作时开始，他就已经越来越专心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了，并且，“意义”对于他来说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概念了，最终，它变成了比词义（它不是同样广泛的）更为重要的概念。意义和语言（作为言语的对立面）的观点有一种很亲近的关系；它的功能是从非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语言学，并且使它更为接近经济学；因此，它是结构语言学的中心问题。索绪尔通过观察认识到：在绝大多数的科学中，没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并存。①天文学是一种共时性的科学（虽然天体在演变）；地质学是一种历时性的科学（尽管它可以确定固定的状况）；历史学则主要是历时性的科学（一种经历的系列），尽管它可以延续一些“画面”的时间。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其两个方面都具有一个平等份额的科学：经济学（它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经济历史学）。索绪尔接着说道：上述的经济学适用于语言学。这是因为：在两种情况中，我们正在处理两种不同事物之间平衡的一种系统：工作和报酬，一个表示成分（能指）和一个被表示成分（所指）（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称之为词义的现象）。但是，在语言学中，同样也在经济学中，这种平衡不是被孤立起来的，因为假如我们改变其词汇中的一个，整个系统就会根据改变的程度而发生变化。因此，对于一个符号来说，下述的存在一定是可能的，一方面，交换不同的事物（工作和报酬，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在不同的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第115页，英译本第79—80页。——原注。

事物之间进行比较也是可能的。一个人可以用五法郎的纸币去交换面包、汤或者一张电影票，但是，一个人也可以把银行发行的钞票同十法郎或五法郎的纸币进行比较，等等；同样道理，一个"词"也可以被用来同一种思想（也就是同某些不同的事物）进行"交换"，但是，它也可以和另一些词（也就是同某些相同的事物）互相比较：在英语中，"羊肉"（mutton）这个词仅仅从它和羊（sheep）的共存之中导出它的意义；意义也只有达到词义和意义的双重决定的极限时才真正是固定的。因此，意义不等于词义；索绪尔认为：它来自"一段语言的可易情况"。意义甚至比词义更为重要；"一个符号所包含的大量思想或语音成分比用另一些符号围绕在它周围的时候更缺乏重要性"①；假如我们已经认识到，意义已作为列维-施特劳斯理论中关系相同观点的基础和分类学原理的基础的话，那么，意义就是一个发音的句子。因此，由于索绪尔详细地区别了词义和意义，我们就可以明白：假如我们回复到叶耳姆斯列夫语言学理论的（形式与内容）层次，那么，词义则带有了一点内容的内容，而意义则带有了一点其形式的内容（羊肉〔mutton〕和羊〔sheep〕在纵聚合的关系中是作为被表示成分〔所指〕的，并且当然不是作为表示成分〔能指〕的）。

2．发音：为了说明词义和意义的二重现象，索绪尔用一张纸来说明类推作用：假如我们把一张纸撕开，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不同的部分（A、B、C），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一种与它相邻的部分有关的意义，而另一方面，这些部分中的

① 显而易见，索绪尔不是在横组合的连续方面上，而是在潜在的、纵聚合的限制上，或者是在联合的范围之内，考虑了符号的比较。——原注。

每一部分都有被同时撕开的一个单数页和一个双数页（A—A′，B—B′，C—C′）：这就是词义。这个比喻是有用的，因为它把我们带进了一种意义结果的一般性概念：不再作为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之间的、纯粹的相互关系，而或许在实质上，作为同时被撕开的两个无定形的集团的一种规则，而这两个无定形的集团，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它是两个“浮动的王国”。例如，索绪尔猜想到：在意义、思想和发音的（纯粹假设性的）起源上，组成了两种浮动的、易变的、连续性的和相似的内容集团；当一个人同时并且在一闪之间把这些撕成为两个集团时，意义介入了。因此，（产生的）符号是发音(ariticuli)；因而意义是一种每一方面都含有混乱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实质上是一种区域。语言是发音和思想之间一种居中的客体：当同时分析它们的时候，语言存在于联合起来的二者之间。而且，索绪尔提出了一个新的直喻：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象两个附加的层次，一个象空气，一个象水；当大气的压力变化时，水的层次就被分成了波浪；同样的道理，表示成分（能指）也被分成了发音。一张纸所表现的意义和波浪所表现的意义，使我们能够强调一种对于符号学分析来说极为重要的事实，即：语言是发音的领域，而意义则超出了所有被撕开了的纸片的范围。因此，这将是必然的结果：在符号学的工作前景中，建立客观对象的词汇远远不及再次发现人们强加给这些客观对象的现实性发音；观察不清晰的前景和或许是理想的前景，我们可以说，符号学和分类学，虽然它们还没有被完全传播，但是，它们也许意味着将被结合到一种新科学中去，这种新科学就是 arthrology，也就是分配科学。

第三章

单位语符列和系统

一、语言的两个轴

1. **语言学中的横组合关系和关联关系**①：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学中词汇之间的关系，可以显示在两个方面，其中的每一方面都产生了它自己的特征意义；而这两个方面与思想活动的两种形式相一致②（这个概念后来被雅可布逊所采纳）。第一个方面就是单位语符列；单位语符列是符号的结合，它有一个支持它的空间。在发音

① “关联关系”是索绪尔的术语，指纵聚合的关系。——译者注。

② 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第170页及以下各页，英文版，第122页及以下各页。——原注。

的语言中，这个空间是直线的和不可倒置的（它是"讲话的"链）。两种符号不可能同时被发音（与众不同的是：它再次进入了人类生活）；这里的每一个词都从它和在先的与随后的词的对立① 中取得它的意义；在言语链中，词汇确实是在实存的情况下被联合的；适用于单位语符列的分析活动就是划分。

第二个方面就是关联（假如我们仍然保持索绪尔的术语的话），同话语（横组合方面）相比，同时具有某些意义的组织单位，是在记忆中被联合的，并因而在可能被发现的多种多样的关系中组成群体："education（教育），这个词可以通过它的意义——教育或训练——并通过它的发音——educate（教育；动词）、educator（教师，教育〔学〕家；名词），或者 application（适用；名词）、vindication（证明；名词）②"而被联合。每一个群体都组成了一个潜在的记忆系列，一个"记忆的仓库"；在每一种系列中，不同于在横组合层次上所发生的，在这里，词汇是在不存在的情况下被联合起来的；适用于关联合的分析活动就是分类。

横组合方面和关联方面是被一种密切的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关于它，索绪尔曾通过下面的直喻来表达：每一种语言的组织单位都象是某个古代建筑中的一根圆柱，这根圆柱处在与建筑的其他部分相邻接的一种现实关系（横组合关系）中，例如，柱的下楣。但是，假如这个圆柱是多利亚式的，它就引

---

① 即语言环境。——译者注。

② education的发音是[edju(:)'keiʃən]，educate为['edju(:)keit]，educator为[illegible]的发音为[æpli'keiʃən]，vindication为[,vind'keiʃən]。请注意它们发音上的相同部分。——译者注。

起我们把它同其他的建筑学上的规则——爱奥尼亚式的，或者科林斯式的① ——相比较，这是一种潜在的替换关系（关联关系），这两个方面是在这样一种方法中被联合的：除非通过依次地研究从关联方面所获得的、新的组织单位，不然，单位语符列就不能“进行”。自从索绪尔以来，关联方面的分析经历了不可忽视的发展；它最初的名字已经被改变了：今天我们不是说关联方面，而是说纵聚合方面②，或者，就象我们现在这里将要作的那样，将它称之为系统方面。关联方面显然和作为一种系统的“语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单位语符列则更为接近言语。在这里运用一种辅助术语也是可能的：横组合的关系是叶耳姆斯列夫语言学理论中的“关系”，是雅可布逊语言学理论中的“邻近”和马丁内特语言学理论中的“对比”；系统的关系则是叶耳姆斯列夫语言学理论中的“相关关系”，是雅可布逊语言学理论中的“相似”和马丁内特语言学理论中的“对立”。

2．雅可布逊语言学理论中的隐喻和转喻：索绪尔曾经暗示：横组合方面和关联方面（对我们来说，也就是系统方面）可能相当于符号的两种内在活动形式，这就变成了离开语言学研究范围的一个课题。在现有的一段特殊论述中③，通过把（系统规则的）隐喻和（横组合规则的）转喻的对立运

① 多利亚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是古希腊的三种不同的建筑风格。——译者注。

② 纵聚合关系语言项：模式，作为一种模式——词形变化——而提出的一个词和词尾变化的片语。——原注。

③ 参见雅可布逊：《普通语言学基础》第五章。——原注

用到非语言学的语言之中，雅可布逊采纳了这个范畴：因此，将存在着隐喻模式的和转喻模式的“话语”，这两种模式都不暗示其中之一的排他性运用，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单位语符列和系统对于话语来说，都是必要性），但它们却暗示着两种模式之中一种的优势。隐喻的规则（通过替换的联合而占支配地位）适用于（根据雅可布逊的理论）俄语的抒情歌曲、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作品、超现实主义的绘画、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雅可布逊把这些电影中所添加的电影画面的渐隐和电影中真正的隐喻同等看待）和弗洛伊德(Freudian)关于梦的符号。而转喻的规则（横组合关系居统治地位）适合于夸张的史诗、现实主义流派的记叙文、格里菲斯(Griffith)的电影（特写、蒙太奇、镜头角度的变化）和取代的或压缩的、与梦有关的想象。关于雅可布逊所举的例子，还可以附加一些：在隐喻方面，可以加上启发性解释（通过替换而使用定义）①、主题模式的文学批评、话语的格言式模式；在转喻方面，可以加上通俗小说和报纸上的记叙文。让我们来注意雅可布逊随后的一个意见：分析者（在现在这个例子中是符号学家）谈到隐喻比谈到转喻时的准备要好些，因为一个人必须运用指导他分析的元语言，这种语言自身就是隐喻的，并且必然地是和作为其对象的隐喻相似的；的确，有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属于隐喻的，然而却几乎没有属于转喻的文学作品。

3．符号学的情景： 雅可布逊通过话语中占优势的隐喻

① 这是非常普通的两极分化，因为事实上，隐喻和定义不能被混淆。——原注。

模式和转喻模式的观点所说明的前景展望，向我们展示了从语言学到符号学的演变。因为发音语言的这两个方面也必定存在于另一些有意义的系统之中。虽然单位语符列的组织单位——它是一种区别工作的结果——和对立物的目录①——它是一种分类的结果，它们二者不能被先验地界定，但是，它们却仅仅可以作为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之间一种普遍的对比替换检验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在少数几种符号学系统还没有指明横组合组织单位的情况下，或者，在它们还没有指明横组合组织单位所引起的纵聚合变化的情况下，构成单位语符列和系统方面是可能的（见表，第60页）。这两方面是语言的两个轴，并且，符号学分析的主要部分就存在于有关每一个轴被记录下来的事实的区分之中。从横组合的区分开始工作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工作大体上提供了同样在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分类其组织单位的工作；可是，当我们碰到一个我们并不了解的系统时，从经验地得到的少数几个系统开始研究，并且，在研究单位语符列之前研究系统，也许是更为适宜的；但是，既然我们这里正在处理纯理论性的成分，那么，我们就将遵循逻辑学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从单位语符列走向系统。

二、单位语符列

1．单位语符列和言语：我们已经看到（见第一章第一节第六个问题）：言语的本质（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

① “对立物的目录”，即系统。——译者注。

是横组合的，的确因为除了发音的丰富之外，它还可以被规定为（循环的）符号的（各种各样的）结合：口语的句子是单位语符列的真正的模式，因此，单位语符列和言语有着非常接近的类似点是肯定的。现在，对于索绪尔来说，不可能存在着一种言语的语言学，那么，单位语符列的语言学也必然是不可能的吗？索绪尔感觉到了困难，并且，他小心翼翼地用各种方法详细地说明单位语符列不能被看作是一种言语现象的原因：第一，因为存在着固定的单位语符列，习惯用法阻止我们用任何方法去改变它（喂！结果会怎么样呢？），并且，它超出了言语结合自由的范畴（因此，这些固定的单位语符列变成了纵聚合组织单位的种类）；第二，因为言语的单位语符列根据有规则的、属于语言的形式而被构成（例如，unget—atable〔不容易到达的〕是在unattainable〔难到达的〕、unforgivable〔不可原谅的〕等等之后而被构成的），因此，存在着一个被句法处理的单位语符列形式（这是叶耳姆斯列夫语言学理论中的术语），而句法，换句话说，它是单位语符列的“语音”变形①。但是，这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单位语符列和言语在结构上“接近”这一重要事实，因为它不断地提出问题以便加以分析，但同样地——反过来说——也因为它制定了一个结构上的解释，以便提供有涵义的话语的某些“归附”现象。因此，单位语符列和言语的这种接近关系必须被小心地保存在记忆之中。

2．非连续性：单位语符列自身呈现在一种“链”的形式

① “语音的”，它属于语言——作为言语对立面的语言。——原注。

<table>
<tr><th></th><th>系统</th><th>单位语符列</th></tr>
<tr><td>衣着系统</td><td>一堆部件，部分或最小单位，它们不能同时在主体的同样部位上被穿戴，并且，其变化与衣服意义上的某种变化相一致：无檐女帽——有带户外软帽——头巾。</td><td>在不同成分的衣服的同样风格中相并列，女裙——女衬衫——夹克衫。</td></tr>
<tr><td rowspan="2">食物系统</td><td>一组具有类似点和不同点的食物，其中，一个人在一种特定意义的意图上选择盘子中的食物：正菜的模式、烤肉的模式或者甜食的模式。</td><td>在一顿饭中，选择盘子中食物的真止次序：这就是菜单。</td></tr>
<tr><td colspan="2">一个餐厅的“菜单”可以使这两个方面现实化：如水平地读正菜，与系统相符合，竖直地读菜单，则与单位语符列相符合。</td></tr>
<tr><td>家具系统</td><td>一群单件家具的“风格”变化（如一张床）。</td><td>在同一地方，家具的不同部件相并列：床——衣橱——桌子，等等。</td></tr>
<tr><td>建筑系统</td><td>一个建筑中一种单个成分风格的变化，屋顶、阳台、大厅等等的多种多样的模式。</td><td>在整个建筑层次上最小单位的次序。</td></tr>
</table>

之中（例如言语的流动）。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见第二章第五节第二个问题），意义可能仅仅起因于一种发音，也就是起因于表示成分（能指）层次和被表示成分（所指）层次之间一种同时发生的区分；语言简直是划分现实性（例如，颜色的连续性范畴被逐字地化为一种非连续性的词汇系列）。因此，某些单位语符列引起了一个分解的问题：尽管它还是连续性的，但是，除非它被发音，它仍然不能作为一种意义的媒介物。我们怎么能划分单位语符列呢？这个问题和每一种符号系统一起再次出现了：在发音的语言中，存在着无数关于这个术语本质的讨论（实际上，也就是关于其“范畴”的讨论，以及关于某些符号学系统的讨论），在这

里，我们可以预见到许多困难。的确，存在着一些基本的、非连续性符号很强大的系统，比如公路旅游指南的非连续性，为了保险起见，它必须相互区别开，以便立刻被领悟；但是，或多或少地在一种现实情况的类推表现中被发现的绘画的单位语符列，它们对于划分来说，却有着无数的困难，而这也许就是系统几乎永远被发音的言语——它把系统所不具有的非连续性方面赋与系统——所重演的原因（比如一张照片的魅力）。尽管有这些困难，单位语符列的划分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工作，因为它必须抛弃系统的纵聚合组织单位；事实上，单位语符列的真正界说是被一种必须被划分的内容所构成的①。单位语符列，当它占有言语的形式时，它显示为一种"无尽的语段"，在这种无尽的语段中，一个人该怎样布置有意义的组织单位呢？也就是说，该怎样布置构成单位语符列的符号界线呢？

3．对比替换语段：在语言学中，对"无尽语段"的划分是依靠"对比替换语段"来实现的。"对比替换语段"，这个起作用的概念已经在特鲁别茨柯依的语言学理论中被发现了。然而，早在1936年召开的国际语音学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叶耳姆斯列夫和尤德尔(Udall)就已经用它现在的这个名称详尽阐明了这个概念。"对比替换语段"是由人为采用的一种表达(表示成分〔能指〕)中的变化所构成的，并且，它也由这种变化是否带来了内容(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的相关变化

① 曼德巴特(B.Mandelbrot)曾根据非连续性的理论，把语言的发展十分正确地比作空气原理。——原注。

所构成的。事实上，这种观点是要创造一种人为的关系相同，也就是说，是要在一种“无尽语段”的观点上，创造一种双重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以便检验两种表示成分（能指）的可易性替换依据事实本身是否作为两种被表示成分（所指）的可易性替换的一种结果。假如两种表示成分（能指）的对比替换产生了被表示成分（所指）的对比替换，那么，在服从于语段的单位语符列的片语中，一个人可以确信他已经掌握了一种横组合的组织单位，即第一种符号已经从主体中被删掉了。这种工作在被表示成分（所指）研究工作的一开始就自然可以被相互补足地处理：例如，假如在希腊语的一个实词“二”中，“二”的观念被“一些”的观念所替换，那么，一种表达的变化就可以被获得了，而且，这种变化的成分也因而被获得了（偶数的标记和二者以上数目的标记）。可是，某些变化并不能带来对立方面的变化：因此，叶耳姆斯列夫区分了对比替换①，这种对比替换从它的替换之中产生了一种意义的变化，它改变了表达方面，而不是内容方面（如poison〔毒物〕和poisson〔毒物〕），反之亦然（如bonjour〔早安〕和bonchour〔唱诗班〕）。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实：对比替换通常首先是被应用到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的，因为表示成分（能指）是不得不被划分的单位语符列。一个人可以依赖于被表示成分（所指），但是，它们完全保持了形式上的东西：被表示成分（所指）不是被它自己的外表提出来的，而是被其“内容”的意义提出来的，但是，它纯粹地作为表示成分（能指）的一种标志：它寄托于表示成分（能指），所有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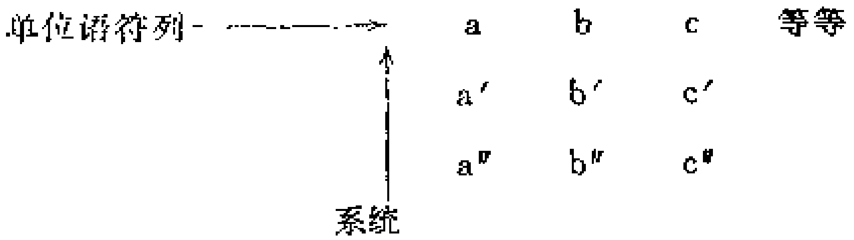
① 叶耳姆斯列夫：《语言学基础》，第103页。——原注。

都是这样。在另一些词汇中，在一般的对比替换语段内，一个人可以使用被表示成分（所指）的形式（其对立的意义与其他被表示成分〔所指〕有关），而不是它的内容，"词义之间的区别是有用的，而词义自身则是没有重要性的"（本列维茨〔Belevtich〕）。对比替换语段大体上使我们通过等级识别了有意义的组织单位，这些组织单位在一起构成了单位语符列，于是，准备好这些组织单位的类别，就可以进入纵聚合关系语言项；需要说明的是：在语言学中，只要分析者具有一些有关他所分析的语言意义的知识，那么，他的分析就是可能的。但是，在符号学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其意义是不可知或是不确定的系统：谁能相信从次等面粉的面包转变为精小麦的面包，从无檐软帽转变为有带户外软帽，我们可以把一个被表示成分（所指）转变为另外一个被表示成分（所指）呢？大概符号学将在这里发现一些规定的替换和一些元语言的替换，这将提供给我们对于对比替换十分需要的被表示成分（所指）；关于烹调术的文章或者时装杂志（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非同构异素的长处）；在其他方面，我们将不得不更为耐心地观察某些变化和某些循环是怎样首尾一致地产生的，就象一个面对着一种自己所不知道的语言的语言学家那样。

4．横组合的组织单位：对比替换语段原则上①提供了有意义的组织单位，也就是说，单位语符列的片语具有一种必要的意义；目前，这些仍然是作为横组合的组织单位，因为

① 必须是原则上，因为我们必须抛弃第二位发音的区别性组织单位。见下文，同一章。——原注。

它们还没有被分类；但是，它们也已经作为系统的组织单位了；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是潜在的纵聚合关系项的一部分：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仅仅从横组合理论的观点来观察这些组织单位。在语言学中，对比替换语段提供了组织单位的第一种模式：即有意义的组织单位，其中的每一种都具有一种意义方面和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也就是符素，或者运用一种更为确切的术语：词汇，它们自身是由词位①和词素②相配合而成的)；但是，由于人类语言的双重发音现象。这个被应用到符素上的第二位对比替换语段，它带来了组织单位的第二位模式现象，即区别性的组织单位(音素)③。这些组织单位在它们自身中并没有意义，但是它们仍然在意义的产生过程中扮演着它们的角色，因为它们之中任何一个的对比替换都带来了一种意义的变化，这是因为，符素是(从一个清音符号到一个浊音符号的对比替换，并且导致了从“poisson”到“poison”的演变中“poisson”和“poison”的)一种基本构成成分④。

在符号学中，预先猜测每一种系统中将通过分析才能被

① 即词汇的单位。——译者注。
② 指最低一级的语法单位。——译者注。
③ 见第2章第1节第2个问题。——原注。
④ 有意义组织单位的横组合划分问题在一种新时装中，已经被马丁内特所把握了。——原注。

发现的横组合组织单位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将满足于预测三种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综合系统的存在，这种综合系统在它们一开始时，就已经把许多单位语符列结合在一起了：一种客观系统，比如食物系统或衣着系统，可以适当地被一种语言学的系统所替换（例如法语）；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就具有了一种衣着的单位语符列，或者一种食物的单位语符列，以及一个描述它们自己的（衣服或菜肴通过语言而被详细地叙述的）、书写的单位语符列（言语的链），这两种单位语符列的组织单位必定不相符合：食物系统的单位语符列和衣着系统的单位语符列的组织单位可以被一种书写的组织单位集团所表现。我们将论及的第二个问题，在符号学系统中是由符号作用的存在所引起的，换句话说，是由从一种特定的习惯用法中产生、并依次被这种用法合理化了的某些符号的存在所引起的①。与语音的内容立即作为有意义的、并仅仅是作为有意义的人类语言相反，绝大多数的符号学系统或许都包含着一种除了作为有意义的（面包被用来滋养，衣着被用来保护）之外的其他功能的成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些系统中，横组合的组织单位是复合的，并且，它至少适当地包含了一种对词义和变体（如或长或短的裙子）的支持。最后，某些系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也许会遇见某些简直是"四散"的系统，其中成分的无活力空间，处处支持着那些不仅仅是非连续性的而且是分离的符号：公路旅游指南中的道路符号——就象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现的一样——被缺乏词义（公路或街道的片断）的长长的延伸所分离开；

① 见第2章第1节第4个问题。——原注。

那么，一个人可以谈及作为（临时）死亡的单位语符列①。

5．**结合的约束**：对于每一种系统来说，一旦横组合的组织单位被限定，那么，剩下来的工作就是：发现根据单位语符列而被决定的结合规则和排列规则；语言中的符素、一种特定的装束中多种多样的衣着、一个菜单中所表明的盘子里的菜肴、标明一条街道的公路符号，它们彼此都在把客体遗留给某种约束的规则中成功了：符号的结合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是“言语”所意味的自由，它是在监督之下被遗留下来的“自由”（这就是它再一次被陈述的原因，一个人不能拒绝带有句法的单位语符列）。事实上，排列是单位语符列真正的状态：“单位语符列是某些组织的异种功能的符号；它（至少）永远是双重的，而且它的两个词汇处于一种可易性状态之中（迈卡施〔Mikus〕）”②。某些结合约束（也就是符号“强制力”的模式可以被猜想出来），这里我们将举例说明，这些例子是关系的三种模式，根据叶耳姆斯列夫的语言学理论，当两种横组合的组织单位处于邻接的时候，它们可以参与这些模式：（1）一致的关系：当它们必须相互包含的时候；（2）简单的牵连关系：当其中的一种模式在相互关系之外包含另一种模式的时候；（3）结合的关系：

① 这也许可以证明所有涵义符号的情况。见第5章。——原注。

② 一般说来，一种惊叹oh〔啊！〕似乎可能是一个由一种单个的组织单位构成的单位语符列，但在事实上，言语在这里必须被归还给语境：惊叹是一种“不发音”的单位语符列的解答。见皮科（K.L.Pike）《与人类表现结构统一理论有关的语言》。——原注。

当二者都不包含另一种模式的时候。结合的约束被“语言”所固定，而“言语”在变化的程度上则遵循它们，因此，在横组合组织单位的联合中遗留下了一些自由。远到语言被关注的时候，雅可布逊就已经指出，在结合的语言组织单位中，讲话者喜欢一种从音素过渡到句子时增大了的自由，构成音素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的自由是零，因为这里的规则被语言限定了；把音素组成符素的自由也是受限制的，因为存在着控制词汇创造的“法律”；把一些“词”结合成句子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尽管它被句法所限制，并且，在某种情况中被成规的意见所限制；结合句子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不再容许句法层次的约束（注重思想一致性的约束已不再属于语言学的规则了）。

横组合的自由，显而易见和某些侥幸的成分有关系；存在着依据特定内容的特定句法①形式渗透的可能性结果。动词“吼叫”仅仅可能被少数对象所渗透；在一群特定的衣服中，一条裙子不可避免地被一件女衬衫、一件汗衫或一件夹克衫所“渗透”，等等。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催化作用；想象一种纯形式的词汇是可能的，代替每一种词汇的意义，这种词汇根据可变的可能性，提供了可以催化它的另一些词汇。可能性结果的最小程度，将符合于言语的一种“有诗意”的范畴（瓦勒·英克兰〔Valle Inclan〕说：“灾难将降临于没有勇气联合两个未被联合过的词的那个人”）。

6．横组合组织单位的同一性和非邻近性：索绪尔的观察表明：正是因为符号的循环，语言才有可能是可能性

① “句法”属于横组合关系。——译者注。

地①。顺着横组合关系链，使我们确实发现许多同一性的组织单位；然而，符号的重现被同一性组织单位之间的非邻近性现象所调整。这个问题导致我们走向了统计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它们根本上是一种单位语符列的语言学，而与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单位语符列和言语是多么的接近：统计语言学是一种言语富有变化形式的语言学（列维-施特劳斯）。但是，横组合同一性组织单位的非邻近性不仅仅是一种宏观语言学的问题；而这种非邻近性能也在文体上的词汇内被理解（文体上的词汇：它是一种循环的词汇，它不仅早就作为美学观点上的妨碍，并且也早就作为理论观点上的忠告而存在），并且继而变成了涵义的代码成分。

三、系　　统

1．不同点和相似点；差别：系统构成了语言的第二条轴线。索绪尔已经以关联范围系列的形式研究了它，索绪尔看到：此系列中的一些被发音的类似决定了（如education〔edju(:)'keiʃən〕〔教育〕和saturation〔,sæʃə:reiʃən〕〔渗透〕），另一些被意义上的类似决定了（如education〔教育〕和upbringing〔教育〕）。因此，关联的每一种范围都是一个潜在词汇的仓库（仅仅因为它们中的一个在现在的话语中被实现了）：索绪尔坚持运用“term”（词语）这个术语（他用它代替word〔单词〕，因为后者是横组合的组织单位），因此，他说：“当我们用‘term’代替‘word’时，一种系统的观念就被想起来了。”的确，在某

① 见第1章第1节第3个问题。——译注。

些组符号的研究中，把适当的注意给予系统，这实质上永远证明着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例如，当与这一情况相反的时候，布龙菲尔德学派①就不高兴研究关联关系，马丁内特推荐了在对比（横组合组织单位之间的邻近关系上）和对立（在联合范围的词汇之间的关系上）之间的一种特征清晰的画面。这个范围（或者纵聚合关系语言项）内的词汇必须同时是不同的和相似的，它包括一种共同的成分和一种能变换的成分：这就是带有education和saturation的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的情况，和带有education和upbringing的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的情况。

依靠一种对立而来界定词汇似乎是简单的；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那些在一种纵聚合关系语言项的所有词汇中所共有的成分（如 -ation在education和saturation中）都表现为一种确定的（非差异的）成分，这种现象似乎与索绪尔反复强调的关于语言纯粹差异性对立本质的声明相矛盾："在语言中，只有差异性而没有确定的词汇""研究（发音）不是因为发音具有一种绝对的意义，而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纯粹对立的、相关的、否定的意义……从这个问题的一开始，我们就必须向前迈进一大步，去研究语言中的、作为对立的而不是作为确定的、绝对的每一种意义。"下面一段话仍然是索绪尔的原话，而且这段话甚至更为明确："在所区别的一个特定事物和所构成的该事物之间是可以容纳非差异性的，这是语言的一个特征，一般说来，就象某

① "布龙菲尔德学派"是以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1887－1949）命名的学派，他们主要坚持分布和机械的观点。——译者注。

些符号学系统的特征一样。”因此，假如语言是纯粹差异性的，那么，它怎么能包含确定的、非差异的成分呢？事实上，在一种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似乎作为共同成分的成分，它本身在别处——在另一种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也就是在另一种适当的成分中——是纯粹差异性的词汇：一般说来，在Le和La的对立中，L确实是共同的（确定的）成分，但在Le和ce的对立中，L变成了一个差异性的成分：因此，当限定索绪尔的声明时，它就具有了实质作用①；意义仍然取决于不同源的(aliud)一对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仅仅保持了两种事物之间的差别②。

这个结构是可疑的，可是（无论索绪尔怎么想），在符号学系统中。第一，物质不是有意义的；第二，组织单位可能包括一个确定的部分（它是维持词义的部分）和一个差异的——不一致的——部分；在一件或长或短的衣服中，衣服的意义渗透到所有的成分之中（它证明我们正在真正地处理一个有意义的组织单位），但是，当衣服保持（维持）一种确定的意义时，纵聚合关系语言项就不包括一些事物，而是包括限定的成分（或长或短），因此，绝对地说，假如我们有意指发音语言的话，那么，语言差异的意义就仅仅是可能存在的，在（源出于非有意义的习惯用法的）第二位系统中，语言是“混杂的”，也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层次上，它包含着一种差异的成分（也就是纯语言），而在支持的层次上，它也

① 见弗雷关于次要音素的分析，见前面第二章第一节第二个问题。—原注

② 这种现象在一些（用一种语言表达的）字典层次上清晰地显示出来：这本字典似乎要确定一个词的界限，但是，当这个界限由必须被自身所解释的词汇构成时，确定性就被进一步引证了。——原注

包含着某些确定的成分。

2．对立：在关联或者纵聚合的范围中，词汇的固有排列通常被称为——至少在语言学中、更精确地说是在语音学中——一种对立。这不是一种非常好的命名，因为一方面，它必须预先假定纵聚合关系中的许多反义特征（坎蒂努〔Cantineau〕提出的术语是“关系”，叶耳姆斯列夫提出的术语是“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它似乎包含着一种双重的关系．关于这种关系，不可能确定它就是所有符号学纵聚合关系语言项的基础。但是，既然这个术语已经被理解了，我们就将保持它。

就象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对立的模式是非常多样的；但是，在它和内容方面的关系中，一种对立——无论它可能是哪种对立——永远表现为一种关系相同，就象我们论及对比替换语段时所指出的那样：从一个对立的词到另一个对立的词的“飞跃”伴随着从一个被表示成分（所指）到另一个被表示成分（所指）的“飞跃”；对立是重视系统的差异性特征的：一个人必须永远认为在词汇中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类推关系，而至少是一种四个词汇关系相同的关系。

此外，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的“飞跃”是双重的交替：biére（比埃尔）和pierre（皮埃尔）之间的对立——虽然非常小(b/p)——不能被分解为某些不明确的中间状态；在b和p之间的接近发音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能涉及到beer(啤酒)和stone（石头）之间的居中的内容，因此，存在着两种相似

的飞跃：对立仍然处于获得一切或一无所有的种类之中。我们再次发现了作为对立基础的差别的本质：它是必须注入关联范围的分析的本质；因为处理对立仅仅可能意味着去观察那种可能存在于对立的词汇之间的相似的和差异的关系，而这恰好用来把它们分类。

3．对立的类别：我们知道：既然人类语言是双重发音的，那么它就包含了两种对立：区别性的对立（存在于音素之间）和有意义的对立（存在于符素之间）。特鲁别茨柯依提出一种区别性的对立，而坎蒂努则曾努力采纳并扩展了语言中有意义的对立。当乍看起来符号学的组织单位接近于语言的语义组织单位，并超过了接近语言的语音组织单位时，我们在这里就将举出坎蒂努的分类，尽管这种分类也不能很容易地应用到（其后的）符号学对立之中，但是它具有一个长处，即导致我们注意对立的结构所提出的主要问题①。乍看起来，当一个组织单位，从一种语音系统过渡到一种语义系统时，那么在后者中的对立将是无数的，因为每一个表示成分（能指）都似乎与所有其他的表示成分（能指）相对立；可是，假如一个人选择了在对立的相似成分和不同成分之间关系的某种预兆为一种准则的话，那么，一种对立的本质便是合理的。因此，坎蒂努得出了对立的下述模式——它们也是可以被相互联合的②。

A．根据与整个系统的关系分类的对立：

（i）双方的对立和多方的对立：在这些对立中，两个词之

① 见《索绪尔杂录》，第9章，第11—40页。——原注。
② 坎蒂努所提出的所有对立都是二重的。——原注。

间的，或者说"比较的基本"的共同成分，它们不是在代码的其他一些对立中被发现的(双方的对立)，或者与之相反，它们是在代码的其他一些对立中被发现的(多方的对立)。让我们来以拉丁文文字的字母表为例：图表中E/F的对立是双方的，因为共同的成分F不能在其他一些字母中再次被发现①；与之相反，P/R的对立是多方的，因为P的形状（或共同成分）在B中再次被发现了。

(ii)均衡的对立和孤立的对立：在这些对立中，差别被指定为一种模式。因此：Mann（曼，姓）和Männer（姓曼的人）、Land（陆地）和Länder（着陆器）是均衡的对立；同样，(nous)disons（〔我们〕说）和（vous)dites（〔他们〕说）、(nous)faisons(〔我们〕创造）和（vous)faites(〔他们〕创造）也是均衡的对立。不是均衡对立的对立就是孤立的对立；它们明显是大多数。在语义学中，只有语法（词法）的对立是均衡的对立；词汇的对立都是孤立的对立。

B．根据对立词汇之间关系分类的对立：

(i)反义对立：这些对立是最好理解的。一种反义对立，意味着某些被一种有意义成分的存在、或在另一些表示成分(能指)中所没有的标记所描述的一个词汇表示成分（能指）的对立。因此，有标记的或无标记的②，这是普遍的对立：mange（吃）（没有任何人称或数的表示）；无标

① 这也是一种反义的对立。——原注。

② "有标记的"和"无标记的"，即"标记成分"和"无标记成分"。前者指一对带有区别性特征的成分，这种区别性特征可以把这种成分和另一种成分区别开；后者的意义则完全与之相反。——译者注。

记的词；mangenos（吃）（第一人称复数），有标记的词。这种倾向与逻辑上的内含关系①相符合。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将提到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标记成分，某些语言学家把标记成分和特殊成分同等看待，并且乞求一种普遍的感觉以决定哪些词是无标记的；根据他们的理论，无标记成分是一种从标记成分中通过删除而导出的平凡、常见的或其他情况的词汇。那么，一种反义的标记成分（它是被去掉的）的观念便取得了：因为无标记的词汇在语言中是占大多数的，并且，其数量超过了有标记的词汇（特鲁别茨柯依，齐夫〔Zipf〕）。因此，坎蒂努认为：rond（圆的）是有标记的词，它与ronde（圆的）有关，但ronde却不是有标记的词；但事实上，这是因为坎蒂努求助了内容，即根据阳性是与阴性有关的标记成分这一内容。对于马丁内特来说，其观点正好相反，标记在他看来简直是一种附加的有意义成分；在阳性与阴性的情况中，他的理论并不是用任何一种方法妨碍那种一般说来存在于表示成分（能指）的标记成分和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标记成分之间的相同，因为实际上，"阳性的"与性别之间的非差别性相符合，并且与一种抽象的一般性相符合（例如，it fait beau〔天晴、天气好〕，on est veau〔人们在吃小牛〕），与之相反，"阴性的"则是很好的标记成分；一种语义的标记和一种形式的标记很好地结合到一起了：当一个人想要说得更多时，他就应加上一种附加的符号②。

① 即上下文关系。——译者注。

② 语言经济学告诉我们：在被传达的大量信息和这种传达所需要的能量（时间）之间，存在着一种固定的配合。——原注。

我们所提出的与反义对立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无标记的词汇。它被称为对立的“零度”。零度不是一种完全不存在（这是一个共同的错误），它是“一种有意义的不存在”。这里，我们具有一种纯粹差异的状况；零度证实了一些符号系统和“从无中”创造意义的系统所掌握的能量，“语言可以满足于‘有’的对立和‘无’的对立”①。萌发于语音学的零度概念适用于很多需要：在语义学中——零符号是众所周知的（“在某些明确的表示成分〔能指〕不存在时，在表示成分〔能指〕依据它自身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一种‘零符号’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表示成分〔能指〕）②，在逻辑学中（A处于零状态，也就是说，A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中，可以强迫它出现）；在人类学中——列维-施特劳斯想把超自然力的意志比作零程度（“……零音素的固有作用是作为与音素的不存在相对立的……类似地说，下面这种情况是可以被说明的……即：‘超自然力’模式的意志，其作用是作为与那种本身不包括某些特殊词义的词义的不存在相对立的”）；最后，在修辞学中——扩展到了涵义方面，修辞学上的表示成分（能指）在其自身的变化中，构成了一种文体的表示成分（能指）③。

（ii）同义对立：在这些对立中——对立的关系在逻辑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关系——两个词是同义的，也就是说，它们不能被认为是对一种特性的肯定和否定（反义对立），在foot（脚）和feet（foot的复数形式）中，既没有标记成分，也没有标记成分的不存在。从语义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对立是占绝

① 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第124页——原注。
② 见《索绪尔杂录》，第11卷，第35页。——原注。
③ 见《写作的零度》。——原注。

大多数的，虽然为了经济的缘故，语言经常试图以反义对立来替换同义对立：这是因为第一，在反义对立中，相似点和不同点之间的关系相对是和谐的；第二，它们使我们能够建立相称的系列：如poet（诗人）和 poetess（女诗人）、count（伯爵）和 Countess（伯爵夫人）等等，但在 stallion （种马）和mare（牝马）之间——它们是一种同义的对立——却没有派生过程①。

C．根据对立区别意义的程度分类的对立：

（i）固定的对立：这是那些永远有着不同表示成分（能指）的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情况：如（je）mange（〔我〕吃）和（nous）mangeons（〔我们〕吃）；第一人称单数和第一人称复数有着不同的表示成分（能指），这些在法语所有动词、时态和语气中都有。

（ii）可以被排除或抵消的对立：这是那些永远没有不同表示成分（能指）的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情况，因此，对立的两个词汇有时可能是同样的：对于第三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复数的语义对立来说，这里的一致表示成分（能指）。有一个时期是不同的（如finit〔结束〕和finissent〔结束〕），在其他的时候从语音上说是相同的（如mange〔吃〕和mangent〔吃〕）。

4．符号学中的对立：哪些对立可以变成符号学中的对立模式呢？讲述这些自然还太早，因为还没有一个普遍的目录，新系统的纵聚合方面就不可能被分析。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特鲁别茨柯依所主张的、并部分地被坎蒂努所采纳的那些模

① 在stallion和mare之间，共同的成分在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原注。

式①影响系统与影响语言不同：对立的新模式是可能存在的，特别是当一个人准备从双重模式出发时。然而，我们将试图草拟一种在特鲁别茨柯依和坎蒂努的模式与可以被了解的、两种非常不同的符号系统——公路旅游指南和时装系统——之间的一种应用。

在公路旅游指南中，我们将发现多方均衡的对立（例如，所有这些在圆形和三角形的对立之内都被建立在色彩的某种变化之中）、反义的对立（例如，当一个附加的标记使一个圆形的意义发生变化时）和固定的对立（被表示成分〔所指〕永远有着不同的表示成分〔能指〕）。然而，我们既没发现同义的对立，也没发现可以排除的对立。这种节省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想要阻止事故发生的话，公路旅游指南就必须可以被直接地或明确地辨认，因此，它淘汰了那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理解的对立，这既是因为这些对立对于适当的纵聚合语言关系项（同义的对立）是不可减少的，又是因为它们提出了一种对于一个单个的表示成分（能指）的两个被表示成分（所指）的选择（可排除的对立）。

与之相反，在时装系统中②——时装系统倾向于有多种解释，其中我们遇见了所有的对立模式，当然，除了双方的对立和固定的对立之外——这两种对立的作用在于增大系统的特殊性和严密性。

因此，符号学——在这个术语的适当观念中，也就是作

① 坎蒂努并没有坚持特鲁别茨柯依所主张的渐次对立〔如德语u/o和ü/ö〕——原注。

② 见罗兰·巴特《模式系统》。——原注。

为一门包括所有符号系统的科学——将能够很好地利用遍及各种各样系统的对立模式的普遍分布——一种仅仅在语言层次上将没有对象的观察。但是，首先，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将导致一系列的研究（最终它可以证实无效的东西），并且，这种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对立的关系和纵聚合关系，因为一个人一旦碰到了复杂的系统，并被深深地卷入一些事物和各种各样的习惯用法之中时，他将能够使意义的作用成为两种正相反成分的交替，或者成为一种标记成分和一种零度的对立，而这种情况是不确定的。这使我们再次想起了这种示意：与纵聚合关系语言项目有关的、更为困难的问题是双重的本质。

5. **双分制**①，反义对立（有标记的和无标记的）——它是根据限定的一种交替——的重要性和简单性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是否所有人都知道的对立将不被简化为双重的模式（也就是，把基础放在标记的存在与不存在之上），在另一些词汇中，是否双重的本质不反映一种普遍的事实；另一方面，作为普遍的事物，是否它不可能有一种自然的基础。

关于第一点，二重模式被非常频繁地应用是确定的。这是一种已经被几个世纪所公认了的原理了，即：信息可以依靠一种双重的代码来传达，而且被许多不同社会所发明的人为代码也是双重的，从“布什电报”（值得注意的是在刚果的

---

① 又译为“双分法”。“雅可布逊（R.Jokobson，1896—）和布拉格学派用这个概念来进行语言分析。语音学中的基本单位——音位的定义，是根据有或没有某些区别性特征做出的，在语法或语义学中，一个成分的某些特征可以是“有标记的”，如cats（对cat〔猫〕）表示复数，也可以是“无标记的”，如bitch（对dog〔雄狗〕）表示阴性，即母狗。信息论中也使用着与双方制相类似的概念（引自《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42页。）——译者注。

某些部落中用来交谈的鼓声也有两种符号）到莫尔斯的字母表以及数字的现代的发展，或者在计算器和控制论中带有“阿拉伯数字”的交替代码。可是，假如我们离开了“词的技能”方面，而回到不是人为的——这里的人为的东西影响着我们——系统方面，那么，双重本质的普遍性则显示出更少的确定性。似乎可以这样说，索绪尔本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象双重这样的关联范围：对于他来说，某种范围内的词汇既不是在数上限定的，也不是在它们的规则中决定的①："一个词就象一个并列关系的中心，另一些并列的词汇——不定的词汇总数——会聚在这一点上②。"被索绪尔所利用的、仅有的限定影响着词尾可变化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这种纵聚合关系语言项当然是限定的系列。下面谈谈把注意力集中于语言双分制的语音学（仅仅在第二位的发音层次上，它才是真实的）。双分制是绝对的吗？雅可布逊是这样认为的③：根据他的观点，所有语言的语音系统都可以用一打区别性的特征来描述，而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双重的，也就是说，既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互不相干的，就象这种情况可能是的那样。双重的普遍性曾被马丁内特所质疑，并被他限定了：双重的对立是大多数的，但不是全部的；双分制的普遍性是不确定

① 我们在这里将不接触在一种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词汇的规则问题，对于索绪尔来说，规则是无关紧要的；而对于雅可布逊来说，则正好相反，他认为在一种词尾变化中，主格的情况或者零形式的情况是最初的情况（见《普通语言学基础》，第71页，《类型学的研究和它们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在第VIII次国际语言学会议记录上。1957年，奥斯陆，第17—25页，见《普通语言学基础》，第3章）。今天这个问题可能变得十分重要了。例如，当隐喻作为一个表示成分〔能指〕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而被研究时，以及当它不得不决定在这个系统中一个词是否具有某些优先的时候，都是这样。——原注。

② 见《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第174页，英文版第126页。——原注

③ 见《言语分析·序言》，1952年。——原注。

的。在语言学中而不是在语义学中研究的双方制，它在符号学中是数不清的，它们对立的模式仍然还没有被论述。解释综合的对立，一个人当然可以依靠被语言学所清晰地发现的模式，这种模式存在于一种复杂的“交替”之中，或者存在于四个词的对立之中：两个两极分化的词（这[this]或那[that]）、一个混合的词(这和那)和一个中立的词（既不是这，也不是那）．这些对立——尽管它们比反义对立更有灵活力，但也将不能挽救我们，使我们不致于不得不提出一系列的、并不仅仅是反义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的问题：双分制的普遍性仍然还没有被发现。

双分法的“自然”基础（这是双分法自身易引起讨论的第二个观点）也还没有被发现。在生理学知识上发现代码普遍的双分法是非常让人发生兴趣的，因为大脑神经的感觉也在获得一切或一无所有的方法中发挥作用，这是很可能的，而且，在视觉和听觉中特别是这样．视觉和听觉似乎是依靠一种交替的观察而工作的①。因此，从自然到社会，一切观念都将被详尽阐明，一个“广袤”的概念是“数的”——而不是“类推的”——和对万物的翻译；但是，这个概念中所有的事物没有一种是确定的。事实上，简略地结束双分法的问题，我们也许想知道是否这不是一种既是必定的又是暂时的分类：在上述情况中，双分法也将作为一种元语言，一种意味着要被历史所清除的——在忠实于它一段时间之后——特殊的分类法。

① 更为基本的感觉似乎是“类推的”，象嗅觉和味觉。——原注。

6. 中和作用①：为了与适合于系统的重要现象断绝关系，一种术语不得不被称为中和作用。这个术语在语言学中意味着这种现象，即一个相应的对立是怎样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的，即它不再作为有意义的了。大体上说，一个系统中对立的中和作用存在于上下文的关系之中，因此，也可以说，它是抵消系统的横组合关系。例如，在音位学中，两个音素之间的对立可以因为在口语链中两种词汇之一的元音位置的影响而被抵消；在法语中，一般说来，当é和è之中的一个处于某个词的末尾时（如j'aimai〔曾经〕和j'aimais〔曾经〕），就会正常地存在着é和è之间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无论在什么其他地方也都不再是相应的②了：它是中和了的对立。与之相反，相应的对立ó和ò在一个词的末尾时是中和的（如saute〔突变〕和sotte〔愚蠢的〕），在这个词的末尾，我们仅仅发现了发音的ó（如pot〔坛子〕、mot〔词汇〕、eau〔美丽的〕）。在这些情况中，两种被中和了的特征是在一个单个语音之下被再次结合到一起的，这个单个的语音，我们称之为超音位③，并且，要用大写字母书写它们：如é/è＝E，ó/ò＝O。

在语义学中，既然语义的"系统"仍然还没有被确定，那么，中和作用就是仅有的几个调查对象中的一个了。杜波依斯(J. Dubois)曾通过观察认识到：一种语义学的组织单位在某些单位语符列中可能会失去其相应的特征；例如1872年左右

---

① 指在某些位置上对立的消失。——译者注。

② "相应的"，即区别性的。——译者注。

③ "超音位"，特鲁别茨柯依创造的术语，它是指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音位的某些特点中和的结果所产生的一个语音单位。——译者注。

出现的emancipation of the work(工人阶级的解放)、emancipation of the masses (民众的解放)、emancipation of 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解放) 这样的短语中，短语的两个部分都可以被变换，但不改变综合的符号学组织单位的意义。

在符号学中，我们必须再一次等待着某些在略述一种中和作用理论之前就被重新构成的系统。某些系统也许将彻底地排除中和作用这种现象，这是根据其根本用途而排除的，这种用途是少数一些符号直接的和明确的约定，公路旅游指南就不能容纳某些中和作用。具有多义性（甚至是泛义性）的时装，则与之相反，它包括为数众多的中和作用，在一种情况中，粗毛线衣适用于海边，毛线衣适用于高山，反过来说，在另一种情况中，粗毛线衣和毛线衣都适用于海边，那么，粗毛线衣和毛线衣之间的相关性则消失了；这两件衣服被同化为一种“羊毛”的模式“archi-vesteme”（保存档案）①。我们可以说，至少在符号学假说的范围内，当两个表示成分（能指）受到了一个单个被表示成分(所指)标题的影响时，符号学假说就涉及到了存在着一种中和作用这一问题（也就是，当我们不顾作为纯粹区别性组织单位的第二位发音方法时所提出的问题），或者反之亦然（因为被表示成分〔所指〕被中和也是可能的）。

与这种现象有关的两种有用的论点必须论述。第一是那种分散的范围或可靠的界限。分散的范围是由一个组织单位（例如，一个音素的组织单位）履行职责中的变化组成的，

① 这当然是实现中和作用的时装杂志的话语，事实上，中和作用存在于从AUT模式（粗毛线衣或交错的毛线衣）的排他性分离关系，传递到VEL模式（粗毛线衣或无区别的毛线衣）的范围较广的分离关系之中。——原注。

但条件是这些变化不导致意义的变化（也就是，只要这些变化不变成相应的变化）；分散范围的边缘就是它的“可靠界限”。这不是在处理“语言”十分强大的系统时特别有用的观点（例如，在处理汽车系统时），但是，当一种丰富的“言语”增大了其履行职责中产生差异的机会时，这个观点就是有价值的了：例如，在食物系统中，我们可以谈及一盘食物的分散范围，无论执行者怎样把“装饰”带进它的配制过程，分散范围都将被详尽地阐明，因为这盘食物仍然是在有意义的范畴之内受到限制的。

第二个论点：组成分散范围的变化有时被称为结合变体；它们是依靠符号的结合而被这样称呼的，也就是在直接地依靠上下文关系时被这样称呼的（例如，nada〔天底〕和fond$_a$〔底〕中的d是不相同的，但这种变体并不影响意义），有时，它也被称为个体变体或随意变体①。例如，在法语中，无论你是一个勃艮第②人，还是一个巴黎人，换句话说，无论你运用一种滚辅音③还是一种小舌音④的“r”来发音，你都同样被理解。结合变体很长时间都被认为是属于言语的现象；确实，它们是非常接近言语的，但是，它们现在却被认为是属于语言的现象，因为它们是“强迫的”。在符号学中——研究涵义似乎是很重要的——结合变体很可能变成一种重要的观点：因为在所指意义⑤方面没有意义的变体（例如，滚辅音

① “个体变体”或“随意变体”是与结合变体相对的概念，前者是自由变体，后者是有条件变体。——译者注。

② 勃艮第，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③ “滚辅音”，即颤音。发音时气流使舌或小舌多次振动。——译者注。

④ “小舌音”，指小舌参与发音动作的一种语音。——译者注。

⑤ “所指意义”，指某个词或词组一个方面的意义，它以可观察到的“外部世界”某一特定明确所指为基础，又以某种约定俗成的意义为基础。——译者注。

和小舌音的“r”）可以在涵义①方面变为有意义的变体，并且也是因为，作为结合变体也就涉及到了两个不同的被表示成分（所指）：在戏剧语言中，一个人将表现为“勃艮第语”，另一个人则将表现为“巴黎语”，除非不再作为所指意义系统中没有意义的成分。

这是中和作用的第一个推论。在一种非常普遍的方法中，中和作用再次提出了系统中单位语符列的强制问题，并且，我们知道：接近言语的单位语符列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缺乏”的成分；“语言”十分强大的系统（如公路旅游指南）只有很贫乏的单位语符列；而横组合强大的综合体（如绘画系统）则易于使意义趋于多种解释。

7．违犯：单位语符列系统：单位语符列和系统是语言的两个方面。现在，尽管这样的研究只是在某处被一种简略的方法所发现的，但我们必须在一种“畸形学”的方法中，也就是说，在一种被比作系统和单位语符列正常关系的“畸形学”中，预见到一个方面迭盖另一个方面全部现象的未来和详尽的研究。因为两个轴的发音模式有时会被“误解”，例如，当一个纵聚合关系语言项被延伸到一个单位语符列之中时，那么，就存在着一种对单位语符列或系统有用分布的反抗，并且，围绕着这种违犯，许多创造现象被确定是可能的，甚至，或许这里曾经存在着美学范畴之间的一个连接点，以及对语义系统的背叛。显而易见，主要的违犯是一个纵聚合

① “涵义”，与“所指意义”相对。指某个词或词组一方面的意义，这种意义是词在说者（或作者）、听者（或读者）的脑海中所引起的感情和想法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译者注。

关系语言项向横组合关系的延伸，因为，一般说来，只有一个运用着的词被现实化了，另一个（或者另一些）词汇仍然是潜在的：假如有人通过把某个词放在那些具有同样词形变化的所有词汇①中的一个词后面②，以求努力阐明一段话语的话，那么，上述的一切就是将要发生的现象。这些向横组合关系延伸的问题已经在音位语被提出来了，其中，让卡（Trnka）假定：在一种符素的范围内，两个关联的纵聚合词汇不能同时出现。他的这一观点，在某些关系上被特鲁别茨柯依修正了。

但是，在语义学中，正常的状态（让卡在音位学中的规定涉及到了它）和违反正常状态的情况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一点是明显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在有意义的（而不是区别性的）组织单位方面，并且因为，语言两个轴的重迭导致了意义的明显变化。从理论上看，这里存在着将不得不被研究的三个方面。

在传统的对立和现在的对立方面，杜本尼（J. Tubiana）曾暗示要承认配列对立③：两个词可以显示出同样的特征，但这些特征的配列在这两个词中是不相同的，如rame（列车）和mare（水塘）、dur（坚硬的）和rude（硬的）、charme（魅力）和marche（进程）。这些对立组成了俏皮话、双关语和斯本内现象④。事实上，从相应对立（如Fèlibres［狂热的］和fèbriles［诗人］）的研究出发，通过改变指明纵聚合

① 即指某个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的所有词汇。——译者注。
② 把一个词放在另一个词之后，也就是组成一个单位语符列。——译者注。
③ 见《索绪尔杂志》，第9章，第41—46页。——原注。
④ “斯本内现象”，即首音互换现象。——译者注。

对立的方法，以取得一个奇特发音的单位语符列是足够充分的（事实上，有一张报纸就曾用《Fèlibres fébriles》为标题）；这种方法意想不到的抑制，特别类似于一种结构审制度上的排除，并且，在连结这种现象和双关语制造者或察者的愿望时，一个人不能判断失误。

另一个不得不被考虑的重要问题是音韵。在发音层次上，也就是说，在表示成分（能指）层次上，押韵产生出了一个联合的领域：存在着音韵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与这些纵聚合关系语言项有关，押韵的话语显然是由延伸到一个单位语符列中的一个系统片断所组成的。根据这一点，押韵与单位语符列和系统间非邻近性规则的违犯相符合（让·卡的规则），它符合于在同类和不同类之间含蓄地产生的延伸，符合于结构上的审查制度。

最后，从整体上来看，修辞学无疑将被证实是上述增加想象力的违犯的领域；假如我们还记得雅可布逊语言学理论的术语"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就将明白：某些隐喻系列是一种横组合了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而某些转喻系列则是一种在某个系统中被凝固化和同化了的单位语符列；在隐喻中，选择变成了邻近；在转喻中，邻近变成了一种从中选择的范围。因此，看起来，在这两个方面的边缘上，创造似乎永远有着存在的机会。

第四章

所指意义和涵义

一、交错系统

也许我们还记得：某些词义系统包括一个表达方面（E）和一个内容方面（C），而词义则与这两方面的关系（R）相一致：ERC。现在，让我们假设，这样的一个ERC系统同样变成了比第一位系统范围更广泛的第二位系统中的一种纯粹的成分，那么，我们就将论及词义的两种系统，这两种系统是重叠的，或者说是交错的，它

们并不是互不协调的。但是，它们的诱导可能存在于两种根本不同的、取决于第一位系统插入第二位系统时所具有的特征的情况之中，因此，这种诱导可能导致两种对立的倾向。

在第一种情况中，第一位系统(ERC)变成了第二位系统的表达方面，或称表示成分（能指）方面：

```
2.    E        R    C
     ⏞
1.   E R C
```

不然就表示为：（ERC）RC。这是叶耳姆斯列夫称之为涵义符号学的情况；那么，第一位系统就是所指意义方面，而第二位系统（它比第一位系统范围更广）则是涵义方面。因此，我们将要说明，一个涵义系统是一种其表达方面本身被一个意义系统所组成的系统；涵义的共同情况当然将由语言所组成的第一位系统的综合系统所构成（例如，这是文学作品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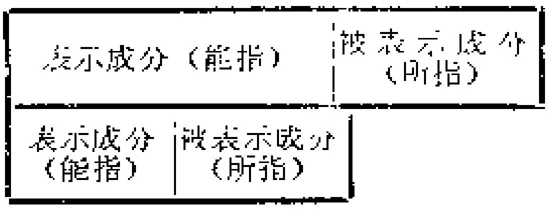
在诱导的第二种（对立的）情况中，在涵义范围内，第一位系统(ERC)不是变成了第二位系统的表达方面，而是变成了它的内容方面，或者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

```
2.    E     R     C
                 ⏞
1.             E R C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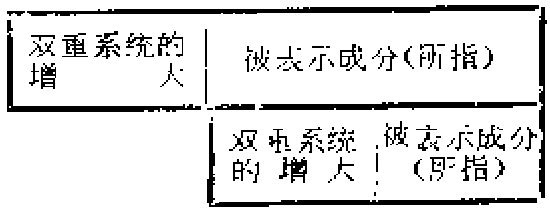
不然就表示为：ER（ERC）。这是所有元语言的情况；这种元语言是一种其内容方面自身被一种意义系统所构成的

系统，否则，它就是论述某种符号学的符号学。

这些是双重系统增大的两种方法：



涵义



元语言

二、涵 义

涵义的现象仍然还没有被系统地加以研究（某些暗示可以在叶耳姆斯列夫的序言中被发现）。但是，它的前景也许属于一种涵义的语言学，因为，根据人类语言所提供的第一位系统，社会不断地使第二规则的意义系统得以发展，并且，无论是现在已经公布的同化作用，还是现在尚未公布的同化作用，它们都非常接近一种真正的历史人类学。涵义，它自身作为一个系统，包括表示成分（能指）、被表示成分（所指）以及使构成者与后者（词义）相结合的过程，它是一个人在第一个地方保证每种系统的这些三种成分的目录。

涵义的表示成分（能指）——我们将称之为涵义载体——由所指意义系统的符号（联合的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示成分〔所指〕）所组成。自然，某些所指意义的符号可以被组织在一起以构成一个单个的涵义载体，只要后者有一个单个涵义的被表示成分（所指）；在另一些词汇中，涵义系统的组织单位当然不具有和所指意义系统相同的标准；所指意义话语的大部分片断都可以构成涵义系统的一个单个的组织单

位（例如，这是一段话语风格的情况，它由大多数词汇所构成，但是，它仍然涉及到了一个单个的被表示成分〔所指〕）。不管它用什么方法"胜过"所指意义的信息，涵义都不彻底研究它：这里永远保持着"某些所指意义的事物"（不那样的话，话语就将是不可能的），而且，涵义物在最后的分析中永远是不连续的和分散的符号，并且被带有它们的所指意义语言而采纳。

至于涵义的被表示成分（所指），它的特征同时是综合的、普遍的和四散的；假如你喜欢，它就是思想意识的一个片断。例如，在法语中，全部的信息都涉及到"法语"的被表示成分（所指）；一本书可以涉及到"文学的"被表示成分（所指）。这些被表示成分（所指）都有一个和文化、知识、历史很接近的信息，并且信息贯穿它们，换句话说，环境的世界侵入了这个系统。我们可以说：（在叶耳姆斯列夫术语的观点上）思想意识是涵义被表示成分（所指）的形式，而修辞学则是涵义载体的形式。

三、元语言

在涵义符号学中，第二位系统的表示成分（能指）被第一位系统的符号所组成；这在元语言中被颠倒了：在这里第二位系统的被表示成分（所指）被第一位系统的符号所组成。叶耳姆斯列夫已经明显地在下面的方法中提出了元语言的观点：一种是在根据经验的原理中发现的记述，也就是说，非矛盾的（紧密结合的）、详尽的和简单的、科学的符号学或

者元语言，这是一种运用，而涵义符号中则不是一种运用，这完全可以理解。例如，语义学是一种元语言则显而易见，因为作为一种第二规则的系统，它接收了一种第一位的语言（或者语言客体），这种第一位的语言（或语言客体）是在仔细检查下的系统，而且这种系统客体贯穿着符号学元语言的被表示成分（所指）。元语言的观点不能被限于科学的语言；当普通的语言在其所指意义的情况中，接收了一个有意义的客体系统时，它就变成了一种“运用”，也就是一种元语言。例如，时装杂志的情况，它“讲述”衣着的词义，就好象一个人讲一种语言一样；可是，这仅仅是观念地作为讲述，因为杂志通常不显示出一种纯粹所指意义的话语，因此，最后我们要处理一种综合的总体，其中，语言在其所指意义的层次上，是一种元语言，但综合总体中的元语言同样在一种涵义的过程中被抓住了。

1. 涵义	表示成分（能指）：修辞学		被表示成分（所指）＝观念学
2. 所指意义；元语言		被表示成分（所指）	
3. 真实的系统	表示成分（能指）	被表示成分（所指）	

四、涵义和元语言

在本质上，没有什么阻止一种元语言也变成为一种新的元语言的语言对象。例如，假使它是被另一种科学所讲述，这将是语义学的情况。假如一个人同意限定社会科学，如紧密结合的、详尽的和简单的语言（依叶耳姆斯列夫理论中术语“根

据经验的原则”),这种语言是作为应用的，那么，每一种新的科学都将显示为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作为元语言的对象都将领先于它的元语言，当这种语言被暗指真实的对象时，它是“描述”的基础；因此，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科学——在某种观念上——将是元语言的一种历时语言学，并且每一门科学——当然包括语义学——都应该包含它们自己死亡的根源，语法指定要讲述它们。作为元语言普遍系统中紧密结合部分的相互关系，它使我们能够限制可能是我们最先组成的形象，这种形象是在涵义方面过分自信的符号学的形象；符号学分析整体通常需要一个涵义系统和被用于其分析的元语言，除了被研究的系统和(所指意义的)语言外，它们还在很大程度上接收元语言。我们可以说，当符号学描述了系统的被表示成分（所指）时，掌握了涵义方面的社会集团就描述了它的表示成分（能指）；因此，社会集团的成员似乎具有一种客观的翻译作用（他的语言就是一种运用），而这种翻译则与第二位系统表示成分（能指）之下采纳或隐藏第一位系统符号的众人有关；但是，他的客观性是被更新元语言的历史所暂时构成的。

结　论

符号学的研究

符号学研究的目的是要重新建立词义系统的作用，它与语言不同，但却与某些结构主义者的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在观察之下建立模拟的对象——的典型过程相一致。从事这种研究，从一开始（特别是一开始）就有必要坦率地接受一种限定的原则。这种原则——我们再一次归功于语言学——是一种现实意义的原则①：它被决定去描述仅仅根据一种理论观点所搜集起来的事实，而且，它必然从这些事实

① 它被马丁内特系统地表达了。见《普通语言学基础》，法文版第37页；英文版第40页。——原注。

的异质集合中，保持仅有的、与那种理论观点相联系的特征，以便排除另一些特征（这些特征被说成是相关的）。例如，音韵学家仅仅根据他们在干预物理的发音本质之外所提出的意义理论来考察发音；被符号学研究所选择的现实意义，通过界定而集中在被分析对象的词义周围。这些对象仅仅和它们的意义被相关地考察了，而不产生决定这些对象要素的另一种因素（无论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还是物理学的因素），至少可以说，在尽可能重建系统之前产生这种因素还为时过早。这些因素当然不可否认——它们中的每一种都起因于另一种现实意义的模式；但是，它们自身必须在符号学术语中加以探讨，也就是说，它们在意义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加以决定。例如时装，它明显地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性质；但是，符号学将既不探讨它的经济学，也不探讨它的社会学：研究者将仅仅说明，在时装的语义系统层次上，经济学和社会学获得了符号学的现实意义。例如，在衣服的符号层次上，或者在联合的强制（禁忌）层次上，或者在涵义的话语层次上，都是这样。

现实意义的原则，作为分析者的一种成果，明显地具有内在性的结果：一个分析者可以从内部观察某种特定的系统。可是，既然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限制是事先不知道的（恰好作为重新建立这个系统的对象），那么，这种内在性仅仅在一开始时就可以应用到某些因素的异质结构中，而这些因素为了其结构被了解而不得不被加工，这就是素材。这种素材是原料的一种限定的集合体，因为它是事先被分析者带着（不可避免的）任意性所决定的，并且，分析者将研究这

些素材。例如，假若一个分析者想要重新建立现代法国的食物系统，那么，他就不得不事先决定哪一种文献将被分析处理（在杂志中发现的菜肴？餐厅的菜肴？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菜肴？被口头传达的菜肴？），一旦这种素材被规定好了，那么，他就不得不遵守它。也就是说，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不给它增加什么，而且，通过分析而全面地详尽研究它，包括在这种素材中的每一种因素都必须在这个系统中被发现。

一个人将怎样选择我们准备研究的素材呢？这明显地取决于感觉到的这种系统本质：一个影响食物因素的素材，不可能服从一种汽车模式选择的同一标准。在这里，我们只能提出两种一般性的介绍。

第一，素材必须是足够广泛的，以便提出合理的希望，即它的成分将渗透到一种相似的和差异的综合系统中；当一个人审查一种原料的集合体时，不久他就将遇到已被注意了的因素和关系，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已经看到，符号的同一性是一种属于语言的现象）；这些"回复"是越来越快的，直到一个人不再发现某些新的原料为止，如此说来素材是渗透的。

第二，这种素材必须尽可能是同质的。从内容上的同质开始研究，在研究由完全相同内容所构成的原料的工作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重要性，这就象仅仅处理语音内容的语言学家一样；同样道理，从理想上说，一种好的关于食物系统的文献素材，将仅仅包括完全相同的文献模式（例如，餐厅的菜单）。可是，现实性最为一致地呈现出固定的内容；例如，衣着和书面语言在时装中，绘画、音乐和言语在电影

中，等等；因此，容纳异质的素材是必要的，但是要注意，在那种情况中，一个人将专心地研究被影响的内容的系统发音（并且，重要的是一个人要适当注意把现实与接收它的语言分离开），即一个人把它们的异质性提供给一种结构的说明。

及时地推动同质：在本质上，素材必须尽力排出历时性的成分；它必须与一种系统、一种历史的横断面相符合。这里，在研讨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的理论讨论之外，我们将仅仅说明：根据一种起作用的理论，这种素材必须尽力保持接近共时性的趋势。因此，一种多种多样的而不是暂时限定的素材，将比一个有限制的、超越时间延伸的素材更为可取，例如，假如一个人研究出版物这种现象，一个同时出现的报纸样品比超过了好几年的一张单张报纸的延续更为可取。一些系统本身，规定了它们自己一致的共时性——例如时装，它每年都要改变；但是，对于其他的系统，一个人必须选择一个短期的时间，甚至一个人不得不通过掌握历时性的调查来完成他的研究。这些最初的选择，纯粹是在部分任意中起作用的和合情理的：猜测系统变化的速度是可能的，因为符号学研究的基本目的（即最终被发现的东西）很明显可能在于发现系统自身独特的时间和形式的历史。

参考书目提要

符号学现在还不能产生一种独立的书目提要；主要的书目必须要依靠其研究涉及到了结构主义和语义模式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这里我们提出他们著作的一种限定范围（为了缩减这本书的Gonthier版本），它为符号学分析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介绍。

ALLARD, M., ELZIÈRE, M., GARDIN, J. C., HOURS, F., Analyse conceptuelle du Coran sur cartes perforées, Paris, La Haye, Mouton & Co., 1963, Vol. I, Code, 110pp., Vol II, Commentary, 187PP.

BARTHES, R., Mythologies, Paris, ed. du Seuil, 1957, 270PP.

BRφNDAL, V.,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Copenhagen, 1943, Munksgaard, XII, 172pp.

BUYSSENS, E., Les Langages et le discours, Essai de linguistique fonctionnelle dans le cadre de la sémiologie, Brussels, 1943, Office de Publicité, 97pp.

ERLICH, V., Russian Formalism. Mouton & Co., s'Gravenhage, 1955, XIV, 276pp.

GODEL, R., 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e F. de Saussure, Geneva, Droz, Paris, Minard, 1957, 283pp.

GRANGER,,G. G., Pensée formelle et sciences de l'homme, Paris, Aubier, ed. Montaigne, 1960, 226pp.

HARRIS, Z. S., 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1,XV, 384pp.

HJELMSLEV, L., Essais Linguistiques,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Copenhague, vol. XIII, Copenhagen, Nordisk Sprog-og Kulturforlag. 1959,276pp.

JAKOBSON, R.,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 de Minuit, Paris, 1963,262pp.

各种其他引证的书目提要，已在注释中提到了。

LEVi-STRAUSS,C.,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Paris,Plon, 1958,II,454 pp.Structural Anthropology,translated by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Schoepf, Basic Books, New York and London, 1963, 410pp.

MARTINET, A., E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A. Colin,1960, 224 pp. Elemen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by Elisabeth Palmer, Faber & Faber, 1964,205 pp.

MOUNIN,G., 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63,XII,301 pp.

MORRIS., C. W., 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ur,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c.,1946,XIII, 365pp.

PEIRCE, C. S., Selected Writings,ed. by J. Buchlev, Harcourt,Bruce & Co., New York, London, 1940.

PIKE, K. L.,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 Glendale, Calif., 3 fasc. 1954,1955,1960,170-85-146pp.

PROPP, V.,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Intern.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vol. 24; no. 4, Oct. 1958, Indiana University, X, 134pp.

SAUSSURE, F. 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èrale, Parls, Payot, 4th edition, 1949, 331pp. Course of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 W. Baskin, New York Library, and Peter Owen, London, 1960.

TRUBETZKOY, N.S. Principes de Phonologie, translated by J.Cantineau, Klincksiek, Paris, 1957, 1st edition, 1949, XXXIV, 396PP.

因为近代结构语言学的发展，读者还涉及到了卢维特(N.Ruwet)的重要文章：La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aujourd'hui', in Arch europ.de Soc.,V (1964),pp. 277-310.

精选作者书目提要

一些第一次出现的罗兰·巴特的重要文章：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Seuil,1953)

MICHELET PAR LUI-MÊME (Collection:Ecrivains de Toujours,no. 19,Seuil,1954)

MYTHOLOGIES (Seuil,1957)

SUR RACINE(Seuil 1963)

ESSAIS CRITIQUES (Seuil,1964)

'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 (Communications, no.4,Seuil,1964)

CRITIQUE ET VÉRITÉ (Seuil,1966)

索　　引[①]

① 本索引以术语的英文字母为序。——译者注。

语言和言语： 第一章；

术语集（词汇层）： 第二章第二节第三个问题；

语言学： 全部；

词的技能： 第一章第二节第六个问题；

宏观语言学： 第一章第二节第一个问题和第三章第二节第六个问题；

标记： 第三章第三节第三个问题；

（语言）集团： 第一章第一节第四个问题；

元语言： 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三节；

隐喻和转喻： 第三章第一节第二个问题和第三节第七个问题；

诱导： 第二章第四节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

音乐： 第二章第二节第三个问题；

中和作用： 第二章第三节第六个问题；

非诱导： 第二章第四节第二个问题；

规范： 第一章第一节第五个问题；

拟声词： 第二章第四节第三个问题；

运用： 第四章第三节；

对应： 第三章第一节第一个问题和第三节第一、二、四个问题；

纵聚合： 第三章第一节第一个问题；

基本的结合： 第二章第二节第二个问题；

反义对立： 第三章第三节第三个问题；

相称对立： 第三章第三节第三个问题；

关系： 第三章第一节第一个问题；

现实意义和语言： 第一章第一节第六个问题；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①]

罗兰·巴特

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可胜数。种类繁多，题材各异。对人来说，似乎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来进行叙事：叙事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用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用手势以及有条不紊地交替使用所有这些手段。叙事存在于神话、寓言、童话、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请想一想卡帕齐奥的《圣于絮尔》那幅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新闻当中。而且，以这些几乎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叙事，存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没有叙事的民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切阶级、一切人类集团，皆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常常为具有不同的、以至对立的文化教养的人共同欣赏。所以，叙事作品不管是质量好的或不好的文学，总是超越国家、历史、文化存在着，如同生活一样。

---

①《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是罗兰·巴特的力作之一，最初发表于1966年，对叙述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罗兰·巴特总结了当时各家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用三个层次来描述叙事作品的结构，即：一、功能层，研究基本的叙述单位及其相互关系；二、行动层，研究人物的分类问题；三、叙述层，研究叙述人、作者和读者的关系。罗兰·巴特的观点是一家之说，且完全比照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叙事作品的结构，连术语也完全照搬，可见其理论仍处于探索、草创阶段。——译者注。

叙事作品具有这样的普遍性，难道我们就该断言它没有意义吗？难道叙事作品已经普遍到我们除了象文学史有时所做的那样，满足于描述叙事作品的几个十分个别的种类之外，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吗？可是，即使这些种类，我们该如何驾驭它们，如何建立我们区分它们、辨别它们的法则呢？不依据一个共同的模式，怎么对比长篇和短篇、童话和神话、正剧和悲剧（人们曾经做过千百次）呢？这个共同的模式存在于一切言语的最具体、最历史的叙述形式里。所以，（从亚里士多德起）每隔一定的时期，人们就要关心叙述的形式，而不是借口叙事作品是普遍现象，放弃谈论它的任何雄心壮志，这是合乎情理的。叙述的形式，新生的结构主义将其作为首要问题来研究，也是正常的。结构主义不正是通过成功地描述"语言"（言语来自语言，我们又能从语言产生言语）来驾驭无穷无尽的言语的吗？面临无穷无尽的叙事作品以及人们谈论叙事作品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历史的、心理的、社会学的、人种学的、美学的，等等），分析家的处境同面临种类纷繁的语言和试图从表面看来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找到一条分类原则和一个描述中心的索绪尔，几乎是一样的，就目前的研究阶段来说，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普罗普、列维-施特劳斯教我们掌握了以下的二难推理：要么，叙事作品仅仅是一堆事件的唠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论叙事作品就只能依赖叙述人（作者）的技巧、才能或天才（一切偶然的神话的形式）。要么，该叙事作品与其他叙事作品共同具有一个可资分析的结构，不管陈述这种结构需要多大的耐心。因为最复杂的胡乱堆砌和最简单的组合是不可同日而

语的。如果不依据一整套潜在的单位和规则，谁也不能组织成(生产出)一部叙事作品。

那么，到哪里去寻找叙事作品的结构呢？无疑是在叙事作品里。在所有叙事作品里吗？许多接受叙述结构这一概念的评论家却不同意使文学分析摆脱实验科学的模式，他们坚持要人们把纯归纳的方法用于叙述，要人们先从一个体裁、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所有叙事作品研究起，然后再逐步拟订一个总的模式。这种好心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语言学本身只有三千种左右的语言要研究，也做不到这一点。语言学明智地采用了演绎的方法，而且从这一天起，语言学才真正成其为语言学，并以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甚至预见到了以往未曾发现过的现象。叙述的分析面临着数百万计的叙事作品，那又该怎么说呢？叙述的分析迫不得已要采用演绎的方法，叙述的分析不得不首先假设一个描述的模式（美国语言学家们称之为“理论”），然后从这个模式出发逐步深入到诸种类，诸种类既是模式的一部分又与模式有差别。只有从既一致又有差别这个角度，拥有了统一的描述方法的叙述的分析，才会发现多种多样的叙事作品及其历史、地理、文化上的不同。

为了把无穷无尽的叙事作品加以描述和分类，那就要有一个“理论”（就我们刚才讲的实用意义来说），就要首先努力去寻找，去创建。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一个提供初步术语和初步原则的模式，这一理论的创建工作就会大为方便。在目前的研究阶段，把语言学本身作为叙事作品结构分析模式的基础，看来是合乎情理的。

一　叙事作品的语言

1. 句子以外

大家知道，语言学研究到句子为止。语言学认为这是它有权过问的最大单位。确实，句子是一个序次而非序列，所以不可能只是组成句子的词的总和，并由此而构成一个独特的单位，反之，一段陈述则不是什么其他东西，仅仅是构成陈述的一系列的句子。所以，从语言学的观点来说，话语中有的，句子里都有。马丁内特说："句子是能够全面而完整地反映话语的最小切分成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不可能超过句子，因为句子以外，不过是另外一些句子而已。植物学家描述了花朵之后是不会想着去描述花束的。

但，很显然，话语本身（作为许多句子的总体）是经过组织的，而且由于经过组织，看上去才象是高于语言学家的语言的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规则、"语法"。话语由于超出了句子的范围，虽然仅仅由句子组成，自然应是第二种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话语的语言学，在很长时间里曾经有个光荣的名称：修辞学。但由于历史的演变，修辞学变成了美文学，美文学又与语言研究分了家，所以近来又不得不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研究话语的新语言学还不发达，但毕竟是语言学家们自己提出来的。这一事实并非微不足道。话语虽然是独立的研究客体，但要从语言学出发加以研究。如果说，必须先给任务庞大、材料无计其数的分析制订一个工作的前提，那么，最理智的办法是假设在句子与

话语之间有同源关系。只要同一个形式结构似乎支配了所有的符号学体系，不论其内容如何之多，规模如何之大。话语可能是个大的"句子"(其组成单位不一定非是句子不可)，如同句子就某些特征来说是个小的"话语"一样。这一假设同目前人类学的某些主张是完全一致的。雅可布逊和列维-施特劳斯曾经指出，人类的特征可以用其创造第二体系，即"微调"体系(用于制造其他工具的工具，语言的双层分节，导致家族分居的乱伦禁忌)的能力来说明。苏联语言学家伊凡诺夫认为，有了自然语言之后才可能有人工语言。对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能够使用多种意义体系，所以自然语言有助于制造人工语言。因此，假设在句子与话语之间存在一种"第二"关系(为了尊重纯粹形式上的一致性，我们将称之为同源关系)，是合乎情理的。

叙事作品的一般语言显然只是话语语言学研究的特殊语言之一，因而符合同源的假设。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叙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但决不可能只是句子的总和。叙事作品是一个大句子，如同凡是陈述句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小叙事作品的开始一样。虽然句子有独特的(常常是十分复杂的)能指，我们在叙事作品里仍可找到动词的经过放大和作了相应改造的主要范畴：时，体，式，人称。而且与动词谓语相对的"主语"也仍然符合句子的模式。格雷马斯提出的行动者的类型，在叙事作品的众多人物里可以找到语法分析的基本功能。我们在这里建议的同源性，不仅具有启发意义，而且也意味着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致性(因为同源性是叙事作品的一种特有的传递工具)。一旦文学把语言用做表达思想、

感情或美的工具，就不大有可能再把文学看做同语言没有任何关系的艺术了，因为语言始终伴随着话语，同时用自己结构的镜子照着话语。特别是在今天，文学不是成了语言状况本身的一种语言了吗？

2. 意义层

语言学从一开始就给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在即将交待整个意义体系即叙事作品结构的关键是什么的时候，既能说明为什么一部叙事作品不是单句的简单的总和，又能将大量的构成叙事作品的成分加以分类。这个概念，即描述层。

大家知道，在语言学上，一个句子可以进行多层次的（语音的、音位学的、语法的、上下文的）描述。这些层次处于一种等级关系之中，因为，虽说每个层次有自己的单位和相关单位，迫使我们分别单独对其进行描述，但每个层次独自产生不了意义。某层次的任何单位只有结合到高一级层次里去才具有意义。一个音素，尽管可以描述得十分周详，自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音素只有结合到词里去才承担一部分意义。而词也要结合到句子中去。层次的理论（如同本温埃斯特所阐述的那样）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关系：一、分布关系（如果关系处在同一层次上）；二、结合关系（如果关系是跨层次的）。结果是，分布关系不足以说明意义。那么，要进行结构分析，就必须首先区别多种描述层次并从等级的（结合的）观点去观察这些层次。

层次即程序。因此语言学在发展的同时逐渐使层次多起来是正常的。有关话语分析目前只能研究一些基本的层次。

修辞学曾经以自己的方式给话语至少规定过两方面的描述：遣词和造句。今天，列维-施特劳斯在分析神话的结构时已经明确指出，神话话语的构成单位（神话素）只有集成块块，块块之间又进行组合，才能获得意义。托多罗夫采用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区分办法，建议就两个可以细分的大层次进行研究：一、故事（内容），包括行动的逻辑和人物的"句法"；二、话语，包括叙事作品的时，体，式。不论人们提出多少层次，也不论人们给层次下什么样的定义，都不能不相信叙事作品是一个多层次的等级体系。理解一部叙事作品，不仅仅是弄懂故事的展开，也是辨别故事"层次"，把叙述"线索"的横向连接投射到一根垂直的暗轴上。读（听）一部叙事作品，不仅仅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读（听）下去，也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读（听）下去。请允许我在这里用个例子来说明。在《失窃的信件》里，爱伦·坡对没有本事找回信件的警察局长的失败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爱伦·坡说，警察局长"在他专案范围内"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没有漏过任何地方，使"搜查"这一层完全"饱和"了；但是，为了找到显然被人藏匿起来的信件，就必须进入另一个层次，用适当的窝藏者代替适当的警察。对整个横向叙述关系所进行的"搜查"尽管是彻底的，为了取得成效，也应当以同样方式"垂直地"进行"搜查"，因为意义不是在叙事作品的"尽头"，而是贯穿其中；意义同失窃的信件一样会逃脱任何单方面的搜索，这也是很显然的。

在弄清叙事作品的层次之前，还需做许多摸索。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层次是个暂时的轮廓，其长处还几乎只表现在说理的方法上。提出这些层次，我们就可以把问题确定下来，

集中分类，而且不要同已经做过的某些分析发生矛盾（但愿如此）。我们建议把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述层：一、“功能”层（功能一词用普罗普和布雷蒙著作中所指的含义）；二、“行动”层（行动一词用格雷马斯把人物作为行动者来论述时所指的含义）；三、“叙述”层（大体相当于托多罗夫所说的“话语层”）。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三层是按逐步结合的方式相互连接起来的：一种功能只有当它在一个行动者的全部行动中占有地位才具有意义，行动者的全部行动也由于被叙述并成为话语的一部分才获得最后的意义，而话语则有自己的代码。

二 功 能

1. 单位的确定

一切体系都是已知其类别的单位的组合，所以首先要把叙事作品切割开来，确定可以归入为数不多的类别里去的叙述话语的切分成分，一句话，要确定最小的叙述单位。根据这里已经说明的结合的观点，分析不能满足于单纯从分布的角度来确定单位。必须从一开始就把意义作为衡量单位的标准，故事的某些切分成分之所以成为单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功能特征。“功能”这个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立即就用它称呼第一批单位了。在俄国形式主义者以后，人们把故事中凡是以相关项的面貌出现的切分成分都作为单位。一切功能的灵魂，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其胚芽，是可以在叙事作品中播下一个成分，以后在同一层次或在别的地方，在另一层次上成熟的东西。在《一颗纯朴的心》里，福楼拜之

所以在某个时候似乎顺便告诉我们崩-莱维克副省长家的女儿们有一只鹦鹉，那是因为这只鹦鹉后来在菲丽西黛的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细节的交待（不管语言形式如何）便构成一种功能，或者叙述单位。

在一部叙事作品里，一切都具有功能吗？连最小的细节都具有意义吗？叙事作品可以全部被切割成功能单位吗？无疑，功能有好多种，这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因为相关关系有好多种。但不论怎样，一部叙事作品总是由种种功能构成的，其中的一切都具有程度不等的意义。这不是（叙述者的）技巧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因为在话语的范畴里，凡是记录下来的，从定义来说，都是重要的。即使一个细节看来确实没有意义，不具有任何功能，但仍然可以说明荒谬或无用的意义本身。所以说，一切都具有意义，或者没有什么不具有意义。我们也许可以换个方式说，技巧没有声音（就这个词的信息意义来说）。因为这是个纯体系，不论把单位同故事的层次连接起来的线索多么长，多么松，多么细，没有，永远也不会有无用的单位。

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功能显然是一个内容单位，因为某陈述之所以成为一个功能单位，是这一陈述"要表达的意思"，而不是意思的表达方式。这个所指成分可能具有种种不同的、常常是很复杂的能指。如果有人对我说（在《金手指》里），"詹姆斯·庞德看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等等，这信息同时包含两个压力不相等的功能：一方面，人物的年龄成了某个肖像的一部分（其"用途"对故事的其余部分并非没有，而是不清楚，以后才会知道）；另一方面，陈述的直

接所指是庞德不认识他未来的谈话对手。因此这个单位包含一个十分紧密的相关关系（威胁露了端倪与弄清对方身分的必要）。为了确定第一批叙述单位，那就需要牢牢盯住我们所研究的切分成分的功能性质，也需要事先承认，这些切分成分不一定非要同我们习惯上所承认的叙述话语不同部分（情节、场景、段落、对话、内心独白等等）的形式相吻合，更不必同“心理上”的分类（人物的行为、情绪、意图、动机、设想）相吻合。

既然叙事作品的“语言”不是有声语言的语言（尽管常常由这种语言担任），叙述单位同样地在本质上与语言单位互不相关。诚然，它们可能会吻合，但，那是偶然的，非一贯的。功能有时由大于句子的单位（长短不一的句组，以至整个作品）来体现，有时由小于句子的单位（句子的组合段，单词，甚至只是单词中的某些文学成分）来体现。当作者告诉我们，庞德在情报处的办公室里值班，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四只听筒中的一只”，“四”这个符素单独构成一个功能单位，因为该符素使人想到整个故事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概念（先进的官僚技术的概念）。事实上，叙事单位在这里不是语言单位（这个词），而仅仅是语言单位内涵的意义（从语言上看，四这个词从来不是指“四”的意思）。这说明某些功能单位可以小于句子，但仍属于话语。那么，它们超出的不是句子，因为它们实际上小于句子，而是所指层——所指层象句子一样是语言学本身的问题。

2. 单位的类别

必须把这些功能单位归入为数不多的形式类别里去。如果我们想不借助内容实质（如心理实质）确定这些类别，就必须重新仔细研究意义的不同层次。有些单位的相关单位处在

同一层次上,相反,为了充实其他单位的意义,就必须过渡到另一个层次上去。由此一开始就产生两大功能类别:一部分属分布类,另一部分属结合类。第一类相当于普罗普所说的功能。重新谈到这些功能的主要是布雷蒙,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研究要比他们详细得多。"功能"这个名称我们只用于这一类(虽然其他单位也具有功能性质)。自从托马契夫斯基作了分析以来,这一类的典型已成范例:买手枪的相关单位是以后用手枪的时刻(如果不用,记下买枪一事就反过来成了意志薄弱的表示,等等);摘下电话听筒的相关单位是以后重新挂上听筒的时刻;鹦鹉闯进菲丽西黛家的相关单位是喜爱鹦鹉、把鹦鹉制成标本等插曲。结合性质的第二大类单位包括所有的"标志"(就这个词十分通常的意义而言),那么这类单位使人想到的不是一个补充的和一贯的行为,而是一个多少有些模糊的,但又是故事的意义所需要的概念。如有关人物性格的标志,有关他们身分的情况,"气氛"的标记,等等。于是单位及其相关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分布式的(常常几个标志使人想到同一个所指,它们在话语中出现的顺序也不一定是恰当的),而是结合式的。要懂得记下的标志"有什么用",必须跨到高一级的层次上去(人物的行动或叙述),因为在那里标志的含义才会释然。用电话的数量所标志的庞德背后的行政力量,对庞德在接电话时所参与的一系列行动没有任何影响。行动力量只在行动者的总的类型(庞德站在现存秩序一边)上才具有意义。标志之间关系的性质可以说是垂直的,所以是真正的语义单位。因为,与严格意义上的"功能"相反,标志使人想到一个所指,而不是想到一个"动作"。标志的断定在"上面",

有时甚至是潜在的，在明显的组合段以外（人物的“性格”可以从不明说，但不断有所标志），这是一种纵向聚合的断定。相反，功能的断定只是在“后面”，这是一种横向组合的断定。因此，功能与标志掩盖着另一种传统的差别：功能包含换喻关系，标志包含隐喻关系；前者与行为的功能性相符，后者与存在的功能性相符。

有了功能和标志这两大类单位，我们已经可以将叙事作品进行某种分类。有些叙事作品功能性强（如民间故事），相反，有些叙事作品标志性强（如“心理”小说）。在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从属于历史、社会体裁的中间形式。但，还不只于此。在这两大类里面，立即可以分别确定两小类叙述单位。就功能这大类来说，不是所有单位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有些单位是叙事作品（或叙事作品的片断）的真正的铰链，另一些单位只是“填补”把功能—铰链隔开的叙述空间。我们称前一种单位为基本功能（或核心），鉴于后一种单位的补充性质，我们称其为催化。只要功能依据的行动为以后的故事开始（或维持，或终止）一种重大的抉择，简言之，只要这行动开始或结束一种犹豫状态，功能就是基本的。如果在片断叙事作品里，“电话铃响了”有可能接电话，也有可能不接电话，这一定会把故事引向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相反，在两个基本功能之间，总可以围绕这个或那个核心安排一些次要的标记而不改变核心的选择性。“电话铃响了”和“庞德听电话”之间可以用许多细小的枝节或细微的描写来充实。譬如，“庞德走向办公桌，拿起听筒，放下香烟”等等。这些催化只要与一个核心有关系，仍然是功能性质的。不过，它们

的功能性减弱了，是单方面的，寄生的，因为这里是纯时序的功能性（描写故事的两个时刻之间的事情），至于在连接两个基本功能的关系里，被赋予的是一种双重的功能性，既是时序的，又是逻辑的。催化只是连续单位，基本功能既是连续单位，又是后果单位。事实上，一切都使人认为叙述活动的动力正是连续和后果的混淆不清本身，因为叙事作品中后面发生的总是被读者视为由……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叙事作品可能系统地使用逻辑上的错误，经院派曾用此后即由此这句话来指责这种逻辑上的错误。这句话可以作为命运之神的格言，叙事作品反正只是命运之神的"语言"。而把逻辑性和时间性"混同一体"的，是基本功能的结构。这些基本功能初看上去可能丝毫没有意义。构成基本功能的东西不是壮观的场面（所陈述的行动的重要性、规模、罕见性或力量），而是所冒的风险，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基本功能是叙事作品中冒风险的时刻，在那些抉择点之中，在那些分布点之间，催化支配着一些安全地带、停顿、细枝末节。这些"细枝末节"并非无用。从故事的角度来看，再说一遍，催化具有的功能性可能很弱，但绝非没有。哪怕（对其核心来说）是纯粹多余的，也仍然是信息经济的一部分。但情况不是这样：一个标记，虽然表面是多余的，但总具有推论的作用。它可以使话语加快，减慢，重新开始，它可以概述，预示，有时甚至使读者感到迷惘。标记的事物看来总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催化不停地使话语的语义处于紧张状态，不停地表示：曾经具有或将要具有意义。因此，不论怎样，催化的恒定不变的功能是（用雅可布逊的话来说）交际性功能，

维持叙述者与接受叙述者之间的接触。说实在的，取消一个核心而不使故事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但取消一个催化而不使话语发生变化也是不可能的。至于叙述单位的第二大类（标志），结合类，其单位的共同点是，只有在人物层或叙述层才能被充实（补足），所以这一类的单位属参数关系。参数关系的第二项是含蓄的，是随着插曲、人物或整个作品而延续和扩展的。但，我们从中能辨别出反映性格、情感、气氛(如猜疑气氛)、哲理等严格意义上的标志，也能辨别出用以说明身份和确定时间和空间的信息。说庞德在办公室里值班，从办公室打开的窗户可以看到滚滚乌云的空隙间的月亮，这是标志一个雷雨将临的夏夜，并且这一推理本身也形成一个气氛的标志，预示一个人们还不晓得的行动的令人压抑不安的气氛。因此，标志总有一些含蓄的所指。相反，信息成分却没有，至少在故事层没有，因为这是些直接有所指的纯资料。标志意味着辨认活动：读者要学会认识性格、气氛。信息成分提供的是现成的知识，其功能性同催化的功能性一样是很微弱的，但也并非没有。信息成分不论对故事的其余部分来说反响如何"微小"，仍可用来证实所指的真实性，使虚构扎根在真实之中，因此，这是个实在的起作用的成分，并凭此而具有不可否认的功能性，当然，不是在故事层，而是在话语层。

核心和催化，标志和信息成分（再说一遍，名称并不重要），看来，这些就是功能层上的单位可以初步分成的类别。关于这种分类，还要补充两点说明。首先，一个单位可以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别。（在候机室里）喝一杯威士忌酒可以作为（基本上）表示等待的催化，也同时是某种气氛

（现代化、轻松、回忆等）的标志。换句话说，有些单位可以是混合单位。这样，在叙事作品的经济学里可以有一整套的变化。在小说《金手指》中，即将搜査对手房间的庞德，从他的支持者那里拿到一把万能钥匙。这个标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本的)功能。在电影里，这一细节改成了庞德以开玩笑的方式从打扫房间的女佣手里抢出一串钥匙，女佣并未抗议。这一标记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而且也是标志性的，它反映了庞德的性格（他随随便便并讨女人喜欢）。其次，应该指出（这在后面还要谈到），我们上面提到的其他类别可以采取另外的分法，面且更符合语言学的模式。实际上，催化、标志和信息成分有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核心的扩展。核心（我们下面即可看到）形成一个个项数不多的有限的集，受逻辑的支配，既是必需的，又是足够的。有了这个固定的骨架，其他单位便按照原则上可以无限增生的方式来加以充实。大家知道，句子的情况就是这样：句子由简单的分句组成，面分句由于重复、填补、修饰等等而变得复杂无比。叙事作品如同句子一样，可加以无穷无尽的催化。马拉美对这种结构极其重视，以至用这种结构写了他那首诗：《掷骰子永远取消不了偶然》。我们可以把这首诗及其“波节”和“波腹”，“波节词”和“波腹词”一起看作一切叙事作品（一切言语行为）的纹章。

3. 功能的句法

这些不同的单位是如何，是根据什么“语法”，沿着叙述的组合段彼此连接起来的呢？功能组合的规则是什么？信息成分和标志可以自由地互相结合。譬如肖像就是这样：肖像

把说明人物身分的材料和人物个性的特征无拘无束地并列在一起。一种简单的蕴涵关系把催化和核心结合在一起。催化必需包含有借以依附而不是互相依附的基本功能。至于基本功能，将其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互相支持的关系。一个这一类的功能有义务支持另一个同类的功能，反之亦然。关于这后一种关系，我们要多说几句。首先，因为这种关系确定叙事作品的骨架本身（扩展可以删掉，核心则不能）；其次，因为试图使叙事作品具有一定结构的人关心的主要是这种关系。

我们已经指出，叙事作品结构本身造成连续和后果，时间和逻辑混淆。叙述句法的中心课题即是研究这种混淆不清的状态。叙事作品的时间背后存在无时间性的逻辑吗？学者们对这问题的看法至今还未取得一致。大家知道，普罗普的分析为目前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他极其重视时序的不可改变性。在他看来，时间是实在的事物，所以他认为必须将民间故事扎根在时间里。然而，亚里士多德本人在比较悲剧（用情节一致来说明其特征）和史诗（用情节多和时间一致说明其特征）的时候，已经使逻辑优于时序。目前的所有学者（列维-施特劳斯、格雷马斯、布雷蒙、托多罗夫）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大概都会同意列维-施特劳斯的以下建议（尽管在其他问题上意见分歧）："时间连续的顺序消融在不表示时间的母结构里。"目前分析的趋势事实上是使叙述内容"非时序化"和"重新逻辑化"，使之服从马拉美在论及法国语言时所谓的"逻辑的严格要求"。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至少我们的愿望是如此），任务是能够为时序的假象做出结构上的描述，要叙述逻辑，阐明叙述时间。我们也许可以换个方式说，时间性只是叙

事作品(话语)的一个结构类别,完全同语言里一样,时态只以体系的形式存在。从叙事作品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谓的时间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只作为符号体系的成分在功能上存在。时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话语,而属于所指对象。叙事作品和语言只有一个符号学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指事物的、“现实主义的”(如同普罗普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假象。正因为如此,结构描述要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约束叙事作品主要功能的逻辑究竟是什么逻辑呢?这正是我们积极努力解决和迄今争论得最多的问题。我们请读者参阅格雷马斯、布雷蒙、托多罗夫在《交际》杂志1966年第8期上发表的论述功能逻辑的文章。托多罗夫在文章中陈述了目前研究中的三种主要方法。第一种是比较正规的逻辑方法(布雷蒙),旨在重建叙事作品运用人类行为的句法,描述在故事的每个点上某个人物必须要遵循的“选择”路线,以此来阐明也许可以称之为有效逻辑的东西,这种逻辑在人物决定行动的时刻抓住人物。第二种是语言学方法(列维-施特劳斯,格雷马斯)。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想在功能中找到纵向聚合的对立,这些对立符合雅可布逊的《诗学》原则,沿着叙事作品的纬线“展开”(但大家将看到格雷马斯为纠正或补充功能纵向聚合说所做的新的发挥)。第三种是托多罗夫提出的方法,稍稍有些不同,因为这种方法把分析放在“行动”(即人物)层上,试图拟定叙事作品赖以将一定数量的基本谓语加以组合、变化和转换的规则。

在这些不同的假设之间不存在做出选择的问题,这些假设目前正处在草创阶段,它们之间并不敌对,而是互相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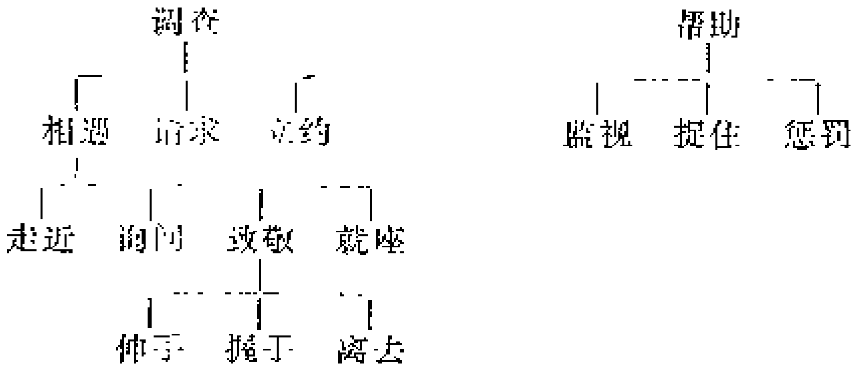
我们在这里不揣冒昧就分析的规模仅作一点补充。在一部叙事作品里（主要指小说而不再是民间故事），即使不谈标志、信息成分和催化，还有一批数量很大的基本单位。上述几种分析方法迄今只研究叙事作品大的分节，许多基本单位掌握不了。然而，必须设想一种足够详尽的描述方法，以便说明叙事作品的所有单位及其最小的切分成分。我们再说一遍，基本单位不能以其“长短”来确定，只能以它们之间关系的（双重蕴涵的）性质来确定。“打电话”，不论看上去如何无关紧要，本身一方面包含了几个基本功能（铃响，摘下话筒，讲话，挂上听筒），另一方面，从整体来说应该能够，哪怕是逐步地将其与小故事的大的分节连接起来。叙事作品的功能覆盖层要求有一个中继组织，其基本单位只能是一小群功能，我们在这里将(步布雷蒙的后尘)称之为一个序列。

一个序列是一连串合乎逻辑的、由连带关系结合起来的核心。序列始于一个与前面没有连带关系的项，终于另一个没有后果的项。我们故意用一个无关紧要的例子来说明：叫一杯饮料，收到饮料，喝掉饮料，付饮料钱，这些不同的功能构成一个显然是封闭的序列，因为不可能在要饮料之前或付了钱之后再加上什么东西而不超出“饮料”这个统一的整体。事实上，序列总是可以命名的。普罗普以及布雷蒙在确定民间故事的大功能时已经起了名称（如舞弊，背叛，斗争，契约，诱惑等）。命名的做法对无关紧要的序列来说，对那些常常构成叙述织物的最小颗粒——也许可以称之为“微型序列”来说，也是免不了的。给序列命名仅仅是分析家的事吗？换句话说，命名是纯粹原语言吗？无疑是的，因为命名

是阐述叙事作品的代码。但可以想见，这些命名是读者（或听众）自己的原语言的一部分。读者（或听众）把一连串符合逻辑的行动理解为一个名称的整体：阅读即命名；听，不仅仅听到语言，而且也造语言。序列的名称与翻译机器中那些以可接受的方式覆盖众多不同意义和细微差别的“覆盖词”相当类似。我们心中的叙事作品的语言一开始就包含这些基本项目。构成一个序列的完整的逻辑是与其名称紧密联在一起的，凡是开始一个诱惑序列的功能，从它出现开始，便在随之出现的名称里强行规定了诱惑的全过程，就象所有在我们心中形成了作品语言的叙事作品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序列即使由少数核心（也就是说实际上由“分布点”）组成，不很重要，也仍然包含一些风险的时刻，这正说明要加以分析的必要。把敬烟（给烟、接烟、点火、吸烟）这一连串合乎逻辑的细小行动组成序列，也许看上去微不足道，但这样做正因为在这些细小行动的每个点上都存在两种可能性，以致意义因选择而有所不同。譬如，詹姆斯·庞德的支持者杜邦用打火机给庞德点烟，但庞德不要。这个分叉的含义是，庞德本能地担心打火机有诈。因此，如果大家同意，序列是一个受威胁的逻辑单位。这是对序列的最低限度的解释。也可以对序列作最大限度的解释：序列由功能组成，有始有终，归在一个名称下面，本身构成一个新的单位，随时可以作为另一个较大的序列的简单的项而发挥作用。下面是一个微型序列：伸手，握手，松手。这个敬礼变成一个简单的功能，一方面起标志的作用（杜邦的无精打采和庞德的反感），另一方面整个又是一个更长的、称之为相遇的序列

的项。该相遇序列的其他诸项（走近，驻足，询问，敬礼，就坐）各自也可能是微型序列。就这样，从最小的母句到最大的功能，一整套取代网形成叙事作品的结构。当然，这仍然是功能层内的等级关系。只有当叙事作品逐步展开，从杜邦的香烟发展到庞德反金手指的斗争，功能分析才告终结；这时，功能的金字塔才触及下一层（行动层）。所以，既有序列内部的句法，又有序列之间的（取代的）句法。这样《金手指》的第一个插曲便呈现为如下"世系"状态：



用这个图表来说明显然是为了便于分析。读者可看到一连串直线排列的项。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个序列的项很可能彼此互相交错在一起。一个序列尚未结束，新序列的首项可能已经在前一个序列中出现了。几个序列以对位的方式同时向前移动。从功能上来说，叙事作品的结构同赋格曲一样，正因为这样，叙事作品既"连下去"又"吸进来"。确实，只有当构成序列交错的封闭块（或"世系"）差不多被上一级的行动（人物）层吸收了，序列交错才可能以彻底中断的现象在同一作品内部停止出现。《金手指》由三个功能上独立的插曲组成，因为这三个插曲的功能世系两次中断沟

通：在游泳池插曲和诺克堡插曲之间没有任何序列关系，但还有行动者的关系，因为人物（从而人物的关系结构）还是原来的。我们在这里认出了史诗的特点（许多故事的结合）：史诗就功能层来说是不连贯的叙事作品（这一点可以从《奥德赛》或布莱希特的戏剧中得到证实）。因此，功能层（该层提供了大部分的叙述组合段）必须由上一级的层次来完成。在上一级层次里，第一层的单位逐步取得意义。这一层即行动层。

三 行 动

1. 人物结构法则

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人物概念是次要的，完全从属于行动概念。亚里士多德说，可能有无"性格"的故事，不可能有无故事的性格。这个看法曾为古典文艺理论家们（如福西乌斯）所接受。以前只是空有其名的人物——行动的主体，后来有了心理内容，变成了个体，一个"人"，总之，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即使他什么事也不做。当然，人物甚至在行动之前就已不再取决于行动了，而是一上来就体现了心理本质。这些心理本质可以加以清点，清点的最纯粹的形式是资产阶级戏剧的"角色"单子（风流女子，贵族父亲，等等）。结构分析从诞生的那天起最讨厌把人物当做心理本质，哪怕是为了分类。如同托多罗夫指出的那样，托马舍夫斯基甚至否认人物有任何叙述上的意义，后来他把这一观点说得婉转了一些。普罗普没有到拒不分析人

物的地步，但仅仅根据叙事作品赋予人物的统一的行动，而不是根据心理，把人物压缩成简单的类型（授以法宝的人，助手，坏人，等等）。

自普罗普起，人物不断给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提出同样的问题：一方面，人物（不管人们怎么称呼：剧中人也好，行动者也好）是描述的一个必要的部分，离开了这部分，作者讲的那些细枝末节的"行动"就无法理解，因此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部叙事作品是没有"人物"的，或没有"行动主体"的。但，另一方面，这些为数众多的"行动主体"既描述不了，也不能用具体的"人"来分类。不论我们把"人"视作只限于（确实是我们最为熟悉的）某些种类的纯历史的形式，从而必须把包含行动主体而不是人的所有叙事作品（民间故事，当代作品）排除在外，还是宣称"人"仅仅是我们时代强加给纯叙述主体的一种合理化的说法。结构主义十分注意不用心理本质这样的词来说明人物的特点，迄今一直努力用各种各样的假设来说明人物的特点，将其视为"参与者"而不是"有生命的人"。布雷蒙认为，每个人物都可以成为他自己的行动序列（欺骗，诱惑）的主体。当同一个序列里有两个人物时（这情况是正常的），该序列就包含两种前景，或者，如果大家喜欢，就包含两个名称（对一个人来说是欺骗，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上当）。总之，每个人物，即使是次要的，也都是自己序列的主人公。托多罗夫在分析"心理"小说（《危险的关系》）时，不是从人物——人出发，而是从人物之间可能发生的、他称之为基础谓语（爱情、交际、帮助）的三种主要关系出发。分析使这些主要关系服

从两种法则：当说明其他关系时，是派生法则，当描述这些主要关系在故事中的变化时，是行动法则。在《危险的关系》中有许多人物，但“人们有关人物的议论”（人物的谓语）可以任凭分类。最后，格雷马斯建议不根据人物是什么，而根据人物做什么（行动者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来描述和划分人物，因为人物是三大语义轴的组成部分：交际、欲望（或追求）和考验。这三大语义轴在句子中也遇得到（主语，宾语，表语，状语）。人物作为三大语义轴的组成部分是成双成对安排的，所以无穷无尽的人物世界也服从于一种投射在整个叙事作品中的纵向聚合结构（主体/客体，施惠者/受惠者，辅助/反对）。既然行动者说明一种类别，那么行动者就可以根据倍增、取代或缺失的法则调动不同的演员来担任。

这三种看法有许多共同点。主要的，我要再说一遍，是用人物参加一个行动范围来说明人物的特征。这些行动范围为数不多，有代表性，可加以分类。所以尽管第二描述层是人物层，我们在这里还是称为行动层。行动一词在这里不应理解为形成第一层织物的细小行动，而是指Proxis（实例）的大的分节（欲望，交际，斗争）。

2. 主体问题

叙事作品的人物分类问题，至今尚未很好解决。诚然，大家对以下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即叙事作品中无数的人物可以服从种种取代法则，即使在作品内部，同一个形象可以扮演不同的人物。另一方面，格雷马斯建议的行动者模式（托多罗夫也使用这一说法，但角度不同）看来颇经得起大量叙

事作品的检验。行动者模式象一切结构模式一样，其价值不在于既定的形式（六个行动者的母式），而在于能适应有规律的变化（缺失，混同，重复，取代），从而使人指望有个叙事作品的行动者的分类学。但是，当母式具有很好的分类能力时（格雷马斯的行动者模式即如此），一旦用前景来分析人物参与的行动，就不能很好地说明其复杂性了。当这些前景受到尊重时（在布雷蒙的描述里），人物体系就显得过于琐细了。托多罗夫建议的简化模式可以避免这两个暗礁，但这个简化模式至今只在一部叙事作品上试验过。所有这些不同观点看来可能很快一致起来。人物分类的真正困难在于主体在行动者母式中的地位（也即是存在），不论母式的样子如何。一部叙事作品的主体（主人公）是谁呢？有没有一类享有优惠的角色呢？我们的小说已经使我们习惯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有时是曲折的（否定的）方式，强调许多人物中的一个。但这种优惠远未遍及所有叙事作品。因此许多叙事作品使两个对手围绕一个对象进行斗争。这样，两个对手的“行动”是对等的。于是主体是真正双重的，我们更加不能用取代简化主体。这甚至还是一种常见的古老形式，叙事作品如同某些语言一样，好象也有*双数*人称。这种双数人称使人特别感兴趣，因为双数人称使叙事作品类似某些（十分新式的）比赛的结构。在这类比赛中，两个平等的对手都想夺得由裁判发的球。这个方案使人想起格雷马斯建议的行动者母式。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比赛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也属于人们在语言和叙事作品中所遇到的同样的符号结构，就不会对此说法感到惊讶：比赛也是一个句子。如果我们保留一个享

有优惠的角色类别（追求，欲望，行动的主体），至少必需使这个行动者从属于语法人称而非心理人称的范畴本身，以便使之变得灵活些。为了能够描写单数、双数或复数的人称的（我/你）或非人称的（他）行动主体，并加以分类，就必须再次接近语言学。解决行动层的关键（也许）将是人称的语法范畴（在我们的代词里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语法范畴只能按话语的主体而不是按实际的主体来划定，所以人称作为行动层的单位，只有当人们将它们与描述的第三层结合起来的时候，才具有意义（才可以理解）。我们在这里称第三层为叙述层（与功能和行动相对而言）。

四 叙 述

1．叙述的交际

如同叙事作品内部有一个（分布在施惠者与受惠者之间的）大的交流功能一样，叙事作品作为客体也是交际的对象；有个叙事作品的授与者，有个叙事作品的接受者。大家知道，在语言交际中，“我”和“你”是绝对互为前提的。同样，没有叙述者和听众（或读者）的叙事作品是不可能有的。这道理也许很平常，然而并未充分说透。诚然，信息发送者的作用人们已经讲了许多（人们研究一部小说的“作者”而不考虑“作者”是否就是“叙述者”）。至于读者问题，文学理论则羞羞答答很少谈及。事实上，问题不是探究叙述者的动机，也不是探究叙述对读者产生的影响。问题是

描述在整个叙事作品里叙述者和读者得以表示的代码。叙述者的符号初看上去比读者的符号(叙事作品里"我"比"你"用得多)要显眼，数量要多。其实，只是读者的符号比叙述者的符号更为复杂罢了。因此，每当叙述者不再"表现"，而是汇报他了如指掌而读者一无所知的事实时，由于意义的缺失，便产生一个阅读符号，因为叙述者给自己一个信息是没有意义的。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告诉我们："莱奥是这家工厂的老板"。这是一个读者的符号，接近雅各布森所谓的交际的意向功能。我们由于没有总结过，暂时将接收的符号（虽然也同样重要）放在一边，先讲叙述的符号。

谁是叙事作品的授与者呢？迄今似乎已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叙事作品是一个人（就该词的实足的心理意义而言）表达出来的，这个人有个名称，即作者。在作者身上有个定期提笔写故事的，清晰可辨的人，他的"个性"和艺术不停地互相交流。因此叙事作品（主要是小说）仅仅是作品以外的"我"的表达。第二种看法把叙述者当做一种完整的意识，似乎是无个性的，该意识从高超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讲故事。因此叙述者既在人物之内（既然人物心中所想的一切他全都知道），又在人物之外(既然他从不与任何一个人物认同）。第三种看法是最新的看法（如亨利·詹姆斯、萨特），规定叙述者必须将其叙述限制在人物所能观察到的或了解到的范围之内。因此叙事作品的表达者似乎是轮流由每个人物担当。这三种看法似乎都把叙述者和人物看做真的、"活的"人（文学这个神话所具有的永恒的魅力大家是知道的），好象叙事作品原来就限定在它的所指层上（同

题在于都是"现实主义的"观点)。所以这三种看法都同样地欠妥当。然而，至少从我们的观点来说，叙述者和人物主要是"纸头上的生命"。一部叙事作品的（实际的）作者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同这部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叙述者的符号在叙述作品内部，因此完全可以进行符号学的分析。但是，为了确定作者本人（不论作者是公开出面，还是藏而不露）是否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符号"，那就必须假设在"人"与其语言之间存在一种记录人体特征的关系。这种关系把作者当成实在的主体，把叙事作品当成这个实体的表达工具。这是结构分析所不能接受的，理由是（在叙事作品中）说话的人不是(在生活中)写作的人，写作的人也不是存在的人。

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叙述（或叙述者的代码）同语言一样，只有两个符号体系：人称体系和非人称体系。这两个体系不一定利用与人称（我）和非人称（他）有关的语言记号。譬如，可能有些叙事作品，或者至少有些插曲，是以第三人称写的，而作品或插曲的真正主体却是第一人称。如何来确定呢？把用"他"写的作品(或段落)重新用"我""改写"过就行了，只要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改变语法代词之外不对话语产生任何其他影响，我们就肯定没有离开人称体系。《金手指》的开头尽管是用第三人称写的，实际上仍是詹姆斯·庞德讲的。主体要是变了，就不可能进行改写。因此，"他看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仪态还很年轻……"这个句子尽管用"他"，仍然是十足的第一人称("我，詹姆斯·庞德，我看到……")，但，"冰块碰在玻璃杯上的叮当声似乎突然启发了庞德"这个叙述句，由于动词"似乎"变为

非人称的符号（而不是"他"），则不可能是有人称的。无人称是叙事作品的传统形式，这是肯定的，因为语言已经制订了一整套适用于叙述（用不定过去时）的、旨在排除说话人的现在的时态体系。本温埃斯特说："在叙事作品里，没有人说话。"然而，人称主体（以种种或多或少是改头换面的形式）渐涌进了叙事作品，由于叙述就发生在说话的当场和即刻（这是人称体系的定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叙事作品，而且是最普通的叙事作品，常常在同一个句子的限度的，以极快的速度交替使用人称和无人称。就象《金手指》中的这个句子一样：

他的眼睛	有人称
青灰色	无人称
紧盯住杜邦的眼睛，使他不知所措，	有人称
因为那凝视的目光里包含着天真、嘲讽 和自卑的神情	无人称。

混合使用人称体系显然是一种熟巧。这种熟巧甚至可以成为一种特技。例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有部侦探小说（《五点二十五分》），仅仅靠了在叙述人称上耍弄花招才维持住解不开的谜。作者从内心去描写人物，而这个人物已经是凶手。好象在同一个人身上既有包含在话语里的见证人的意识，又有包含在所指里的凶手的意识。唯有大量反复使用这两种人称体系才会造成不可解的谜。所以，我们懂得为什么在文学的另一个极端，人们把严守所选择的人称体系当做作品的必要条件，尽管往往不能坚持到底。

严格遵守所选择的人称体系，虽然为某些当代作家刻意

追求，但从美学角度来说，并不一定非如此不可。所谓的心理小说，一般都是两种体系混在一起，先后交替使用无人称符号和人称符号。实际上（奇怪得很），“心理状态”也不可能只用一个人称体系来表达。原因是，如果整个叙事作品只用一个话语主体，或者如果大家愿意，都是言语行为，那么人称的内容本身就会受到威胁。（所指对象的）心理上的人称与语言上的人称没有任何关系，语言上的人称一向不用性情、意向或外貌特征来说明，而只用它在话语中(规定的)地位来说明。我们今天着重谈论的是这个形式上的人称。这是一次重大的破坏(公众也有作家不再写“小说”的印象)，因为这次破坏旨在使叙事作品从（迄今所处的）单纯陈述性的变成行为性的。就行为性来说，一句话的意义即说这句话的行为本身。

今天，写作不是“讲故事”，这意思是说，作者叙述并把全部所指事物（所言之物）都归于这言语行为。所以一部分当代作品不再是描述性的，而是传递性的了。因为这部分作品力求表现纯而又纯的现在，结果是整个故事由于归结为(或扩展为)词语，整个话语同说出话语的行为变成一回事了。

2．叙述作品的语境

于是，叙述层为叙述性的符号——即全部算符所占据，算符把功能和行动重新纳入以授与者和接受者为基础的叙述交际里。有些叙述性符号已经研究过了。我们知道口头文学作品中的某些朗诵规则（格律的形式，表达的习惯做法），也知道“作者”不是创作美妙故事的人，而是熟练掌握他和听众共同使用的代码的人。在这种口头文学作品中，叙事的

层次极其清晰，规定极其严格，一个不具备叙事作品的规定符号的（“从前”，等等）“故事”是难以设想的。在我们的书面文学作品中，人们很早就找到了“话语的形式”（实际上是叙述性的符号）。如柏拉图拟定的作者插话方式的分类（后为狄俄墨得斯所采纳），叙事作品开头和结尾的规定，不同表现风格的定义（直接陈述，间接陈述及其隐避陈述），“叙述角度”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叙述层。当然，还要加上整个写作问题，因为写作的作用不是“传递”叙事作品，而是将其公诸于众。

下级层次的诸单位确实是在公布的叙事作品中聚集起来的，因为作为叙事作品，其最终的形式要高于作品的内容和纯叙述的形式（功能和行动）。这说明叙事的代码是我们的分析所能达到的最后层次，除非离开客体——叙事作品，也就是说，除非违背作为分析依据的内在规律。事实上，叙述不可能从使用它的外界取得意义，超过了叙述层就是外界，也就是说其他体系（社会的，经济的，思想意识的体系）。这些体系的项不再只是叙事作品，而是另一种性质的成分（历史事实，决心，行为等等）。如同语言学的研究到句子为止一样，叙事作品的分析到话语为止，随后就要进入另一种符号学了，语言学知道这种界限，已经假设（虽然尚未深入研究）这些界限为“语境”。哈里迪把所有无联系的语言事实称为“语境”（与句子相对而言），普里托则把“信息接收人在信号显示的时候所知道的与信号显示无关的全部语言事实”称为“语境”。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凡叙事作品都依附于一种“叙事作品的语境”——即叙事作品赖以完成

的全部规定。在所谓的“古代”社会里，叙事作品的语境是有严格规定的。在今天，只有先锋派文学还梦想有阅读的规定，马拉美关于阅读的规定是戏剧式的，他要使他的诗歌根据一种严密的组合能在公共场合朗读；比托尔关于阅读的规定是印刷式的，他试图给书籍配上自己的符号。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的社会是把叙事作品的语境的编码尽可能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为叙事作品虚构一个合情合理的情境，不为之“举行开幕仪式”，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试图以此使叙事作品看上去象真的一般。这类叙述方法多得不可胜数。如书信体小说，所谓发现的手稿，同叙述者萍水相逢的作者，故事先于片头出现的影片，等等。不喜欢公开代码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群众文化的标志。无论是资产阶级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群众文化，都需要没有符号外表的符号。但是，这只不过是结构的次要症状，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今天，打开一本小说，一份报纸或一架电视机的行为尽管如此平常，如此随便，但这一微不足道的行为仍旧一下子把我们所需要的叙述代码整个儿安到了我们身上。这样，叙述层就具有一种模棱两可的作用：与叙事作品语境相连（有时甚至把作品语境包含在内）的叙述层打开了通向外界的大门，叙事作品展现（消费）的外界的大门，但同时，使以前的层次封顶的叙述层封上了叙事作品的大门，终于使之成为一种语言的言语，这种语言规定着和包含着自己的原语言。

五　叙事作品的体系

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可以由两种基本过程的协作来说明其

特征：产生单位的分节或分段（按本温埃斯特的看法，这是形式），把这些单位收罗到上一层单位里去的结合（这是意义）。在叙事作品的语言里也存在这两种过程，也有一个分节和一个结合，一个形式和一个意义。

1．畸变和扩展

叙事作品形式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两种能力：将其符号沿着故事膨胀开来的能力和将无法预见的扩展纳入这些畸变的能力。这两种能力看上去好似两种自由，但叙事作品的特性正在于把这些"差别"包含在自己的语言之中。

语言中存在符号畸变的现象，巴里研究过法语和德语中的符号畸变问题。一旦(信息的)符号不再是简单的并列，一旦(逻辑的)直线性被打乱(如谓语在主语之前)，就有词序失常现象。在一个信息链中，同一个符号的诸部分被其他符号分隔开来的时候，例如否定语组 ne jamais 和动词a pardonné在句子里：elle ne nous a jamais pardonné（她一直没有原谅我们），我们便见到词序失常的主要形式：符号被分成几个部分，有指被分散在几个互相隔开的能指里，这几个能指单独分开来就无法懂得它们的意义。这正是叙事作品中所发生的现象，我们在功能层已经看到：一序列的诸单位，虽然在该序列上形成一个整体，但可能由于其他序列的单位插入而被互相分隔开来。我们已经说过，功能层的结构象赋格曲式。巴里把词序失常占优势的综合型语言（如德语）与更为尊重逻辑的直线性和单义性的分析型语言（如法语）加以对比，用他的术语来说，叙事作品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主要以嵌入和包裹句法为基础的语言：叙事作品的每个点同时向

几个方向辐射。詹姆斯·庞德在等候飞机的时候要一杯威士忌酒，这杯威士忌酒这时作为标志具有多大价值，这是一个集中了几个所指（现代化，富有，悠闲）的符号结。但是，要一杯威士忌酒，作为功能单位，必须经过许多中继站（喝酒，等待，出发等等）才能逐步获得它的最后意义。功能单位被整个叙事作品"抓住"，而叙事作品也只有靠其功能单位的畸变和辐射来"维系"。

遍及整个叙事作品的畸变使叙事作品的语言具有独特的标志：纯逻辑的现象。因为畸变是建立在一种常常相距很远的关系上，也因为畸变调动一种对智力记忆的信心，所以畸变不停地用意义代替所述事件的单纯的重复。在"生活"中两人相会的时候，坐下的动作不立即随着请坐的邀请而发生是不大有的。在叙事作品中，这些从模仿的角度来说是毗连的单位，可能被一长串属于完全不同的功能范畴的插入单位分隔开来，从而形成一种与真正的时间关系很少的**逻辑时间**，因为看上去分散开来的诸单位总是由联接序列诸核心的逻辑紧紧地维系着。"悬念"显然只是畸变的一种特殊形式，或者，如果大家喜欢，只是畸变的一种夸张的形式。一方面，悬念以维持一个开放性序列的办法（以种种延宕和重新推出的手法）加强同读者（听众）的接触，具有实际的功能；另一方面，悬念使畸变受到未完成的序列的威胁，受到开放性的聚合的威胁（如果象我们认为的那样，凡是序列都有两极），也就是说，受到逻辑混乱的威胁。读者以焦虑而快乐（因为逻辑混乱最后总是得到了弥补）的心情享受的是这种逻辑的混乱。因此，悬念是一种耍弄结构的手法，旨在，如

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使结构承担风险，同时也使结构增加光彩。因为悬念是真正心智上的颤动。悬念以表现不稳定的顺序（而不再是序列）的方式完成了语言概念本身。显得最为感人的地方也是最要动脑子的地方，所以说“悬念”抓住人的“思想”而不是“五脏六腑”。

分隔得开的，也填补得上。功能的核心由于膨胀开来而露出一个个的间隙，这些间隙几乎可以无限量地加以填补。人们可以用大量的催化填补空隙。但是，这里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类型学，因为催化的任意性可以根据功能的内容（有些功能较另一些功能用催化来陈述更好，譬如期待）加以调节，也可根据叙事作品的内容（文字所具有的种种分离的可能性，也即催化的可能性，要大大超过影片，叙述一个动作较之用画面表现同一个动作要容易“切割”开来）加以调节。从叙事作品的催化能力可以推论出叙事作品的省略能力。一方面，一个功能（如他吃一餐营养丰富的饭）可以将自身所包含的潜在的催化（如吃饭的细节）统统省略掉，另一方面，可以把一个序列简单化成为序列的几个核心，把序列的等级体系简化成为序列的几个高级项，而不影响故事的意义。一部叙事作品即使全部组合段被简化成为几个行动者或几个大的功能（好象是诸功能单位逐步升级的结果一样），也还是可以辨认得出来。换句话说，叙事作品被简化成为梗概（过去称之为内容提要）。初看上去，凡是话语都可以被简化成为梗概。但是，每种话语有每种话语梗概的特点。譬如抒情诗仅仅是一个所指的大量隐喻，写抒情诗的梗概，就是说出这个所指，而这样大刀阔斧动手术，结果使诗歌失去

原有的面目（梗概，抒情诗被简化成为所指：爱与死）。所以我们确信不能给诗写梗概。相反，叙事作品的梗概（如果按照结构的标准来做）保持了信息的个性。换句话说，叙事作品可以移译而不损害基本意思。不可移译的东西只限于最后一层：叙述层。譬如，叙述性的能指很难从小说转移到影片上去，影片只在十分例外的情况下才处理人称，而且叙述层的最后一级，即文字，不能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或者很难转移）。叙事作品的可译性来自作品语言的结构。那么，反过来，把一部叙事作品中（种种）可移译的和不可移译的成分区分出来并加以归类，也能找到叙事作品的语言结构。（目前）存在的种种不同的、各显神通的符号学（文学，电影，连环漫画，广播）为这种分析方法打开了方便之门。

2．模仿和感觉

在叙事作品的语言中，第二个重要的过程是结合。从某个层次分开来的东西（如一个序列）常常被连接到高一级层次上去（如级别高的序列，分散各处的标志的总的所指，一类人物的行动）。一部叙事作品的复杂程度可以与一张组织机构图表相比，可以把倒叙过去和展望未来都结合进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形式多样的结合抵销了似乎不可驾驶的一层单位的复杂性，是形式多样的结合指导我们对不连贯的、连贯的和混杂的成分的理解（如同这些成分是由组合段产生的一样，而组合段只有一面，即连续）。如果我们按格雷马斯的说法，称意义单位（如含有一个符号及其上下文的单位）为同位，我们就可以说结合是一个同位因素。因为每个（纯

合）层都将自己的同位给予下层单位，防止意义“摇摆不定”——这种情况定会发生，如果我们感觉不到层次的差距。然而，叙述的结合看上去并不整齐匀称，不象漂亮的建筑物那样，用对称手法把无数简单的元件拼成几个复杂的整体。同一个单位经常会有两个关联项，一个在一层（一序列的功能），另一个在另一层（表示行动者的标志）。这样，叙事作品看上去就象是一连串紧密交错的直接成分和间接成分。词序失常指导“横向”阅读，而结合则在横向阅读层上加一层“纵向”阅读，从而造成一种结构上的“跛行”，如同不断变化的势能那样，叙事作品从其高低不一的起伏中获得“活力”或能量。每个单位都在其表层和深层被看出来，叙事作品也就是这样“前进”的。叙事作品的结构靠这两个方向的协同努力，得以枝节横生，扩展开去，展现出来——以及节制自己，所以层次一直是稳定的。当然，叙事作品是有灵活性，就象凡是说话人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具有灵活性一样，但这种灵活性严格地说是有限的，因为在语言的严密代码与叙事作品的严密代码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隙即句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如果我们试图了解一部书面叙事作品的全貌，我们会看到，作品从编码最严密的部分（音位层，甚至音素特征层）开始，逐步扩展到灵活结合的终点——句子，然后又从还很灵活的小句组（微序列）出发，伸展到大的行动，大的行动形成一个严密的数量有限的代码。这样，叙事作品的创造性（至少在“生活”的神话的外表下面）也许就在两种代码——语言学代码和超语言学的代码之间。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说，艺术（就该词浪漫意义而言）就是陈述细节，而想象则是精通代

码。爱伦·坡说过："总之，我们将看到，机灵的人总是充满了想象力，而真正富有想象力的人向来是分析家，而非其他……"

因此，对叙事作品的"现实主义"应该改变原有看法。作者告诉我们，当庞德在他值班的办公室里收到一个电话时，"心里想"："跟香港通电话总是这么糟，总是这么难打通。"可是，真正的信息既不是庞德"心里想的"，也不是通电话的蹩脚质量。这种偶然的想法也许显得很"生动"，但真正的信息，后来滋生发芽的信息，是确定打来电话的地点，即香港。因此，在任何叙事作品中，模仿仍旧是偶然的。叙事作品的功能不是"表现"，而是构成一幅景象，一幅对我们来说还是大惑不解的、但又不可能属于模仿的景象。序列的"真实性"不在于组成序列的行动之间前后连接得"自然"，而在于逻辑性，在于序列展开、冒险和首尾相符的逻辑性。我们也许可以换个方式说，序列不是起源于对现实的观察，而是起源于需要，变化和超过人所看到的原始形式即重复的需要，所以序列基本上是一个内部没有任何重复的整体。逻辑在这里具有解放的作用——整个叙事作品也具有解放作用。人们可以不断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注进叙事作品里，起码是注进形式里，因为形式已经战胜了重复并建立了变化的模式。叙事作品不是让人看见，它不模仿。在阅读一部小说时，使我们燃烧的热情不是"视觉"的热情(事实上，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而是感觉的热情，也就是说，是一种高级关系上的热情，这种高级关系也有自己的感情、希望、威胁和胜利。叙事作品中"所发生的事"从(真正的)所指事物的角度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子虚乌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

是语言的历险，语言的产生一直不断地受到热烈的欢迎。无论是叙事作品的起源还是语言的起源，我们虽然知之不多，但可以合乎情理地认为叙事作品是与独白同时产生的，似乎是对话产生以后的作品。总之，关于叙事作品的发生史，我们无意超出假设的范围，但，认为儿童在同一时刻（三岁左右）"创造"句子、叙事和俄狄浦斯，可能是意味深长的。

（张裕禾译）

写作的零度（节译）

罗兰·巴特

一、什么是写作

我们知道，语言是由传统和习惯组成的，它对于一个时代的所有作家都是共通的。这就是说，语言（langue）就象自然属性一样，是从作者的言语(Parole)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没有可能赋予它任何形式，甚至不容修饰充实；它象来自真实存在的一个抽象圈，只在圈外才开始淤积一个个密集的词句。它包容了全部文学创作，就象天、地及天地交界为人类画定的栖息之所。它绝不是材料的储库，而宁可说是一条地平线，也就是说，既是极限，又是驻留地，一句话，是一种布局的有保证的展延。在这里，作家简直汲取不到任何东西：语言(langue)对于作家更象一条界线，超越它也许会标示出言语活动(langage)的超自然属性。语言(langue)是一种活动的场域，是对一种可能的限定和期望。它不是社会的规约，而仅仅是无须选择的反射，是人的共同财富而不是作家

才有的财富；它独立于文学的程式而存在；它是通过限定而不是通过选择才成为一种社会的东西。没有什么人可以不加准备地将写作者的自由跻入语言（langue）的混沌之中，因为，能够穿透它的只是全部统一地以某种自然方式存在的整个历史。所以，对于作家，语言(langue)只是人类的地平线，它在遥远的地方建立起某种“亲近关系”，而这种“亲近关系”又具有否定性质，如果说伽缪（Camns）①和格诺(Queneau)②讲的是同一种语言（langue），那不过是通过分化作用设想所有不论是古代的或未来的语言(langue)，而这些语言正是他们所不讲的，作家的语言（langue）悬浮于废弃的和未知的形式之间，还不是一种基础，而是一种极限；它是作家在表述时，不可能无一偏失的轨迹，例如，关于奥尔菲(Orphée)③的转身，他的步态的恒定含意和他与人交往的本质的姿势。

语言(langue)就是这样寓于文学之中的。文体却不限于此，某些形象，某种叙述方式以及采用的词汇都是出自作家本人及其过去，而逐渐变成他的艺术的自动作用。这样，在文体的名义下，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语言，它仅仅潜入作者个人的隐秘的神话中，潜入言语的这种亚躯体中，构成了字词和事物的第一对组合，并且一劳永逸地建立起这种语言的基本词干。不论文体多么精微，它总有其原始的东西：它是一种没有预定目标的形式，是冲动的而不是意向的产物。

---

① 伽缪(A.Camus,1913—1960)：法国现代著名的存在主义小说家、戏剧家和批评家，1957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局外人》等。——译者注。

② 格诺(Queneau,1903—1976)：法国著名的文学家，龚古尔文学院院士，自称“文学现代性的工艺师”。——译者注。

③ 奥尔菲(Orphée)：也译作“俄耳甫斯”，出自希腊神话，他是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译者注。

它类似思想的垂直面和孤立面。它的来源涉及生物学和过去的水准，而非历史的水准：文体是属于作家的“东西”，是他的光辉，也是他的桎梏，是他的幽僻所在。文体作为个人的封闭步骤，与社会无关而又易于为社会明瞭，它绝不是选择的产物和对文学思索的产物。它是惯例的隐私部分，产生于作家的神秘的深沉处，展延于它的责任之外。它是未知的和隐秘的血肉之躯的装饰音；“需要”(Nécessité)①是它发生作用的方式，宛如花枝萌发一样，文体只是一种盲目而执拗的变形表现，是产生于肉体的和世界的限度内的“下层语言”的一部分。文体按其本意来说，是一种萌发现象，它是“气质”的蜕变。所以，文体的影射被深深地掩埋起来；言语则有一种水平结构，它的秘密与它所采用的字词同处于一条基准线上，它掩盖的部分被说话时间的延续所揭示；在说话时，一切都是现成的，即时利用，而词句表达、沉默及诸类动作一齐涌向一个已废弃的意义：这是不留痕迹又毫不迟疑的移情。文体则截然相反，它只有一个垂直面，它可以潜入千人封闭的回忆之中，从某种实际经验出发，形成它的晦暗性。文体绝不是暗喻以外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只能是文学意向与作者躯体结构之间的方程（必须提示，结构是时间延续的仓库）。所以，文体总是一种隐秘的东西，而它所涉及的材料的默默倾泻是不固依于语言（langue）的灵活多变和容许不断延续表达的本性的；它的秘密是封闭于作家躯体内的一种记忆；它的隐喻功效不是一种速度现象（这不同于言语：没有说出的话只是语言中的暂时间歇，潜在的补

① 加点处原文是大写的。下同。——译者注。

充），而是密度现象。因为，深深地潜伏在文体之下、生硬或灵活地聚合在文体辞格中的却是与语言（langage）绝对相异的现实片段。这种蜕变的奇迹使文体变成一种"超文学的操作"，并将人类带到力量和魔法的门槛前。就其生物本源来说，文体位于艺术之外，也就是说，置身于使作家与社会相联系的契约之外。因此，可以想象，一些作者宁愿选择艺术的安全，而不愿得到文体的孤独。不讲究文体的作家的典型就是纪德①，他用手工艺方式从某种古典主义的精神气质中开掘出现代情趣，颇似圣·斯爱恩②改编巴赫作品，或布朗克③改编舒伯特的作品。与此相反，现代诗歌——雨果、兰波④或夏尔⑤一类诗歌——却洋溢着文体的恬美，并且它们只在涉及诗歌意向时，才成为艺术。文体的威严，也就是语言（langage）及其对肉躯的复制之间的绝对自由的联系，正是它迫使作家象一股清新之气超逸于历史之上。

就这样，语言(langue)的水平线和文体的垂直线为作家描画出一种自然属性，因为，作家既不能选择这一个，也不能选择那一个。语言作为消极物（négativité）使可能的初始极限发挥作用，文体却是一种凝结作家气质和他的语言的**必然**。在前者那里，作家找到了与**历史**的亲近关系；而在后者那里，找到了与本人过去的亲近关系。这两种情况都和一种自然属性，也就是一种亲近动作有关。这一自然属性的能量仅仅来自操作指令，有时用于计数，有时用于变换，但永

① 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获诺贝尔奖。
② 圣·斯爱恩(Saint—Saëns,1835—1921)，法国音乐家。
③ 布朗克(Francis Poulenc,1899—1963)，法国作曲家。
④ 兰波(A.Rimbaud,1854—1891)，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
⑤ 夏尔(R.Char.1907—)，法国当代诗人，文论家。

远不能用于评判，也不能用于表明一种选择。

然而，任何一种形式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因此，在语言(langue)与文体之间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现实，这就是写作。不论在怎样的文学形式中，总有情调、气质的一般选择，而作家正是在从事选择时，他的个性才十分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语言(langue)和文体是一些先于言语(langage)的种种难题的已知条件，语言(langue)和文体是时间和生物人的自然产物；但是，作家的正规身分只有在不依赖于语法规范和文体永恒不变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地确立，在这里，书写的连续首先聚合并封闭在完全纯真的语言研究的本性中，随即变为一个总标志，变为某种人类行为的选择和某种善的肯定，同时，就这样使作家从事于某一幸福或某一不适的证明和交流，并且，把他那既规范又特殊的言语形式与他人广泛的历史连结起来。语言和文体是盲目的力量；写作却是来自历史统一性的一种行动，语言和文体是客观物；而写作却是一种功能：它是创作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它是被它的社会目的改造成的文学语言，它是紧紧依赖于人类意向并且与历史上重大转折密不可分的形式。举例说明，梅里美① 和费纳龙② 因一些语言(langue)现象和文体变化的不同而分野，但他们却使用带有同一意向的言语活动(langage)，他们参照关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种思想，接受同一种习惯的制约。他们是同一技术的反射发生地，尽管相距一个半世纪，他们仍

① 梅里美(P,Mérimée,1803—1870)：法国著名小说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以文体简洁而闻名。

② 费纳龙(Fénelon,1651—1715)：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作品带有古代文化色彩，文体纤细华丽。

以同样的姿态，使用同一工具，也许从外表看略有差异，但是，从所处情境与用法上看，却毫无区别；总之，他们的写作是相同的。与之相反，几乎可称作同时代作家的梅里美和罗特雷蒙①、马拉美②和赛利纳③、纪德和格诺、克罗戴尔④和伽缪，尽管他们都曾说过或说着在同样的历史状况下的我们的语言(langue)，但他们的写作却迥然不同；这些作家的笔调、叙述方式、目的、寓意以及言语的真诚性都将他们逐一区分开来，以致时代的一致与语言的相同和如此对立以及深受这种对立本身所限定的写作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些写作虽然根本不同，但也有可比之处，因为它们产生于性质同一的活动，这就是作家对他的形式的社会运用及其选择的思考。处于文学问题的中心（有问题才有写作），写作在本质上是形式的道德，也就是作家关于他的语言(langage)本性应置于何种社会空间所做的选择。但是，它绝非一种有效的利用的社会空间。对于作家，问题不在于选择社会群体并为之著书：他十分清楚，这种选择只能用于同一社会，除非期待着一场革命的爆发。他的选择是良知的选择而非功效的选择。他的写作是思考文学的方式而不是扩展文学的方式。进一步说，正是由于作家一点也更改不了文学成果的客观给予（这些纯历史材料他是疏漏掉的，尽管他意识到这一

---

① 罗特雷蒙(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超现实主义先驱作家。
② 马拉美(Mallarmé,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
③ 赛利纳(Céline,1894—1961)：法国现代小说家，文论家。
④ 克罗戴尔(Cloudel, 1868—1955)：法国著名诗人、戏剧家，1946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点），所以，他才自愿地把对于自由语言（langage）的需求追溯到它的本源意义而不是它的结果上。由此看来，写作是一种可作两种解释的现实：一方面，写作无可辩驳地从作家和他所处社会的对抗中产生；另一方面，从这种社会的定局出发，它通过悲剧性的移情作用，把作家遣回他的创作的手段的本源之中。历史不能为作家提供自由使用的语言（langage），而只能向他提出一种对自由创造的语言（langage）的迫切需求。

这样，写作的选择及其责任就明确提出一种“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极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是不一样的。作家并不享有在一种文学形式的无时期性文库中选择他的写作的权利。某一作家可能运用的写作只有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才能确立：世上存在一种“写作的历史”；可是，这一历史是双重的：在一般历史提出——或强加——一个新的文学语言（langage）问题时，写作还是充满对先前习惯用法的回忆，因为，语言并非绝对纯真：词汇具有第二种回忆的能力，它能神秘地渗透到新的意义之中。确切地说，写作是一种自由和一种回忆的折衷，只有在选择的动作中，而不是在它的时间延续中，这种回忆的自由才是自由的。也许，今天我可以选择这样或那样的写作，追求一种清新或一种传统，并且通过这一选择动作确认我的自由；然而，我已经不再可能在一种时间延续中发展这种自由，而不逐渐变成别人使用的、甚至我自己使用的词汇的奴隶。一种来自所有先前写作、甚至我本人过去的写作的顽固的残余影响还笼罩着我的词汇的现状。每一写下的痕迹如同一个先是透明的、纯净的和中性

的化学元素一样迅速沉淀，而在其中，唯有时间的延伸能够慢慢地使整个过去悬浮起来，并且呈现出愈加稠密的一整套密码。

象自由一样，写作只是一段时间。但是它是历史上最为清晰的一段，因为，历史总是并且首先是一种选择和这种选择的极限。正是由于写作衍生于作家的有意义的动作，所以，它比文学的另一面更为明显地与历史同处一个水平上。统一的古典主义写作在几个世纪间一直是同质的，而多样的现代写作仅一百多年就已枝繁叶茂，甚至达到文学实际的极限本身，这种法国写作的爆炸和总的历史的一场重大危机是非常相符的，这在严格的文学史中的更加混乱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来。巴尔扎克和福楼拜思想上的区分是流派的不同；而他们的写作势不两立却是出于一种本质上的决裂。这种决裂发生在两种经济结构相互交替及其激发的思想和意识上的决定性的变化时期。

（二略）

三　小说的写作

小说和历史在目睹它们繁荣昌盛的那个世纪，曾有过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这种深刻的联系，也许有助于我们同时理解巴尔扎克和米什莱①，在他们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给自足世界的形成，他们编织各自的维度和极限，在其中

① 米什莱（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他的文学作品的风格具有抒情味。

安排他们的时间、空间、居民、丛集的事物和神奇的故事。

19世纪宏篇巨著构成的这个球状物是通过小说和历史的冗长叙述表现的，这些叙事宛如从弧形的、束缚的世界发出的平缓射线，然而，诞生在当时报章上的长篇连载小说却在它的缕缕曲线中显得大为逊色。所以，叙述并不必然是一种体裁规律。整个一个时代用文学构思小说；而另一个时代却用分析撰写历史。叙事形式同时向小说和历史延伸，一般地说，是某一历史时刻的选择或表达方式。

来自法语口语的“简单过去时”①作为叙事的基石，永远是一门艺术；它从属纯文学惯例的一部分。表达时间关系已不再是它的任务。它的作用是将现实带到一点上，把大量过去的和重叠的时间抽象化为一种纯字面的行动，使它脱离经验的存在根源，转向与其他活动、其他过程的逻辑联系，转向世界的一般运动：它的目的在于维系事实王国中的等级。正是由于简单过去时，动词才默契地构成因果关系的一环。它参与一个相互关连并有一定方向的总体活动，起着类似意向代数符号的作用。由于时间性与因果性总是不能截然分清，因此，需要一种伸展，即一种叙事的才智。鉴于此，它才成为创造大千世界的理想工具；它是天体起源、神话、历史和小说的人造时间。它虚设了一个有结构的、超然的、精致的、只限于一些有意义的线条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掷出的、摊开的、外现的世界。在简单过去时的背后，隐匿着一个造世主，这就是上帝或叙述人。这个世界在人们叙述它时

① 简单过去时(Passé simple)：法语的一种时态，表示在过去某一确定时间内已经完成的动作，只用于书面语言，以叙述故事，所以被称作过去的“叙事时态”。它所表达的动作没有延续性，和现在不再有什么联系。

并不是不可解释的，它的每一个偶然的事件都仅仅是状况的变化，所以，确切地讲，简单过去时正是反映这一变化的操作符号，通过它，叙述者可以将现实的爆炸性变化带到一个微薄而纯净的动词之中，这个动词没有密度、体积和展开，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尽可能迅速地把原因和结果结合起来。历史学家确认居兹公爵去世（mourut）① 于1588年12月23日，小说家讲侯爵夫人五点钟出门(Sortit)②，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这些活动都出自于毫无厚度(épaisseur)的往昔，它们只有摆脱存在的震荡，才能获得一种代数的稳定性和构图。它们是一个回忆，而且是有用的回忆，它远比时间的延续更为重要。

因此，简单过去时最终是一种秩序的表达，说到底，也是一种欣悦现象的表达。现实依靠这种时态变得既不神秘也不荒唐了；它是明确的，大约可以说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它无时无刻不操持在创作者的手中；它承受着它的自由施加的巧妙压力。对于19世纪所有伟大的叙事作家来说，世界大概是悲怆动人的，但没有被捐弃，因为它是协调一致的关系的总体，并且，在写下的事实之间不存在交迭；另外，讲述世界的人有能力回避构成世界存在本身的晦暗性和孤僻性，他可以用每个句子证明行动的交流和层次；总之，还因为，这些行动本身就可能被凝缩成一些符号。

所以，叙述体过去时归属于一种纯文学的安全体系。作为一种秩序的现象，它构成作家与社会之间确立的许多规约之一，一方面证明作家是正当合理的，另一方面表现社会的

①② 均为简单过去时。

宁静。简单过去时“意味”着一种创造：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标出这一创造，另一方面把它强加于人。尽管介入最为浑浊的现实主义之中，它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担忧，因为，动词由于使用这一时态所表达的行动是封闭的、确定的和名词化的。叙事具有名词性质，它可以逃脱毫无极限的言语造成的恐怖：现实缩小了，并且使人感到熟识可亲，它渗透到文体中，但没有超出语言（langage）范围；文学仍具有社会使用价值，而这一社会通过字的形式本身了解到社会所消费的东西。相反，如果叙事转用于其他文学体裁，或者用于讲述内部，那么，简单过去时就会被很少装饰但更显清新、容量更大和更接近言语的形式所代替（现在时①，或复合过去时②），文学也就成为存在深度的占有者，而不是存在的意义的占有者。离开历史，行动就不再是人的行动。

这样，人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小说的简单过去时具备有效而又难以忍受的性质：它是一个表现出来的假象；它追溯出一种逼真的境地。这种逼真会在揭示出某种可能的同时，被确定为虚假。小说与历史的共同的结局，就在于疏远事实：简单过去时是社会对它的过去和它的可能的占有行动本身。它建立起一种可信赖的连续性，而它的幻觉是昭然若揭的，它是形式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是为非现实的事实披上真实的外衣，然后再披上被戳穿的谎言的外衣。这大概与某种适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带有普遍性的神话学有关，而小

---

① 现在时（présent）：法语的一种时态，一般用于正式进行或正在完成中的动作，也表现现在、过去或将来经常重复的动作以及表示普遍的真理。

② 复合过去时（passé composé）：法语过去时的一种时态，用于表示和现在还有一定联系的过去的动作。较多用于口语。

说正是这种神话学的特有产物：它把现实事物的形式保证赋予想象，又让这一符号带有双重对象的可能性，所谓双重即指真真假假，这就是西方艺术中的一种常用的手法，对此假等于真，这不是不可知论或诗歌的双重性论证的结果，而是因为，真被看作包孕一种普遍性的萌芽，或者按人们喜欢的说法，一种具有繁衍能力的本质，它通过简单的复制衍化出不同的秩序，或渐渐疏远，或成为虚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那个时代处于盛世的资产阶级才可以把自己的价值看作具有普遍意义并把它的道义中所有名称都转移到它的社会的绝对异质的各部分。这确实是神话的机械主义，而小说和小说中的简单过去时就是神话的客观对象，它们在直接意向上复加了一种教理，进一步说，即教育学的辅助手段，因为，这涉及在人工情况下付出一种本质的问题。若要领悟简单过去时的意义，只需将西方小说艺术与同样的中国传统加以比较。例如，在中国传统中，艺术仅仅追求现实(réel)模仿的完美；而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符号可以廓清自然物与人造物：在给我一个木核桃形象的同时，不会使我想到要弄清产生这一形象的艺术。而小说写作却大相径庭，它的任务就是装上一个假面具，同时又戳穿它。

简单过去时的这种含糊作用，人们在另外一个写作事实中又发现了它：这就是小说的第三人称。也许人们会回想起阿嘉塔·克莉丝蒂① 的小说，在她的作品中，构思的意图在于将杀人犯掩藏在叙事第一人称下。读者会在所有情节中“他”的

① 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英国著名推理小说家。

背后寻找凶手，因为，读者是在“我”的影响下的。克莉丝蒂完全清楚，一般小说中的“我”总是证人，而“他”却是演员。这是什么原因呢？“他”是小说的一种习惯范型；如同叙述时间一样，第三人称表明并完成小说的事实；缺少第三人称，就无力达到小说的要求，或者有意要摧毁小说。“他”在形式上显示一种神话虚构；于是，至少在西方，人们刚刚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艺术不是亲手点破它的面具的。第三人称象简单过去时那样，把这种职能还给了小说艺术，并且为小说消费者提供了可以信赖的虚构的安全保障，而且这种虚构不断以虚假形态表现出来。

“我”却不那样含糊不清，小说味也不那样浓，因此，当叙事属于惯例时，第一人称就是最直接的解答（例如普鲁斯特[①]的作品仅想成为一种文学入门）；当“我”置身于习惯之外，并且企图把叙事遣回到一种隐情的虚假自然本性中来摧毁这种习惯时，第一人称又是早已谋划好的解答（如同纪德某些叙事中被扭曲的面目）。同样，小说“他”的运用也牵扯到两种相互对立的伦理观：由于小说的第三人称代表一个毋庸置辩的约定俗成的方法，所以，不论是最规范的，还是最稳重的作家都要为之所感，就象其他作家终究认为这一习惯对于他们作品的新鲜感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不论怎样，它是社会与作者之间可以理解的契约标志；然而，对于后者，这也是以他所希望的方式维系住世界的首要方法。因此，它更可以称作是一种文学经验：一个将创作与历史或存在联系在

① 普鲁斯特（M.Proust，1871—1922），法国著名意识流小说家，主要作品为《追忆流逝年华》。

一起的人类行为。

例如，在巴尔扎克看来，五光十色的“他”交织出一面巨大的人物网络，他们尽管所占空间微不足道，却与其行动的时间持续相辅相成。这一人物网络揭示出以历史为基本要素的世界的存在。巴尔扎克的“他”不是被转换和泛化的“我”的构思形式；它是小说的原始而未加工的因素，是创作的材料而不是成果：在每个巴尔扎克小说第三人称人物历史之前，不存在巴尔扎克式的历史。巴尔扎克的“他”与凯撒的“他”相差无几：第三人称在这里造成一种行动的代数状态，其中，存在只占有尽可能少的部分。这种代数状态有益于人类关系的沟通、明朗和悲剧化。与之截然相悖——或不论先前的情况如何——小说“他”的作用都可以用来表明一种存在的经验。在大量现代小说家那里，人的历史总与变化形式的演变过程混为一谈：作为“我”的一部分（这个我仍然是最忠实的匿名形式），写书人随着存在变成命运或独白小说而渐渐获得运用第三人称的权利。这里，“他”的出现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一种努力的终极，这种努力能够从个人秉性的世界和运动的世界中分离出一种纯净而具有意义的形式，但这种形式马上又在第三人称纯属习惯而微不足道的装饰下消声匿迹了。毫无疑问，那就是让·凯洛尔①前期小说典型的痕迹。但是，在古典作家那里（我们知道，就写作而言，古典主义一直延续到福楼拜），生物人的隐退恰好证明本质人（homme essentiel）的确立。在凯洛尔式的小说家那里，“他”的

---

① 让·凯洛尔（J.Cayrol,1911—）：法国当代小说家，诗人。他的小说是由特殊的结构运动——集中营式的时空观——组织的。

侵入是在冲破存在的"我"的浓重的阴霾中循序而获的。只要小说是一个社会交往的行动（这可以通过它的最形式化的特征验明）；它就可以确立起文学。

莫里斯·伯朗科①在论及卡夫卡(Kafka)时指出，无人称叙事的兴起（在涉及这一术语时，人们会发现，"第三人称"总是当作人称的某种否定而被提出）是一种忠实于语言(langage)本质的行动，因为，这种本质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自我消亡。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他"在造成一种既更加文学化又更缺失的状态范围下，对于"我"就是一个胜利。可是，这一胜利也不断受到诘难："他"的文学习惯对于弱化人物是必不可少的，但随时都可能受到逆料不到的深度的困扰。文学犹如磷质：它在弥留之际发出的光最亮。而在其他方面，它又是一个非将时间延续牵扯进去不可的行动（特别是在小说中），因此，凡是小说就没有不是纯文学的。这样，小说的第三人称就成了写作悲剧中最纠缠不休的符号之一，这发生在上个世纪，当时在历史的重压下，文学完全与消费它的社会相脱节。在巴尔扎克的第三人称和福楼拜的第三人称之间，存在着整整一个世界（1848年的世界）：那边是一部看来崎岖但严密而安全的历史，是一种秩序的胜利；而这边是一种艺术，为了做到于心无愧，要么承袭传统，要么意欲粗暴地毁灭它。文学的现代性始于对一种不可能的文学的研究。

这样，人们重新在小说中发现适于一切现代艺术的既有毁灭性又有复活性的契机。所要毁灭的是时间延续，即存在的不可名状的联系：秩序，不论它是诗歌连续的秩序，或是

① 莫·伯朗科（M.Blan chot .1907—）：法国当代小说家。

小说符号的秩序，不论它是恐怖的秩序，或是真实性的秩序，都是意向的屠杀者。但是，重新征服作家的仍然是时间，因为，不可能在时间中发展一种否定，而不建立一种肯定的艺术，一种也许会被再次毁灭的秩序。因此，具有现代性的伟大作品以一种神奇般的耐力尽可能长时间地滞留在文学门槛上，它们处在这样一种前沿状态之中：生活的深度已经展现出来，但还未被符号秩序的完美所吞灭，例如，普鲁斯特的第一人称。他的所有作品都执著地尝试着一种努力，这就是向文学的深化和滞缓的努力。还有让·凯洛尔，他只在内心独白发展到最后时刻才自愿进入小说，这就如同极其含糊的文学活动只在它成功地摧毁直到那时还没有意指作用的时间的存在密度时，才孕育出社会所奉献的创作。

小说是一个死神，它把生活变成命运，把记忆变成有用的活动，把时间的延续变成一个被指向的具有意指作用的时间。然而，这种改变只有在社会的眼光下才得以完成。正是社会强使小说，换句话说，符号的复合体，成为一种超验物和一种时间延续的历史。正是由于作家意向的明显事实被清晰的小说符号捕获住，结果才导致人们承认以各种艺术定式使作家与社会相结合的契约。小说的简单过去时和第三人称只不过是作家用以点破自己的假面具的必然行动。一切文学都可以说："Larvatus prodeo"（拉丁语：执迷不悟），我在戳穿我的假面具中前进着。不论这是不是诗人不道德的经验，他都承受着最严重的断裂，即社会语言（langage）的断裂；也不论这是不是小说家可以信赖的谎言，真诚都需要虚假的符号，而且是显而易见的虚假，这正是谋求自身生命的延续的被

消费。这一产物就是写作，它最后又成为含糊之源。这种特殊语言（langage），其用途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光荣而又受监视的功能，显示出一种最初隐而不露的奴卑性，而这种奴卑性正是任何一种责任的特性：最初遨游不羁的写作终究要成为一种连接的纽带，它把作家束缚在历史上，而历史本身也被束缚着：社会用艺术的明澈符号标明了这种连接，其目的就是要更稳固地将它拖入自身异化之中。

四　存在诗歌写作吗？

在古典主义时代，散文和诗歌是高雅华贵的东西，它们的差异不难区分；它们彼此如同两个相距不远也不近的毗连数字，而不同的只是它们的数量。假如我将散文称作数量最少的一种话语，即表达思想的最经济的媒介，又假如我将a、b、c称作语言(langage)的特殊标志（虽然无用，但起装饰作用，诸如格律、韵脚或形象的法则），那么，所有字词的表面都会寄寓于茹尔丹(M.Jourdain)的双重方程中：

诗＝散文＋a＋b＋c

散文＝诗－a－b－c

很明显，诗歌有别于散文。但是这种区别不是本质上的，而是数量上的。因此，它无损于语言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古典主义的信条。人们根据社会时机的不同从量上调整说话的方式，此一时为散文，滔滔雄才；彼一时为诗歌，悠扬典雅。这些都是上流社会“表达”方式的规矩，但不论怎样，都使用唯一的语言（langage），这种语言反映出精神

世界的永恒范畴。古典主义的诗歌只有作为变换装饰的散文才被感觉到，这种变换正是一种艺术的结果（即一种技术的结果），而绝不会作为一种不同的语言（langage）或一种特殊感觉的产物。因此，任何一首诗歌不过只是一篇潜在散文的、经过装饰、暗示或负载的等同物，这种潜在散文的本质和力量都蕴藏在任何可以表达自身的方式之中。古典主义时代的“诗学”没有表现出任何扩延和感情深度，也没有表明任何相互关联的结构一致性以及截然不同的领域，而只是一种字面技术的折射，它根据比对话更优美、因而也更有社会性的规则去“表达自我”，这就是说，把一句被明显的习惯本身所社会化的言语抛射到完全以精神武装的内隐思想之外。

我们知道，这种结构在源于兰波而非波德莱尔的现代诗歌中荡然无存，除非根据一种经过调整的传统语式重新运用古典主义诗歌的形式祈使法：诗人从此把他们的言语确立为一种封闭的自然物，它同时包孕着语言（langage）的功能和结构。至此，诗歌不再是饰以华丽词藻或已被剥夺自由的散文。它是一种不可简化而无继承的质。它不再是属性，而是实质，所以，它完全可以抛弃符号，因为，它本身就具有它的自然属性，也就无需向外界表明它是什么：为了能避免使用诗歌和散文的相异性符号，两者的语言应当充分地区分开来。

此外，思想和语言（langage）的所谓关系也完全倒置了。在古典主义艺术中，一种完全形成的思想可以产生“表达”它、“转述”它的言语。古典主义思想是无时间延续的，古

典主义诗歌仅有对它的技术性布局必不可少的时间延续。在现代诗学中，情况正好相反，字词产生一种形式上的连续，在这个连续中，一种缺少这些字词便无以表达的知识或感情的密度渐渐地显示出来。所以，言语是带有更多精神构思的深蕴的时间(temps epais)，在这种构思中，“思想”早已整装以待，一点点地被字词的偶然性确立起来。这种字面上的运气会结出一种有意义的成熟果实，并预示着不再是一种“制造”，而是一种可能的偶然事件的诗歌时间，是一个符号与一个意向的相遇。现代诗歌与古典主义艺术由于一种差异而势不两立，这种差异涉及语言(langage)的整个结构，除了同一的社会学意向之外，它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古典主义语言(langage)的节俭（散文和诗歌）是具有关系性的，也就是说，散文和诗歌中的字词在有利于关系的情况下，尽可能是抽象的。任何一个词都不会由于自身而显得富有意义，它刚好是一个事物的表达符号，它更是一种联系的途径。它远没有潜入一种与它的构图共存的内在现实，而是一说出就伸向其他字词，形成一种表面的意向链。如果观察一下数学语言(langage)，也许会使我们明白古典主义散文和诗歌所具备的关系本性：众所周知，在数学写作中，不仅仅每个数量匹配一个符号，而且，连结这些数量的关系也被运算、等式或差分的标记表达出来；人们可以说，所有数学连续的运动都来自数量联系的清晰释读。古典主义的语言(langage)由类似数学的运动支配掌握，当然明显不如数学那样精确而严密：它的“字词”之所以中性化并且造成缺位

状态，是由于它们严格地依赖一种强调新鲜感的传统，这样，音响或语义的变化就被“字词”忽略了。这种变化会将语言（langage）风味缩于一点，并依不适当的快感而中止这种智力运动。古典主义的连续是一种成份的系列，它的密度是均等的，这种连续承受同样的兴奋压力，同时，它从中提取趋于个体的、被看作发明的意指作用的倾向。诗歌词汇本身是一种使用词汇，而非发明词汇：诗歌中的形象在整体上是特殊的，它不是孤立的，是通过习惯而不是通过创造才存在的。因此，古典主义诗人的作用不在于找到一些更富有意义或更响亮的新字词，而是调整古老的规程，完善一种关系的对称或简洁，把一种思想束之于或凝缩于一种格律的精确范围之内。古典主义的奇思① 是关系的而不是字词的奇思：这是一种表达艺术而非发明艺术，字词在这里不会象晚些时候那样，从一种极其突出和预料不到的高度复制具有深奥和怪诞特性的经验，它们只是根据典雅或装饰性的节俭要求从表面上作出相应的安排，人们迷恋的是字词的陈述结构，而不是它们的力量，或它们本身的美。

肯定，古典主义的言语不会达到数学网络尽善尽美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一些特殊的符号表达的，而仅仅由形式或安排的变化来表现的。字词的收缩，也就是它们的整列，恰是实现古典主义话语的关系本性；由于常常在为数不多的相似关系中运用，古典主义字词便朝一种代数性质的方向发展：修辞法以及程式化的表达是联系的潜在工具；

---

① 奇思（Concetli）：源于意大利语，意为华丽而做作的表达。

为了获得话语前呼后应的状态，它们丢弃了本身的密度；它们以化学原子价的方式进行操作运动，画出布满对称衔接、辐射与交叉的文字领域，由此浮现出词义的一些新意向，不过从来没有引起片刻的惊奇。古典主义话语的微小单位刚刚表达出它们的涵义，就变成了一些运载工具或类似通知的东西，并总把一个涵义运送到很远的地方，这个涵义不愿沉入一个字词深奥的底层，而愿扩延到智力活动的整个范围，也就是说，扩展于交流范围。

不过，雨果力图使所有格律中最讲究词语关系的亚历山大体所承受的失调，已经包含着现代诗歌未来发展的趋向，因为，在雨果诗歌中，关系意向已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字词的爆炸。现代诗歌实际是与古典主义诗歌和各种散文对立的，它毁灭了语言（langage）自发功能的本性，而仅使词汇基础残存下来。它保存下来的只是这些关系中的运动和音乐，而不是它们的真相。字词超越空洞关系的界限而爆炸，文法已失去它的目的性，而变成一种韵律学，充其量只是为了表现字词的一种延续的变化。严格地讲，关系并没有消除，不过是一些保存下来的位置，是关系的滑稽模仿，而这种虚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字词的密度须在一种虚空的魔力之外才能显示出来，仿佛一种无内容的声音和符号，颇似《狂怒和神秘》。①

在古典主义和语言（langage）中，正是这些关系，先导引出字词，随即把它带向一个总是被投射的意义之中；而在

① 《狂怒和神秘》：R·夏尔的作品。

现代诗歌中，关系只是字词的蔓延，字词是“住所”，它作为本源根植于功能的韵律体中，这些功能可以使人心领神会，但它们却是不显现的。在这里，关系使人心醉神迷，但正是字词在丰富和充实这些关系，就象突如其来地揭示一个真实一样；如果认为这个真实归属诗歌秩序，那么，这就是说，诗歌的字词永远不可能是虚假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完整的；它闪烁着无限的自由之光，时刻准备照耀那些不确定而有可能呈现的千姿百态的关系。一旦废除固定的关系，字词只有一个垂直的投射，它就象是一个整体、一个潜入涵义、反射以及刺激余感总体中的立柱：它就成为一个直立的符号。在这里，诗歌的字词是一个无直接过去的行动，一个无背景的行动，它只呈现所有与它密不可分的本源所反射的浓密阴影。就这样，在现代诗歌的每个字词下面都卧有一个存在的地质构造，在那里，聚合着名称（Nom）的总和内容，而不是象古典主义散文和诗歌中的选择内容。字词不再事先为社会化的话语的一般意向所导向；诗歌的消费者在缺少筛选的关系作为向导的情况下，会将注意力集中于字词，并纵深地挖掘它，把它当作携有各种可能的绝对的量来接受。字词在这里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它同时可容纳多种词义，其中某一有关联的话语会指令它作出选择。因此，造成一种只在字典和诗歌中才有可能的状态：名词可以不依赖冠词而生存，并且被置于一种零度状态下，这种零度状态同时包孕着所有过去和未来的说明。字词在这里具有同源的形式，它是一种范畴。因此，每一诗歌字词都是一个逆料不到的客观物，一个飞出所有语言（langage）潜伏性的潘多拉

匣子。① 它的产生与消费总是和一种特别的好奇心，一种神圣的贪婪连在一起，这种字词的饥饿欲对所有现代诗歌都是共同的，它把诗歌的言语变成一种恐怖的不人道的言语。它确立起一种充满空白而又莹光辉泛的话语，一种遍布缺位而又溢满符号的话语，它既不能预料也不能持续意向，可是却与语言(langage)的社会功能截然相反，终于为简单借助断续言语的作法开创了一切超自然本性的先河。

实际上，古典主义语言 (langage) 的合理节俭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要说明自然本性是丰满的、可占有的、无漏失亦无晦暗，完全屈从于言语吗？古典主义语言 (langage) 总是局限于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连续之中，它假设对话并建立这样一个世界，人不是孤零的，字词不具有事物的可怕的重量，言语总是与他人相遇。古典主义语言 (langage) 是欣悦现象的承运者，因为它是一种直接的社会语言(langage)。没有任何一种体裁，任何一种古典主义的书写物不将自己看成一种集体的消费，一种口头的产物；古典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一种流行于以阶级类聚的人与人之间的客观物，这种产物是为自身转化到口语而构思的，也是根据世间偶然性而调整的消费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种口语，尽管它有极其严格的编码。

人们已经看到，现代诗歌恰恰相反，它摧毁了语言 (langage) 关系并将话语引入字词的固定点。这意味着自然知识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新诗断续的语言 (langage) 建立起

① 潘多拉盒子（匣子）(boite de Pandore)：宙斯让潘多拉带给厄庇墨透斯的一只盒子。潘多拉擅自把它打开，里面装的各种祸患一齐飞出，只有希望仍留在盒底。

一种只有通过字词的整体才显露出来的间断的自然本性。功能的引退使世界的联系一片漆黑，而此时，客观物却占据了话语中的一个过高的位置：现代诗歌是一种客观的诗歌。自然本性成为一种孤独而可怕的客观物的断续，因为，这些客观物只有一些潜在的联系；没有人能为它们选择一个特定的涵义或一个用途，或一个效应，没有人能强加给它们一种等级，没有人能把它们局限于一种精神行为或一种意向的意义，这就是说，不论怎样，也不能把它们局限于一种温情。所以，诗歌字词的爆炸所建立的是一个绝对的客观物；自然本性变成一种垂直的系列，客观物一下子竖立起来，充满着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它只能标明一个未填满的同时也是可怕的世界。这些毫无联系的字词客观物无处不具有爆炸的剧烈性，而爆炸的纯机械性震动会十分奇怪地影响到下一个字词，并随即消逝，这些诗歌字词将人摈除在外，因为，文学的现代性中不存在诗歌人道主义：直立的话语是充满恐怖的话语，也就是说，它不使人和人发生联系，而使人与自然中最不人道的形象发生联系；诸如苍天、地狱、圣物、童年、狂怒、纯物质等等。

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很难说有一种诗歌的写作，因为，这涉及一种语言（langage），它的一切伦理含意已被自律的暴力所摧毁。口的动作在这里就是要改变自然属性，它是一个造世主；它不是一种意识的态势而是一种强制的行动。这种动作至少也是现代诗人的语言（langage），他们走到诗歌构思的极端，并且接受诗歌时不把它当作一种精神活动、一种灵魂状态或一种姿态，而把它视为一种梦幻语言（langage）

所产生的灿烂辉煌和清新爽目的东西。对于那些诗人来说，谈论写作与谈论诗歌感情同样是徒劳无益的。例如，夏尔式的绝对的现代诗歌是不讲究渲染、不注重气氛烘托的，而这些原本是一些写作，也就是人们惯常所说的诗歌感情。如果就古典主义诗作及其效仿者、甚至沉湎于《地粮》①的恬适的诗体散文而言，来谈论诗歌写作，那不会有什么异议，当然，在这种诗体散文中，诗歌真正地具有某种语言（langage）的伦理观。写作在这里也象在古典诗歌中那样，都会吸收文体精髓，因此，人们可以想象，“直接”区分拉辛和柏拉图对17世纪的人来说并非轻而易举，更何谈诗歌规则。同样，对现代读者来说，要评价那些使用同一而朦胧的诗歌写作的当代诗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诗歌是一种“气候”（climat），也就是说，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语言的习惯。因此，只要诗歌语言（langage）从根本上动摇其本性（虽然它从本身结构的唯一作用发难，而且没有求助于话语的内容，也没有滞留于一种思想意识的关卡），就不再有写作，而只存在文体，通过这些文体，人们翻然逆转，面对客观世界，不再利用任何历史的或社会交往的形貌。

林 青 译 王泰来 校

（本文译自巴黎版《写作的零度》第一部分）

---

① 《地粮》，A·纪德的作品。